魔都

中国之门

THE GATEWAY TO CHINA:
PICTURES OF SHANGHAI



上|海|图|景

[美] 玛丽·宁德·盖姆韦尔 著
孙雪 译



上海人民出版社

VISIT…

LANZAROTE Caliente.com

中国之门：上海图景

［美］玛丽·宁德·盖姆韦尔 著
孙 雪 译

上海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之门：上海图景／（美）玛丽·宁德·盖姆韦尔著；孙雪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20

（魔都书系）

书名原文：The Gateway To China: Pictures of Shanghai

ISBN 978-7-208-16188-7

Ⅰ．①中…　Ⅱ．①玛…②孙…　Ⅲ．①上海-地方史　Ⅳ．①K295.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20）第086697号

责任编辑　肖　峰

封面设计　陈绿竞

魔都书系

中国之门

—— 上海图景

［美］玛丽·宁德·盖姆韦尔　著

孙　雪　译

出　　版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193号）

发　　行　上海人民出版社发行中心

印　　刷　常熟市新骅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90×1240　1/32

印　　张　6.75

插　　页　11

字　　数　146,000
版　　次　2020年5月第1版
印　　次　2020年5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208-16188-7/K·2911
定　　价　58.00元

作者简介

玛丽·宁德·盖姆韦尔

Mary Louise Ninde Gamewell (1858—1947)

美国女作家，美以美会传教士贾腓力（Francis Dunlap Gamewell, 1857—1960）的第二任妻子，在中国生活多年，有多部记录中国见闻的著作，包括《民国新生》（*New Life Currents in China, 1919*）、《明光：晨光之城》（*Ming-Kwong: City of the Morning Light, 1924*）等。

译者简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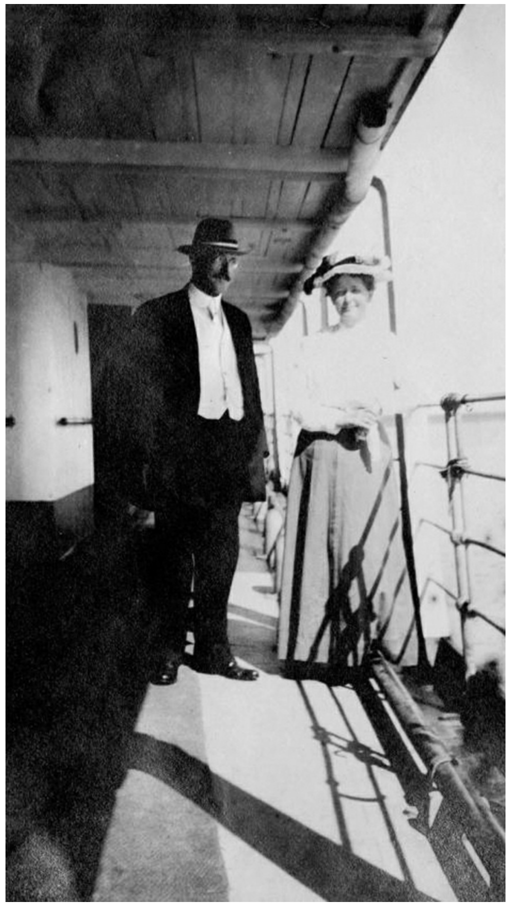
孙雪

毕业于复旦大学外国语言文学学院英文系，现任上海师范大学天华学院讲师，曾主持并完成上海市青年教师科研项目，发表论文若干，有译作《1963：变革之年》。

内容简介

为什么说20世纪初的上海是“中国之门”？本书的回答是：上海是一个小小的世界，在这里可以近距离地研究整个中国的缩影，新旧事物以及古今习俗都奇特地融合在一起，比远东任何一座城市都更能凸显变革之中的东方特色。

本书以一种发展、进步、肯定的眼光看待上海，强调上海新旧元素融合并存的特征。除了详细描绘上海自开埠之后的市政建设、街道交通、商业、教育、文化、习俗、慈善事业、工业、民生、基督教传教等多方面发展，还描写了中国传统习俗面对西方文化影响时的回应，以及揭露了工人、流浪儿童等底层百姓的悲惨遭遇。读者可以通过本书，去更加贴近当年那个已经具有国际大都市气象、充满进步的朝气和活力、处在变化与矛盾中的上海。



本书作者玛丽·宁德·盖姆韦尔与丈夫贾腓力*



作者在家中客厅*



正在伏案工作的作者*



商务印书馆三大创始人之一鲍咸昌先生（前右）及其他员工



列队接受检阅的中国警察



南京路上的店铺



租界外的黑色黄包车



胜家缝纫机机绣品的广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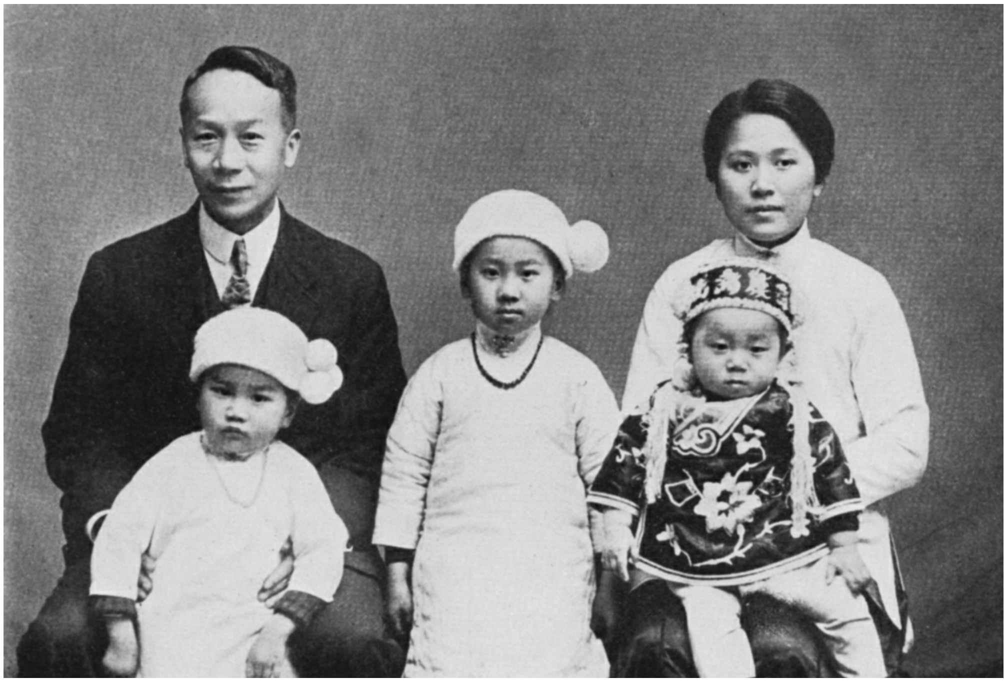
新式幼儿园



商务印书馆的中文排字车间



最初的“柳条盅茶馆”



一位中国现代绅士幸福的一家



出殡队伍中的棺材



进行体育锻炼的女学生



刚被送到儿童收容所的获救儿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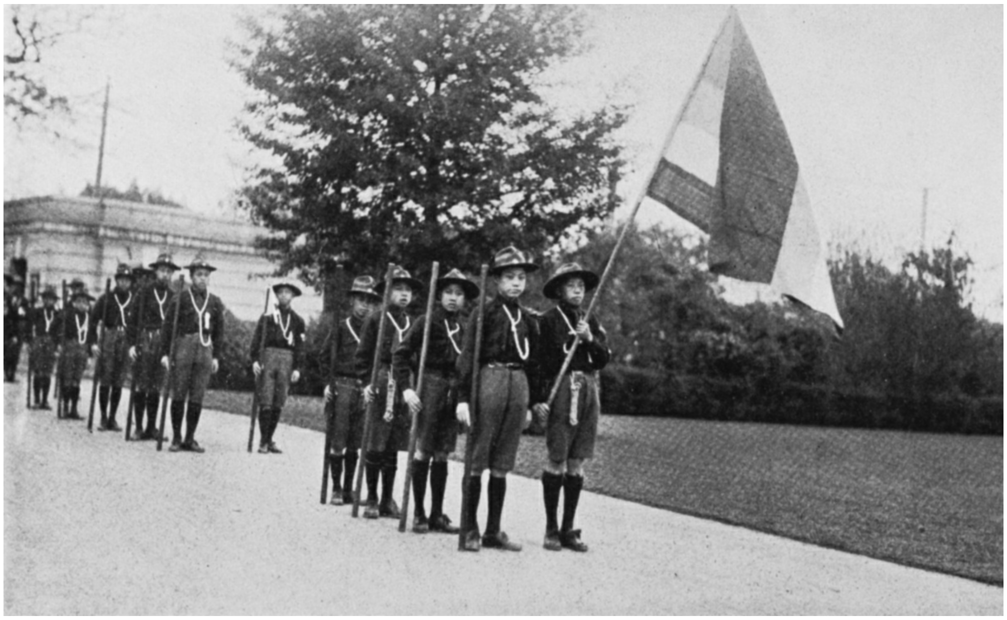
贫民救济修女会养老院的老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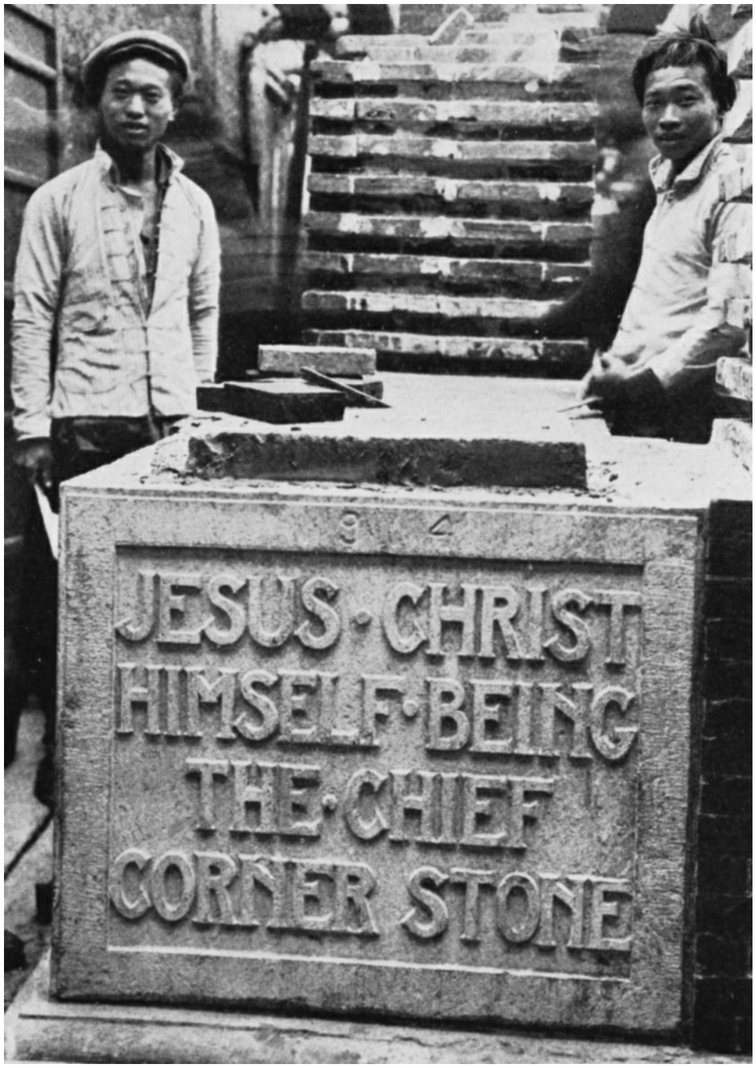
在《中国日报》上发布的获救被拐儿童照片



前往工厂途中的童工



中国童子军



基督教青年会男童会大楼的奠基石

编者的话

《中国之门：上海图景》是一部详细描写20世纪初上海城市面貌的著作。本书英文原名为："The Gateway to China: Pictures of Shanghai"，第一版于1916年出版，20世纪20年代又推出修订版。修订版扉页上没有注明具体出版时间，根据正文内容推测，应出版于1923年。本书根据修订版译出。作者根据其多年在上海的生活经历，结合其他历史材料，面向西方读者，详细描绘了上海的城市演变、市政建设、街道交通、商业、教育、出版、传统习俗、慈善事业、新式工厂、社会民生、基督教传教等多方面内容。

作者玛丽·宁德·盖姆韦尔（Mary Louise Ninde Gamewell, 1858—1947），是一名美国女性，其父威廉·沙维尔·宁德（William Xavier Nnide, 1832—1901）在美国从事神学教育工作，于1884年成为一名主教。1909年，玛丽与美以美会传教士贾腓力（Francis Dunlap Gamewell, 1857—1960）结婚，成为其第二任妻子。贾腓力还是一名工程师和教育家，在中国活动多年，曾经在北京大学任教。两人成婚后共同在中国生活，从事传教工作。玛丽有多部以中国为主题的著作，包括《中国之门：上海图景》、《民国新生》（New Life Currents in China, 1919）、《明光：晨光之城》（Ming-Kwong: City of the Morning Light, 1924）等；其与丈夫共同在中国拍摄的照片被汇集为《中国影像1909—1911》（Views Taken in China 1909—1911），现藏于美国南卫理公会大学。

《中国之门：上海图景》的出版有几方面价值。首先，本书行文通俗，内容翔实，对20世纪初的上海历史面貌进行了生动的描写。在熊月之先生主编的《上海通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中，详细梳理了以近代上海为主题的西方著作，其中就列举了本书，称本书是影响较大的通俗类著作之一。作者对上海的描绘细致，大多经得起考证与推敲，并没有刻意夸大或隐瞒，因此具有一定可信度，可供了解上海历史所用。其次，本书以一种发展、进步、肯定的眼光看待上海，并留意到上海新旧元素融合并存的特征。作者将上海视为"中国之门"，称上海是一个小小的世界，在这里可以近距离地研究整个中国的缩影，新旧事物以及古今习俗都奇特地融合在一起，比远东任何一座城市都更能凸显变革之中的东方特色。这一概括即便放在今天也部分适用。作者重点关注上海自开埠之后，在西方文明影响之下，在市政建设、教育文化、社会

治安、工业商业、社会救济等方面出现的新情况。同时对中国的传统因素也没有忽略，用了一定篇幅去描写上海华界的发展、中国传统习俗面对西方文化影响时的尴尬与回应。再次，作者还体现出一种富有同情的眼光，对上海的底层百姓生活予以了积极的关注，详细描述了上海工厂里普通工人的悲惨遭遇，以及流浪儿童的收容等，体现出对慈善事业的积极提倡。

我们希望本书的出版，能够有助于今天的读者了解上海历史、上海文化，了解一百年前的上海如何具有国际大都市的气象、充满朝气和活力。本书涉及上海历史知识点甚多，译者及编者尽可能对其中可考证之处进行注释，便于读者阅读。

作者毕竟是西方人，虽然已经尽可能以同情眼光看待中国，但仍有身份所导致的局限性，在个别章节有对中国无意识的歧视性描写，一些表述及观点也不够准确。同时由于作者的传教士身份，在行文中不免对与传教有关的机构、事件、人物等有溢美之词。为尽可能保持本书原貌，我们仅对局部文字作适当处理。以上请读者注意鉴别。

序言

上海俨如一个小小的世界，在这里可以近距离地研究整个中国的缩影。中国人从全国各大省份漂泊至此，置身新环境的他们，多半还是遵循自身悠久的习俗，珍视自身继承的传统。但这座城市也以其快速不断的变化而引人瞩目。后来，当地一家图书公司的员工表明："我们从未想过出版一本上海旅游指南，因为用不了六个月，这书就会过时。"对西方人来说，这座繁忙大都市的主要魅力在于新旧事物以及古今习俗奇特地融合在一起，这种融合随处可见。上海比远东任何一座城市都更能凸显变革之中的东方特色。为了捕捉并描绘这些变化的场景，我们绘制了下述"图景"，希望可以激发人们对中国的兴趣，并唤醒他们对中国及中国人全新的爱慕及倾慕之情。本书并未企图对著述主题作出全面的研究，这点无需解释。最后一章尤为如此——通过列举实例谈及了传教士活动的几个阶段，而有些协会与机构开展的工作具有同等价值，但并未提及。譬如，广学会[1]的历史读来犹如一段浪漫史，众所周知，其出版的书籍对已经亡故的光绪帝以及变革派制定出全新政策起到了重大作用，这些政策迎来了进步曙光和一个全新的中国。

向所有提出建议及批评、帮助这本小书得以问世的中外友人，致以最诚挚的谢意。

玛丽·宁德·盖姆韦尔
中国，上海
卫斯理宗教会

---

(1) 广学会（The Christian Literature Society），是1887年英、美基督教新教传教士和外交人员、商人等在中国上海创立的出版机构。前身为1834年英、美传教士在广州创立的"实用知识传播会"和1884年在上海设立的"同文书会"。

修订版序言[1]

本书写于六七年前，时至今日，上海还是当时的上海吗？从某种意义上说，是的；然而，在许许多多的方面，这座城市已然变了一副模样。上海开放为通商口岸的历史并不久远，因为第一位侨居上海的外国女性去世就发生在不久之前。但是，这些变化——尤其是在过去的十年间——何其迅速，何其惊人呐！我们有时会听人说道，这座城市的元老们显然并没有先见之明，没有预见这座城市日后将会扩张，否则他们断不会将街道建得这么窄。偶尔会有人批评说，新建的大道爱多亚路（Avenue Edward VII）[2]宽得过了头，工部局[3]的成员往往会答复道："我们是在考虑此后二十年的需求。"

在上海的或与上海有关的，没有什么东西是注定不变的，除了黄浦江——那里一直是新生活的发源地，正如最近，为美国船坞建造的四艘船，便神气十足地一路滑向黄浦江的怀抱。那四艘是中国有史以来制造出的最大的船只，后来在太平洋海岸对它们进行测试的时候，专家们宣称，它们超出了预期，而且在一百多家与之竞争的造船中心生产出来的同类型船只中，它们的质量是最好的。

上海是中国最富有的城市，1922年关税收入超过1500万美元，占国家总收入的三分之一。

1920年展开的最近一次人口普查显示，大上海（Greater Shanghai）——包括华界（the Chinese City）、公共租界（International Settlement）以及法租界（French Concession）在内——的人口数量已经增长到150万，在那之后的人口增长势必更加显著。这一增长主要是由于中国人涌入其中，因为过去七年中，上海的美国人口数量虽然几乎是翻了一番，英国人口几乎保持没变，而日本人口却大幅减少了。

最后一章"今日之上海"，可能只是简单地提及了最近的一些变化。有许多其他的变化，谈论起来也会十分有趣，特别是中国女性群体所取得的一些显著发展成就。

但是，有所保留，也许会更好，否则未来的西方游客将会错过邂逅惊喜的乐趣！

---

(1) 原书初版于1916年，中译本根据修订版译出。根据修订版前言及正文，修

订版出版时间应为1923年。—— 编者注

(2) 爱多亚路，1914—1916年间修建，为法租界和公共租界分界线。此后，曾改名为“大上海路”“中正东路”。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改名为延安东路，一直沿用至今。以下若非特别注明，均为译者所注。

(3) 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the Municipal Council）是设置于上海公共租界内的最高行政机构。1854年成立，1943年取消。

目 录

编者的话
序言
修订版序言
第一章　城市之演变
第二章　城市之特色
第三章　街道之漫谈
第四章　店铺之魅力
第五章　持家之难题
第六章　交通之点滴
第七章　学堂之印象
第八章　行业之翘楚——商务印书馆
第九章　华界之实况
第十章　新旧之习俗
第十一章　上海之婚俗
第十二章　外国人慈善之举
第十三章　中国社会服务之成就
第十四章　工厂之传奇与悲悯
第十五章　新教故事之扉页
第十六章　今日之上海

第一章　城市之演变

从远古时代开始，长江入海口处就有大量的淤泥沉积，这些淤泥都是被浩浩荡荡的浊黄江水从遥远的西部冲积至下游的。久经累积，水变成了泥滩，泥滩变成了绿野。约莫1000年前，几个渔民来到这一片冲积物上定居，他们那原始落后的小村庄后来便逐渐发展成了今日的上海。上海意指“海上之埠”，但如今这座城市离海岸有60英里远。流经上海的黄浦江是长江的支流，在过去五十年间，河道已经缩减了三分之一，只有不断疏浚才能保持河道通畅。

在过去的许多年里，并没有迹象显露这个名不见经传的渔村拥有不可限量的未来；但苍天不负有心人，1075年有位负责航运和海关的官员被派驻至此，自那时上海便开始繁荣起来。500年后，这个地方俨然已经发展成东方的雅典，因其音乐家、诗人、散文作家及政治家而闻名。这里也孕育了闻名遐迩的女性，这里的女性被赞誉为集美德和孝道于一身的典范。与人类一样，这座城市也有其浮沉起落。这里三番五次受海盗侵扰，遭台风横扫，被暴雨浇灌。虽然地处的纬度与佐治亚州的萨瓦纳市（Savannah）一样，但是在有一年凛冽的冬天，这座城市几乎被大雪吞噬，江面上全结着冰，人类和动物都冻得几近死亡。

据估计，19世纪初，上海人口已达50多万，而且其发展势头依然方兴未艾。上千艘竖着船桅的古色古香的中式帆船涌向锚泊地，每一艘都涂得很花哨，宛若一条瞪着眼睛的鱼——因为中国的水手说，一艘船若无眼睛要如何看清航向？对于长江流经的中游省份以及沿江各地来说，上海都是人来车往的港口。早在开埠之前，这座城市的商业潜力就已经挖掘了大半，“海上霸主”的地位就已经确立了。

1842年，这座城市——与其他四座城市一起——被大不列颠强行打开了大门，成为通商口岸，进入了历史上的一个重要时期。[(1)]第一批在这座城市居住的西洋人是英国领事及其随员。在此居住的英国人当务之急就是要获取土地，设立永久的租界。他们很快就发现选中地方是一回事，而要得到这块地方又完全是另一回事。选中的地方位于这座中国城市的北部和西部，大多是用于耕作的农田，零零落落可见村庄，时时处处都有坟墓——隆起的、杂草丛生的金字塔形土墩。一如既往最棘手的问题是坟墓，买家们认同坟墓不应受到惊扰。当英国人最后得到这块土地的时候，他们认定这场斗争甚至要比占领这座城市还要更加艰难、

更伤脑筋。法国紧随英国之后，要求中国人给予他们特权，稍后美国人亦是如此，他们遇到的阻力和反对的声音都要更小，简直在悄无声息之间就据为己有了。

据记载，到1848年——租界已设立五年——外国人口总计100多人，其中有一些妇女。插上一双想象的翅膀，天马行空地设想一下当时那个社会的生活环境吧！炎炎夏日，没有避暑山庄，没有凉飕飕的和风，没有电扇降温消热，没有冰镇的饮料，没有蚊帐遮挡苍蝇蚊子。街头溜达的乐趣因卫生条件的欠缺而荡然无存，即便是在附近的郊区漫步也让人几乎无法忍受，因为农田里用粪便做肥料。霍乱、瘟疫和其他的东方疾病猖獗，第一座外国公墓里那些被心如刀割的人儿用泪水浸湿的小土墩，传神地讲述了众多年轻生命为成就今日上海而献身的故事。

19世纪60年代初太平军——那是一股让这个国家动乱十四载、差点推翻清王朝的力量——对上海的影响，是上海历史上的一件大事。激昂的太平军从西部出发一路挺进，附近的老百姓在他们抵达之前就逃到了上海。按照原先由外国人制定的《上海租地章程》，租界内是禁止中国人居住的。然而，那些惊慌失措的避难者却不受制止。他们起初在郊区扎营，但很快就推搡着挤了进去，涌入了租界，通行无阻。为了安置他们，建了很多棚屋。他们的人数犹如雨后春笋，一夜之间就成百成百地往上涨，房地产投机者收获颇丰，因为这些逃难的人往往是些有钱人，付的租金都非常可观。这些投机者中有很多人因这样的好运气变得喜不自持，继续疯狂地造房子，于是等这场起义结束的时候，他们便损失惨重，因为许多人就像当时一窝蜂地挤进来那样，又一窝蜂地离开了。中国人大举外迁的一个原因是因为他们不喜欢当时租界实施的卫生条例，他们提心吊胆，唯恐外国人会充分控制住中国官员，甚至在内陆城市实施这些让他们憎恶的规定。不过，还是有大量的人留了下来，享受租界为他们提供的保护。虽然时不时有人想把他们驱逐出去，但都徒劳无功，其间还有其他人慢慢地流入这一理想的避风港。自此，上海就一直是中国各地目无法纪之徒和失意者的避难所。不幸者之中值得尊敬的也有很多。中文版《名人录》（“Who’s Who”）上海篇——编译准确的话——里面已被遗忘大半的昔日名流、被免职的官员、没落的贵族、过气的学者、在国际事务中举足轻重的人数量之多，会让读者大为惊奇，他们因没了“面子”、不受待见、时运不济，便认为这座国际大都市是个安全的、可以安度余生的隐居之所。

“创举”总是具有特殊的意义。很多创举上海都可以声称完全归其所

有。中国历史上的第一条铁路建在上海到吴淞要塞（Woosung）这一段，全程12英里，这里是黄浦江与长江汇流之处。派去调查这条线路的两个人进展艰难，其中一个差点被愤怒的当地民众杀死，那些民众声明他们位于规划路线上的祖坟不容亵渎。这条线路于1876年竣工，但注定使用不了多长时间。车窗玻璃和蓝色丝绸窗帘被中国乘客给偷了——他们搞不明白如果不换成他们觊觎的现金，塞满他们的腰包，这些东西还能有什么实际的用途——还是件小事。这条铁路让所有阶层都深恶痛绝，因此从一开始就注定要失败。一群上海官员来视察整条线路时，就坐在轿子上苟且了事，对屈尊乘坐火车一事嗤之以鼻。当他们庄严宣布这条线路存在威胁的时候，它就已经走向了终场。此后不久，铁轨就被摧毁了，过了很久，这个地方才重新铺上了轨道。但即使是在清王朝的统治下，这一社会依然有所进步，现如今，每天日落之前，上海到吴淞这一段都会几度响起机车刺耳的声音，在这个“世上最亲近外国的城市”，轿子几乎就和以前的火车一样新奇。

让中国大受裨益的东西之一，竟然是在太平天国运动这个紧张时期被授予了这个忧心忡忡的国家，这一点似乎有些奇怪。那就是大清皇家海关总税务司署（The Imperial Maritime Customs）[(2)]在上海落成了，曾有位作家将之称为“有史以来最为有效的西方酵母传入了中国”。1854年，中国人领导下的海关服务交由外国人管理。经过罗伯特·赫德爵士（Sir Robert Hart）[(3)]长达半个世纪的掌管——在他任期内建立的中国国家邮政体系（The National Chinese Postal System）大半都是他的功劳，海关工作稳步进展，收益持续增加。近日在海关大楼（The Custom House）附近的外滩公园（The Bund Park）[(4)]为摆着招牌姿势的罗伯特爵士塑像[(5)]揭幕，是再合适不过的。[(6)]

上海尚未触及繁华之巅。去年海关收入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多。一天之内经常有二十多艘开往多个不同港口的船只离开这里的码头。从来没有这般大兴土木过，特别是从来没有建过这么多的中式房屋。眺望宽广的外滩，两侧都是美观的外国建筑，路上车水马龙，西方游客几乎都要惊叹是不是到了某个欧洲国家的首都，而不是中国的某座城市。当地人口已增长到了100多万。在包括日本人和东印度人在内的21000名外国人中，约有5000名英国人，1500名美国人。这座城市是一个策划密谋、发动改革的政治舞台；是传教工作的全国总部；是主要的商业中心；是进步的家园；简而言之这里就是中国的神经中枢，其影响力触及这方土地上最偏远的角落。上海面临着东方所特有的问题和危险，但她的未来

是光明的，发展前景不可限量。

---

(1) 上海正式开埠是在1843年11月，将其划为通商口岸的《南京条约》签署于1842年。—— 编者注

(2) 即中国海关总税务司署。1854年英美法以上海小刀会起义期间江海关瘫痪为借口，组成关税管理委员会，攫取中国海关行政管理权。1859年改设总税务司署，设置总税务司。清朝期间亦称大清皇家海关总税务司署。民国年间依旧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被废除。—— 编者注

(3) 罗伯特· 赫德，1863年起担任清海关总税务司直到1911年。

(4) 外滩公园，即现在的黄浦公园。

(5) 即赫德铜像，1913年起树立于上海外滩，1941年为日军拆除融化，铜像基座保存于上海市历史博物馆。

(6) 作者对赫德的描述偏向赞美，站在西方人立场。请读者注意鉴别。—— 编者注

第二章　城市之特色

上海经常被称作“世上最新奇的小型共和国”。当然，这样的城市，中国仅此一座。当前在上海境内，居住着世界各国的人们，其中18个国家设有领事机构，各国人在一个多语种领事机构——该机构成员通过选举产生——的领导下，基本上都能友好共处。现行自治制度的制定是一项艰巨的任务。很久以前，上海的元老们，就因这项制度涉及众多人口及民族，历经诸多激烈的争议。现行的《上海洋泾浜北首租界章程》（The Land and Municipal Regulations）几乎保留了1869年的通行条例。[(1)] 上海成为通商口岸十年以后，法国人退出联盟，建立了自己的管理机构。其他国家便组成了“公共租界”，此后被称为“模范租界”。但事实上不得不承认，它并不像那些具有美好愿景的人希望看到的那样，并不能在方方面面都称得上“模范”。但它依然具有让人赞赏的特色，即使在香港那样名副其实的大都市，也有一位公民在近期呼吁并敦促香港醒悟过来，去效仿令人心潮澎湃、先进开明的上海。

一切行政事务都以工部局为主导。每年春天，公共租界的领事都会召集纳税人或选民参会。每位外国人，只要拥有或租用具有固定价值的房产，均享有选举权。纳税人选举工部局成员，此项工作完成之后，直到第二年，除非因特殊事宜召集他们，他们都不会出现在公众的视线之内。工部局每周召开一次例会。九位成员均是不领薪水的生意人。中国人没有资格加入，但日本人有，事实上，此前从未有日本人加入，直到一年前，有位日本人成功加入，这让中国人极其不满。司法权属领事所有。每位领事对自己国家的国民进行仲裁，有三个国家除外——它们建立了配备常驻法官的法庭。这三个国家是英国、美国和德国。英国法庭多年前就成立了；美国法庭于1907年首次开庭。说到治外法权[(2)]这个问题，中国人极为愤慨，这一问题在日本是不存在的，这更是增添了他们的痛苦与屈辱。自《新法令》（The New Law Codes）[(3)]制定以来，这个国家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坚决地要求拔除这根肉中刺，废除外国法庭。但是新法并未广泛实施，除非贿赂和拷打这些老一套的方法永远地成为过去式，否则这些缔约国（The Treaty Powers）将继续要求对本国国民行使专属管辖权，他国国民也将继续索求保护。

上海确实有一家独一无二的机构——正如有人将之称为“有史以来最独特的司法机构”——叫作会审公廨。[(4)] 早期，中国人若在公共租界

被羁押，会被移送给华界的官员，候审待罚，但是鲜有正义，一贯都是要么残酷要么过度从宽地处理。为了保护中国人，确保涉及外国人的案件受到公正的处理，同时也为了对未设领事代理处的外国案件进行审理，上海于1865年[(5)]成立了会审公廨。事实证明，这一方法一开始并不尽如人意，因为现行法律是中国法律，而外国襄审员——根据当天是星期几，来决定当天的襄审员是英国人、美国人，还是德国人——尽管在中国法官旁边的司法长凳上占据一席之地，但只不过是顾问身份。而实际上，不得不承认，外国襄审员正渐渐在背后操纵实权，发挥很大的控制权，自1911年以后更是如此。在革命时期，会审公廨的管理权从中国人手中移交到工部局的控制之下。这一更迭是悄然发生的，尽管中国人心里非常清楚是怎么回事，但他们面上依然佯装不知道，从而保全了他们的"面子"。只要"面子"能保得住，真相便不值一提。

大多数人对于花一上午时间去参观会审公廨都颇有兴趣，因为可以从许多侧面了解到中国人的生活和特色。每天早上九点半是开庭时间，外国襄审员和中国法官会入场就座，双方都有严肃的口译和书记员陪伴在侧。中国和外国的目击证人分聚在室内的两侧；犯人——大多都是些孤苦可怜的家伙——在锡克族[(6)]警察和中国警察的严加看管下，排队等待判决，不远处还有一位英国警卫官执勤；大堂之上，一群满怀好奇心的围观者聚在门口周围，尽可能地往最里面挤，其中许多是犯人的亲戚和朋友，但是审判全程中他们都无动于衷、一动不动。这世上还有其他地方和上海会审公廨一样，有这么多形形色色的案件——民事的、刑事的、可悲可怜又可笑的都有——在此听审吗？有些案件错综复杂，即使机智如所罗门，[(7)]也要大费脑筋；有些案件十分简单，形如儿戏。有天早上，一对老夫妻出庭，申请离婚。他们面色和善，好像与全人类都能和睦相处，彼此之间就更是如此了，这让法官十分困惑。"你们吵架了吗？"他问道。"啊，没有。""难道你俩过得不幸福吗？""我们非常幸福，就因为这样，我们才来的，"老太太匆匆解释道。然后便全盘托出了事情的原委，有凶兆显示，日后他俩会吵得很凶，闹到分离，郁郁而终。因此，为了避免这样的灾难发生，他们决定抓紧时机，趁他们关系尚好时就分开。几句忠告和安慰便解决了。没过多久，这对年迈的恋人——他俩确实还是一副恋人的模样——就满面笑容、手牵着手走出了法庭，回到了他俩的小家。租界之内不执行死刑，被判处死刑的罪犯会移交给中国政府，这儿又要考虑"面子"问题了，即使实际上已经宣判了死刑，华界法庭会佯装他们接下来还要自行判决。

会审公廨所在的位置右侧是女子监狱，左侧是债务人监狱。在清政府的统治之下，监狱几乎毫无纪律，无人管事。债务人监狱里关押的犯人，只要能够弄到钱，就可以一边尽情地吸鸦片和赌博，一边享受舞女为他们提供的乐子。在女子监狱里，境况甚至更糟。顶楼留给犯人的年幼子女——既可怜又乏人问津的一群小孩子——聚会所用，孩子们接触到了各种各样的不良影响。他们的母亲在楼下的牢房里往往随心所欲。她们有个小把戏，就是把手塞进窗户的铁杆之间，然后用尽全力将波纹铁网扯开，这样她们就可以大声地与楼下街上的人闲聊，还可以放根绳子下去，将朋友系在绳子末端的食物或其他东西拉上来。女狱吏（这地方只有一个男人，就是门卫）没有诚信、不可信赖、易被收买，实际上比那些女犯人好不了多少。

但过去几年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外国官员一掌权——中国人对丧失了这一权力相当恼怒，这一特权随时都有可能重返中国人手中——就让这些年幼的孩子搬离了这个不良环境，并将他们安置在一家由一位女基督徒照护的收容所。工部局为这家收容所提供资助。所有的女狱吏都被解雇了，顶替她们职位的人受到严格的监视，直至证实她们可靠为止。新狱吏把这栋肮脏的大楼彻彻底底地打扫了一遍、重新刷上油漆和墙粉。场地增设了浴室、洗衣房和医生诊室；犯人每天都需要在阳光充足、铺了水泥的院子里活动一小时，她们的健康状况因而也得到了明显的改善。如今主要是适合女性的生产劳动比较缺乏，女性除了擦走廊和洗衣服以外根本没有工作。唯一能让她们那单调乏味的生活有所转机的，是“济良所”（The Door of Hope）温柔甜美的传教士和中国的女读经员一起，挨个牢房地去唱歌、阅读和祈祷的时候。每间牢房关押四名女犯，牢房采光不错、空间够大。即使在寒冬腊月，中国人的床上也没有任何被褥，他们预计犯人有夹层外套就足够了。四五个月大的婴儿可以与母亲同住。大部分女性都是被判的诱拐罪，判刑时间最长不超过八年到十年。

债务人监狱的正式说法叫作“拘留所”（House of Detention）。其中的犯人并没有戴镣铐，可以自由走动、吸烟、玩游戏，只要不是赌博就行，而且每天有固定时段让他们在一侧的小房间见见朋友。某个冬日，这个房间的窗户和大门紧密，狭小的空间里挤满了人，空气里萦绕的烟草烟雾浓得可以用刀劈开，哪怕是朝里面匆匆看一眼——这不亚于看外国人的生活——也是值得的。犯人的寝具和食物——米饭除外——由他们自己供应，总的来说，他们好像都乐在其中，并不急着出狱。有些犯人——如果努力的话——已经藏匿了足够的钱还清债务，有些犯人的亲

戚朋友可以轻松地替他们还清债务。最近，有两名男子——一个关押了七年，另一个关了五年——经法庭认定，确实没有能力还债，便被释放了。工部局男子监狱距这有几英里远，坐落的地方更开阔。在那结实的灰色砖墙内关押了1100—1200名犯人，清一色全是中国人，外国罪犯暂时关押在与他们领事馆相邻的小型监狱里，如果该领事馆没有监狱，就关在英国监狱里面。英国监狱的纪律与维修状况都几近完美。负责人是一名基督徒，定期安排犯人参加主日崇拜，由基督教青年会（The Young Men’s Christian Association）[(8)]负责。

各式各样的生产劳动——包括裁缝、织席和木工活在内，都是大规模进行的，而且城市道路的铺设和修复工作有相当一部分是由犯人来做的。大部分男性更喜欢短期监禁，因为这对他们来说，意味着有地方住、有好东西吃、有暖和的毯子盖，还能利用最有利的条件学一门手艺。事实上，已经有许多惯犯养成了天气一冷就一窝蜂地赶去上海的习惯，目的很明显，就是在监狱里过冬。不久前就发生了这样的事情，有个中国人走进一家警局，兴冲冲地宣称，他希望自己被逮起来。“我，大坏人，”他说，“坏透了。”由于说不出任何应该在当时逮捕他的理由，他便被告知该干嘛干嘛去。但他仍不罢休，坚持说“坏透了”，想被逮起来，他走出了警局，一脸既痛苦又意外的表情。他走到街上，想着要熬过寒冬，万分沮丧。突然他灵机一动，喜不自胜，便四下寻找警察，后来找到一个，把那个警察揍了一顿。他做得很到位，很快便被另一名警察逮捕了，然后他满心欢喜地被带到了最近的警局。他冬天住宿的问题就算解决了。前些日子，关于再度用竹鞭施加鞭刑的做法是否可取这个问题备受争议。许多官员，无论是中国的还是外国的，都认为昔日会审公廨施加的这一惩罚是人道的，而且对中国犯人很有威慑力。没有什么其他惩罚措施能对降低近来攀升不少的犯罪率有如此立竿见影的效果。

以前没有少管所，那些因小偷小摸获罪的少年经常与不知悔改的罪犯关押在同一间牢房。现任负责人主张有必要为16岁以下的男孩子单独新建一栋楼，为此目的，工部局买了一栋三层高的大仓库。有些少年犯年仅9岁。“我在中国居住的时间越长，见到的贫民就越多，就越不会指责那些偷盗之辈。”一位来访少管所的基督教青年会会员说道。这些男孩子上午进行生产劳动，下午就学习、训练、玩耍。消防演习还不错，但他们最喜欢的是军事演习。训练成绩不俗的就轮流做教官。教官用英语发号施令，一群人就精神抖擞地执行号令。不服从命令的就必须用沙子擦洗木地板，有时候要擦上一整天，把地板擦得锃亮锃亮的。“你应

该去看看厨房！”一位常客对新来的说道。“地上干净得食物掉地上都可以捡起来吃！”上海有几位信奉基督教的中国商人与这儿的负责人达成协议，他们会接收一小部分从这家少管所释放出来的男生，给他们工作和重新开始的机会。

对于早先就移居上海的外国人来说，首先给他们留下深刻印象的事情之一就是需要配备足够的警力。起初，上海只有几个中国警卫，由中国和外国共同管辖。在那个时代，很有趣的一件事是，警察习惯穿着他们自己不起眼的服装，但头上戴的是外国军帽，手上拿的不是步枪，而是卷起来的中国油纸伞，然后排成一列去巡视！现如今，这座城市有230名英国警察、450名锡克族印度人和1000多名中国警察。锡克族戴的红色头巾随处可见，犹如一道亮丽的风景线。这些人虽然严苛，但确实能起到维护和平的作用。中国人怕他们。有一个长得特别高的锡克族警察，他的外国上司说：“他是唯一一个即使我不在场，也能做到和我在场时一样执行我命令的人。”他的职责之一就是惩罚失职的中国警察——让他们进行严格的体能训练，夏天训半个小时，冬天训一个小时。“这看上去很简单，”有位外国女士，一边看着那些男人，一边谈论道，“哎呀，我打网球，都比这辛苦。”“哦，不是这样的，你并没有像这样运动到每块肌肉，”主管笑了笑，“这些男人都巴望着躺下来休息。我遇过有人晕过去的，不过这人比较反常。”中国警察特别讨厌这种惩罚，那是因为由锡克族警察在执行。如果执行者是英国警官，那杀伤力就不及一半。巡警的工作在中国人中很是吃香，前来应征的人从来不缺。训练为期三个月。讲究技巧的摔跤在新手之中很受欢迎，不需要多久就能学到些真本事。警官有一套特别的方法，可以制止男人打斗。首先给打斗双方发拳击手套，禁止咬人和踢人——这是他们最喜欢的两种攻击方式，然后他们需要一直搏斗，直到他们彻底筋疲力尽。这样的经历有过一次，通常就不会再犯。

中国的营房很整洁，非常朴素。“我们时不时就要和臭虫作战，”外国警佐说，“我是不让在墙上钉钩子和钉子的，除了每张床后面钉个支架，用来挂步枪，而且这事我以后也不会再同意了，因为害虫会藏在那些角落里。”每周六，那些巡警睡觉用的木板都要用沙子和水来擦洗。沙子很快就钻进了木头上的孔隙——虫子往往就寄生在这里面，所以沙子既能做清洁剂，又能做防虫剂。如果有人要回家过一天——有时候这是允许的——待他回来时，营房必须要做特殊的清洁处理，因为他肯定会带回来一堆活生生的虫子。去年，作为中国巡警全体忠诚以及对他们寄予信任的明证，警察局实施了一项新举措，中国巡警可配备步枪。现

在他们下班后，步枪不准带回家，必须留在警局。

锡克族的招兵处与中国人的在同一个地方，但不在同一个院子。对于锡克族而言，主要的困难就在饮食方面。他们是东印度人，中国人的饮食他们不习惯。种姓制度[(9)]缺乏弹性，无论有多不方便，都必须给他们时间，让他们按自己的方式准备饮食。锡克族在执行纪律方面很严格，但其品质并不比大部分中国人可靠，其他方面亦是如此。有天晚上，一个在偏远地区巡逻的锡克族警卫按了一户外国人家的门铃。“下雨了，”他和蔼地说道，“我可以借张椅子，在你的走廊上坐会儿吗？”后来发现，不下雨的时候，他也经常寄宿在那家人的走廊上。锡克族不需要学中文，但他们如果会说中文，就可以晋升涨薪，以此来鼓励他们学。欧洲巡捕是要会中文的，他们自然是支柱。工部局为中国巡警资助建造了一家医院——该市最干净最好的医院之一；这家医院也对工部局监狱的犯人开放。生病的女犯会被送往一家女子教会医院。

如遇骚乱或其他紧急情况，上海不需要完全依赖警力，因为上海拥有一支靠得住的义勇队（Volunteer Corps），目前已有1300人。早在1853年，义勇队就组建起来了，自太平天国运动时期义勇队成员表现英勇后，他们就屡次收到求助。他们最近的一次荣誉是在1913年夏天战乱期间获得的，当时上海是交战的中心区域。[(10)]看到义勇队操练或是阅兵——除了那些年长的士兵，还有许多身强力壮的年轻士兵——外国居民觉得有了安全感，开心不已，发自肺腑地为他们的守护者骄傲，心里也感到一阵温暖。义勇队成员来自众多国家，其中有一支实力强大的中国小分队。无论何时调集中国义勇队，他们的效率和忠贞都一直处于最高水平，值得嘉许，这也进一步推动了向这支队伍的指挥官学习的呼声。在过去的一年里，有一家义勇汽车公司（Volunteer Motor Car Company）也加入了这股力量。一开始，这家公司投放了18辆私家车及驾驶人员。但实际上，若遇上十万火急的情况，这座城市所有的私家车和公共车辆都任由义勇队调遣。

上海消防局（The Shanghai Fire Department）的历史可以追溯到1866年。[(11)]三位主要成员均是工部局的职员，但四家消防公司的所有成员都是志愿者。有三个消防站和三座瞭望塔，此外还有一艘载水量1000加仑的消防艇，停泊在外滩一码头上。有三辆机动车投入了使用，为的就是尽快取代马匹。在上海这样的国际大都市里，人口稠密，各式各样的建筑林立，火灾不断，但是消防队处理得很好，重大火灾很少发生。

“为什么你寄给我的信上总是贴2美分的美国邮票呢？”一位很机灵的、爱好俱乐部活动的美国女子在给一位上海朋友的信上写道。她的困惑不足为怪，因为众所周知，就算是华盛顿的某些政府部门，寄到上海的——盖着“邮资已付”的邮戳——信封上都要贴5美分的邮票。上海拥有六家外国邮局——英、美、德、法、俄和日本——这一事实也再次凸显了这个“小型共和国”的特质。有三个国家——英国、美国和德国——已经将往返上海的信件邮资合法化。但是从上海寄往内陆地区的国内信件通常需要5美分的外国邮资，从国外寄往内陆的包裹必须要重新包装、重贴邮票，再经手中国邮局。

1878年万国邮政联盟（The International Postal Union）[(12)]邀请中国加入，以期通过此举鼓励中国成立一家全国性邮局，但中国未能抓住这一重大机遇，令人遗憾。中国最终到1914年9月1日才欣然加入。多年来，中国一直努力成立一家全国性邮局，而且在李鸿章这些思想进步的政治家的努力之下，一度好像就要实现了，但是直到1896年才真正成立。此前，邮件是经由地方控制的驿站投递的，驿站投送速度快，但非常稀少，大部分邮件是由信使投递的。如今在铁路和轮船不通的内陆地区，依然存在许多驿道，但是那些信使——经常是靠步行，有时骑骡子或是骑马——马不停蹄，一天赶的路程通常在80—90英里，这还没考虑极其糟糕的路况，更别提强盗、洪水那些困难了！上海是中国最大的集散中心，那栋红砖堆砌、牢固结实的中国邮局——就在英国邮局对面——业务量庞大。所有部门的负责人都是外国人。中国人定期就会抗议，宣称中国员工现已训练有素，可以独立胜任那些要职。但是，精明练达的中国政客意识到当前稍作变动，都势必会有重大风险，因而并不愿放弃外国人。相当有趣的是，上海最新、最漂亮的邮局大楼是日本的。除日本人以外，没有外国人当邮差。中国邮差身着整洁的绿色制服，骑自行车投递。商业区每天投递六次，住宅区三到四次。有邮差晚上10点以后投送邮件，而且一直按门铃直到有人回应为止，有户人家不堪其扰，要求如果为时已晚，则推迟到第二天早上再投送，但邮差还是一如既往，一有信件就要送。很明显给人的印象就是，邮局的规定缺乏弹性，俨然就像玛代人和波斯人的律例一样，不容违背。

工部局的所有部门之中，最有趣的大抵就是卫生部了。18年前，主管的医生来上海定居，并发起一场卫生部抗击疾病的运动，当时他并不是踩在前人的肩膀上，因为此前从未有过类似的尝试。有一位工作人员巧妙地将工部局实验室称之为“部门的大脑”。当然，这个部门要忙的事情不胜枚举。中国各地的人们都来此治疗巴氏狂犬病，但其主要工作是

预防瘟疫。瘟疫让东方不得安宁。瘟疫——首例发现于1908年——是由携带病毒的跳蚤传染给人类的，而病毒又来自感染病菌的鼠类。要防止瘟疫，就必须要消灭老鼠，这对上海这样的城市而言并非易事。这场运动就这样展开了。这座城市被划分为不同的区，区再划分为不同的分区，分区再分为街区，最后所有的区域构成了一幅地图。随后便展开了一场捕鼠大战。每抓住一只，无论是活的还是死的，均带去实验室检验。每在一个地方发现一只感染的老鼠，就在地图上的这个地方卡一根黑色的大头针。在地图上卡红色的大头针就表示该地有人死于瘟疫。通过这种方式，很快就能知道这座城市有哪些地方受瘟疫侵扰。

捕杀老鼠收效甚微，因为很快就有其他的老鼠过来取而代之，需要采取更加彻底的措施。自从工部局规定家家户户都要进行防鼠处理以后，卫生部的官员在执行这些规定的时候，就面临着更加棘手的任务。这些规定对外国家庭来说，颇为必需，但主要是针对中国住宅——经常有四五户家庭像沙丁鱼一样挤在一栋小楼里——制定的。起初，中国人对这些规定是极力反对、公然嘲弄的，但是后来便慢慢地予以赞赏。瘟疫的突然爆发让这个地区人心惶惶。几年前，上海饱受一种可怕的传染病的威胁，他们愿意暂时向一切能够消灭这一传染病、使其不再复发的东西臣服。按规定要求，底楼下面不允许有空地，先浇筑六英寸厚的混凝土，然后在上面铺设三英寸厚的焦油碎片，这样老鼠就不可能从下面潜入房子里面。卫生部的官员也向住户建议，墙体要做实心的，楼上不要天花板，就直接露出椽子。许多老房子，还有新房子，都这样去处理。有时候同时对一整个街区的老房子作防鼠处理。开展工作的时候，人们就从家里腾出去，在家前面的街道上借宿，用小炭火做饭，然后就这样耐心地蹲坐着，直到他们可以回去。但是改变需要一个缓慢的过程，反对的声音仍然存在。马尼拉取得的成功，就是一个典范——“任何老鼠可以出没的地方，都做成实心的”——值得借鉴。卫生部再精打细算，逮一只老鼠也要花2美分，但无论何时，无论是接到外国住户还是中国住户的报告，卫生部都会派工作人员带上捕鼠器，去那些住所进行灭鼠大战。大批由混凝土制成的带有弹簧盖的固定式垃圾桶——可以防火防鼠——遍布城市的各个角落。这些垃圾桶下方有一个开口，垃圾每天都要清空几次，由市政推车运走。这些垃圾桶深受中国人的欢迎，他们如今不大会把垃圾扔到地上了。

要控制传染病的病情并不是那么容易。法律没有规定天花霍乱甚至瘟疫患者必须去中国的隔离医院，只能花精力对他们进行道德说教，其效果并非总能如愿。但是，预防疾病的运动一直在蓬勃开展。每月每天

都在散发印刷的传单。这些传单是用中英双语书写的，内容涉及卫生设备、卫生条件、随处吐痰以及苍蝇蚊子的危害、清除积水以及对房屋作防鼠处理的必要性。秋冬季节，卫生部在电灯和电线杆上张贴通知，提醒路人，十六家分设机构均为中国人免费接种疫苗。卫生部办公室每周都会举办健康讲座，不仅如此，还宣传“山不来就我，我便去就山”（If the hill will not come to Mahomet, Mahomet will go the hill）[(13)]这样一则古老的谚语。这些讲座——很受欢迎——通常会吸引一大群专心致志的群众，受过训练的中国员工会在学校、茶馆以及其他人们习惯聚集的地方开讲座。他们随身携带一个晚餐铃，按铃以招揽听众，很快便招揽到了。一开始办讲座的时候，人们不了解个中缘由，报以激烈的反对。但是卫生部部长——一位圆滑老练又温文尔雅的医师——邀请了主要的商人和官员，请他们于特定的时间和地点与他会面，他亲自向他们讲述了这起运动的特点。此后，便没什么麻烦了。卫生部雇了一大批苦力来对付蚊子。他们在指定的地区成群结队工作。他们的职责就是回收陈旧的瓶瓶罐罐和破碎的瓷器，告诫居民桶、空花盆以及其他能容纳雨水的容器不要在家中乱放；较浅的水洼泥泞之地，可以通过将排水管拼凑到一起或者填满家用煤渣清除掉；在排不出的积水上喷洒煤油。卫生部时常对这些苦力的工作进行突击检查，好让他们恪尽职守。

卫生部定期检查的诸多商店之中，包括乳品店、洗衣店、茶叶店、水果店、肉店、餐厅和面包店。茶叶店的营业执照禁止店内兜售新鲜食品；乳品店、面包店和洗衣店必须每年粉刷两次，不可在店内吃睡，也不能与住宅连在一起。在面包店，口腔分泌物是禁止喷溅到店内食品上的，同样，在洗衣店也禁止喷溅到衣服上。在乳品店，工人穿的衣服必须保持清洁，挤奶前必须洗手。无论何时何地，禁止随地吐痰，也禁止雇用传染病患者。要是认为这些规定会得到不折不扣的执行，那完全就是对人性期望过高。不过这些规定具有强大的威慑作用倒是千真万确。外国乳品是最好的，但是有一家中国乳品店从未受过罚款和警告，名声之好令人称羡。工部局屠宰场（The Municipal Slaughter House）的卫生是受到严格管控的，每日对家畜尸体进行检疫。优质肉类会盖上写有“工部局屠宰场屠宰”的印戳。未感染病疫的劣质肉类会标有“二等肉”。除非盖有工部局印戳，否则肉类是不准带入租界给外国顾客食用的。

结核病是中国人[(14)]的天罚（Nemesis），[(15)]常纠缠一生。这种病在贫困的欧亚混血人群——集体群居，环境可怜——之中也极其普遍。对于这种流行性疾病，唯一的补救措施好像就是教育、教育、再教育，

现在正尽可能地做到全面有效。基督教女青年会最近做了一件好事。他们在市区一家腾空的商店策划了一次防治结核病展览，为期一周抑或更久。大部分展品是由基督教青年会借出及安排的，该会本身就正在开展一起对抗中国“白色瘟疫”(16)的运动，富有成效。

用来吸引目光和宣教的各式地图、图表、图片以及设备都布置得很吸引人，但有两样东西让人印象尤为深刻。其一是一座钟，每隔37秒便会叮当作响，很是不祥。钟上面悬挂着一个标语牌，上面用中英双语写着：每当钟响，中国就有一位可怜的受害者死于结核病。另一样东西则放在一个大型橱窗中，更为显眼，总是引来一群全神贯注、沉默不语的中国人。让他们俨如被咒语镇住的这一景象就是：一个栩栩如生的中国房屋模型里面，走出了一个中国人，这人走了几步以后，掉进了一口中国棺材里，然后瞬间便消失了。这种情况每8秒便会发生一次，每减少一口棺材，就代表着在这世上的某个地方，有一个人死于结核病。

1898年以前，事实上还没有卫生部，也没有卫生运动。如若有时感觉进步缓慢，那只能回首过去，才能意识到过去的十五年已经有了多么非凡的改进。或许，上海之所以有资格号称“模范租界”，更多的就是因为工部局的卫生部而非其他部门。工部局中央建筑群——在这座城市的中心地带占地一整个广场——是远东地区同类型设施中的佼佼者。

---

(1) 此处应指1869年英、法、美等国擅自在《上海英法美租界租地章程》基础上修订扩充的《上海洋泾浜北首租界章程》。

(2) 治外法权，指一国国民在外国境内不受所在国管辖，如同处于所在国领土以外一样。19世纪，西方列强曾经在中国、埃及、日本等国，以这些国家没有能力作出公正审判为借口，采取强压的方法保护侨民单方面的治外法权，肆意践踏所在国法律。

(3) 应指1901—1911年间清政府颁布制定的各项法令，辑有《大清新法令》一书。—— 编者注

(4) 近代帝国主义国家在中国设立的司法机关，1864年起在上海等地租界内设立，在最初，涉及外国人的案件由中国法官开庭，各国襄审员陪审，或中国法官与各国领事会审，1912年后法官由领事团委任，中国司法主权被严重侵犯，1927年撤销。

(5) 原文如此，应为1864年。

(6) 锡克族是印度旁遮普地区信仰锡克教的民族。

(7) 所罗门是古代犹太王国的国王。《圣经·旧约·列王纪》称他有超人的智

慧。

(8) 基督教青年会是全球性基督教青年社会服务团体，已有上百年的历史。

(9) 种姓制度是曾在印度、孟加拉国、斯里兰卡等国普遍存在的一种以血统论为基础的社会体系，以统治阶层为中心，划分出许多以职业为特征的内婚制群体。

(10) 应指1913年爆发的“二次革命”。

(11) 1866年，在工部局董事小海斯建议下，成立了上海第一泵浦车队，即近代上海最早的消防队。—— 编者注

(12) 万国邮政联盟，简称“万国邮联”或“邮联”，是各国政府间商定国际邮政事务的国际组织，其前身是1874年10月9日成立的“邮政总联盟”，1878年改为现名。1947年成为联合国的专门机构。

(13) 出自伊斯兰教典故。

(14) 原文为Chinaman，这是带有蔑视、种族歧视的用法。

(15) Nemesis，涅墨西斯，是古希腊宗教中对那些在神面前傲慢无礼的人施加惩罚的女神。

(16) “白色瘟疫”，即结核病，又称为痨病。

第三章　街道之漫谈

“我在中国生活了将近二十五年，就没哪次上街看不到新奇有趣的玩意儿。”一位活泼可爱的传教医生向一群新来的人大声说道。她的这番言论说的是北京，但上海的户外生活有其独特的魅力。

首先，在公共租界根本没有所谓的“街道”，只有路。不可否认，有些偏僻的小路太过狭窄、太短，并不能美其名曰为路，便称作“巷弄”，这座城市拥有一条“百老汇大道”，或者准确地说，叫“百老汇路”。[(1)]无需多言，这条路位于本来租借给美国人的地区内。上海的百老汇并没有附庸风雅地在外观和地位上仿效其西方原型，[(2)]不过在这条路尽头的商业相当发达。

第一个永久性的外国人居留地位于外滩附近，从英国领事的办事处及其住宅开始。壮观的外滩——一侧是赏心悦目的银行、俱乐部、汽船和保险大楼，另一侧是黄浦江——这座城市的骄傲与荣耀。很难想象，这样一条宽阔洁白的道路，一派喧闹繁忙，豪华汽车呼啸而过，曾经不过是一片沼泽沿岸有人出入的纤道。从南面起——横跨一条美观的林荫大道，这条大道是从此前一条臭气熏天的小河迅速蜕变而成的——便是法兰西外滩（The French Bund）[(3)]及其码头和仓库，毗邻中国外滩（The Chinese Bund）。[(4)]

中国外滩的特征要素在于其船只之多。小船——叫作舢板——外面捆着一层矮矮的拱形竹垫——沿着岸排列，可以超过半英里远，一直排到江里。每一只舢板都俨如一个蚁冢，熙来攘往，生机勃勃。使用这些船的人便是永久的住户，他们的居住地是固定的。他们当中有许多人原先是从北方过来的饥荒难民。大部分男性在码头做苦力讨营生。他们的妻子则收集破布纳纳鞋底，给那些没有家人的苦力修补穿旧的衣物以赚取些许现金，贴补家用。木桩上的木板是连通船只与岸边的步道，刚学会走路的小孩子在最窄的地方任意地跑来跑去，但很少会跌落水中或跌进烂泥里。生孩子、婚礼和葬礼让渔民的生活多姿多彩。通常有两三口空棺材分散地放在码头上，以备不时之需，同时，也可当长凳用，特别是女性做针线活的时候。

江边的英租界外滩没有建筑物阻挡——海关码头段除外——而且还规划了小片的草坪，草坪从外白渡桥附近渐渐拓宽，直至公共花园

（The Public Gardens）。[5]位于市中心的这座精致的小公园——园内有草坪、鲜花、树荫以及著名的工部局乐队夏季演出所用的音乐台——是疲惫的行人最爱的休息之所，也是父母、保姆的溜娃之地。中国人——照顾外国孩子的保姆除外——除非穿着外国服装或由外国人陪同，否则是不准进入公园的。海关码头见证了许许多多激动人心的场景。修长的机动舢板载着出境的乘客，顺江下行12英里，抵达越过“沙滩”[6]停泊的远洋客轮，再载着入境的乘客沿江上行。上海的避风港回荡着欢声与哭泣，见证着悲伤的离别与喜悦的相逢。

目前，江面宽半英里，一幅勃勃生机的景象。各类船只——从业务繁忙的舢板到空载的海船或军舰——在江面上漂流。无论是置身正午的阳光之下，还是繁星点点的星空之下，观赏江面反射出的万千闪烁银光，对居民和游客而言都是一件未曾让人失望的乐事。

上海最美丽、最主要的商业街是南京路，或者正如中国人所称的“大马路”。不过，“大”字并不是修饰“马”，而是修饰“路”字的，这条路上有许多马在奔腾，大部分马都是脚力快的蒙古矮马，早晚都能听到得得的马蹄声。实际上，这年头汽车已经无处不在，上海已有800多辆，“大马路”这个名字让人觉得相当不合时宜。南京路以外滩的汇中饭店（The Palace Hotel）[7]为起点——沿着昔日一条小河弯弯曲曲的河道延伸——以跑马场为终点。外滩以西不远处主要是外国商店——这里是这座城市最大最好的商店所在。后来，这条街拓宽，变成了一条集聚中国高档商店的大道，其中许多店都飘着国旗，而且所有店都在高空中陈列出一块具有特色的黑金色垂直招牌。在阳光明媚的日子里，无论是哪个方向的景观都非常耀眼，尤其是在晚上，从街头到街尾都灯火辉煌。大批往返于剧院和茶馆，或者只是出来散步的中国人，在人行道上相互推搡，差点儿就被飞驰而过的车辆撞到。到处都是中国的“街头女郎”，很惹眼，或者更确切地说，是女孩子，几乎每一个年纪都小得可怜。她们佩戴着珠宝，打扮得花枝招展的，有时站在炫目的灯光之下，不过往往是站在阴影之中——（背后）大门紧闭，有时站在巷道的入口处，她们通常是成群结队的，由一位充当“业务代理”的年长女子照看。南京路最著名的时刻是周六下午五点到六点之间，那时整座城市好像都在为了追求快乐而游荡或闲逛。刺耳的嘈杂声夹杂着黄包车车夫的吆喝声以及汽车的喇叭声，不绝于耳。这样的场景展现了上海的全貌，不乏乐趣，这几乎是中国其他地方复制不了的。

有位在上海的英国人曾经说过：“有两样东西，英国人缺不得，国

王和跑马场。”上海跑马场与公共娱乐场（The Public Recreation Grounds）相邻，位于市里房价最高的地段，占地约达66英亩。这块土地是几年前买进的。在那样的地段，那样大的一片空地，今天是无论如何都不大可能拿下的。

静安寺路（Bubbling Well Road）[8]是上海“贵族区”的代名词。静安寺路是南京路的延伸，以这条路尽头用矮矮的水泥墙围起来的涌泉命名。涌泉附近是外国公墓——这地方又荫凉又宁静。每年5月30日，美国人聚集在门内，举办全国性的悼念活动。他们代表所有的信仰和职业——商人和传教士、游客和冒险家、遥远彼岸的外侨，他们都热爱同一面旗帜，进而被召唤到一起。上海义勇队中的美国军人，以及停泊在江边的美国巡航舰上的“正规军”，手持军号和笛子，从外滩行进至此，在撒满鲜花的坟墓前敬礼。其中一些坟墓可以追溯到六十多年前。

静安寺路上，有些最美观的住宅为中国富人所拥有。在惬意的下午和晚上，许多汽车在这条宽阔平坦的道路上来来回回、飞驰而过，驶至宜人的郊区，许多郊区都挤满了嬉笑玩乐的中国人，有男有女。

在法租界，那条曾叫“宝昌路”（Paul Brunat）的大道——以首任法国领事名字命名的，自战争爆发后，便改名为霞飞路（Avenue Joffre）[9]——与静安寺路不相上下，住宅典雅精致，有些人喜欢这些住宅，是因为这里的建筑风格更加多样。作为一条新建的大道，宝昌路在某种程度上绿树浓荫不足，雅致古老的花园欠缺，而这些正是静安寺路的主要亮点。经常有人向外地人指出，这条路是上海为数不多的长马路之一，同时也是一条直马路——总长两到三英里，大部分路段几乎都是没有急转弯的。

“油水区”（tenderloin district）[10]以南京路和福州路（Foochow Roads）为中心。后者是一条狭窄的街道，乍一看没什么吸引眼球的，男士一提便摇头，女士若可能都绕道。这一区域的特质在于其茶馆的数量及特色。直接从街上就可进到茶馆里面，有一段宽敞的楼梯通到二楼的饭馆，底楼是用来做生意的。楼房的前面还有侧面——如果恰巧是在拐角的话——都设有游廊，天气温暖的时候是个很吃香的聚会场所，有闲工夫的人们可以一边聊着天、抿上一小口茶或酒，一边赏玩楼下街道上发生的一切。这些茶馆——通常都采用精雕细琢的南方黑檀，陈设得富丽堂皇——事实上都空寂无人，要到晚上，顾客才接踵而至。那时，所有餐桌都已满座，中国音乐家演奏着外国人听来就是一堆不协调和弦组成的曲调，声音划破夜空。到晚上九点或十点的时候，一切都热火朝

天，灯火透明的房间里座无虚席，一小列年轻的女孩子疲惫地、慢慢地走着，在方桌中间进进出出。基本上每一位都颇有姿色、非常年轻。她们身着丝绸或是绸缎，佩戴着珠宝，脸上搽着造作的脂粉，跟在每一队的女主事身后。这位女主事时不时地会停下来，巴结讨好，促使顾客注意到她照管的女孩子，详细述说她们的优点。如果有女孩子被选中了，她便让那个女孩子独自行动，转而照管其他人。众多受害人未曾犯下任何过错便被变卖成奴——当时她们年纪尚小，无法抵抗，婴儿时就被贩卖的都不罕见——持续被困在茶馆那闷不通风的环境中，随时恭候着与寻乐之徒玩乐。街外面，依然有为求谋生的妇女——有坐黄包车的，有步行的——趁着深夜生意萧条之前源源不绝地赶到茶馆。

在公共花园对面——苏州河（Soochow Creek）与黄浦江交汇处——矗立着三座极为靠近的领事馆，三国国旗在旗杆上迎风飘扬。它们代表日本、美国和德国，其他国家领事馆占用的是静安寺路上那些宽敞的公馆。正在建设中的、位于德国领事馆旁边的俄国新领事馆不久即将竣工，将大大增加江畔的观赏性。百老汇街角的对面是上海最古老的旅店礼查饭店（The Astor House）。[(11)]这一区域——昔日属于美国租界，如今称作“虹口”（Hongkew）——名声并不是十分好，不过有些家境最好的家庭依然在这一地界内居住。但是对虹口菜场（Hongkew Market）[(12)]——目前是这座城市最大最好的菜场——却说不出任何贬损之辞。据悉，几英里外的静安寺路上的管家，有时会派他们的厨子去虹口菜场，而且会叹惜他们不能每天都去。考文特花园市场（Covent Garden Market）之于伦敦，就像这一菜场之于上海。“熟悉某座城市最快的方式之一就是去参观这座城市的市场”这一说法，在这个地方也非常适用。清晨，花上一两个小时，穿过或是慢慢挤过各国人聚集的嘈杂的广场，其价值不亚于一本提供普通资讯的入门书。这家菜场覆盖了整个街区，地面铺着水泥，用木椽撑着青瓦屋顶，一直注水以保持鱼类和蔬菜新鲜，保持摊位清洁，而且负责这些摊位的人非常正派。女人不比男人多，但她们想方设法地让自己有存在感，尖声地讨论着干粮及价格，声音盖过了众人的嘈杂和喧闹。没有摊位的小贩们排在人行道上，蹲在他们提来的菜篮旁边，在卖菜的间隙抿上一小口茶，或是使用旧筷子，大口大口地吞下热腾腾的米饭和豆腐。在这里，货币兑换商的桌子——拉着坚固的电线网作防护——零零落落、到处都是，因为“小钱”总是必不可少的，大而重的铜板和“现钞”是最显眼的。

杨树浦路（Yangtsepoo Road）——意指“白杨—滨江路”（Poplar-Tree-Shore Road）——是百老汇路的延伸段，这条路上主要都是工厂，

因此其社会地位较低。这条路与黄浦江平行，本应该是一条适合居住的——上海市颜值最高的——林荫大道，但不知为何，先在那里建了工厂，之后便别无选择了。日复一日，工厂的工人困于砖墙之后，疲惫不堪，无暇领略这清新的微风和典雅的景致。

这座城市里最长最出名的街道之一——此外并无其他特质——就是四川路（Szechuen Road）。[(13)]四川路起于华界，沿苏州河至北四川路，[(14)]然后至北四川路新筑路段（North Szechuen Road Extension），一路向北，曲曲折折，直至虹口公共花园（Hongkew Public Park）界外——顺便提一下，这个公园根本不在虹口。这个占地45英亩的公园是上海面积最大的公园，对于夏天还留在这座城市的外国人来说，确实是一个天赐之物。清晨和傍晚，那些住在附近的人来这儿打高尔夫和网球，确保有足够的运动量，以适应这样的东方气候，保持健康；晚上，从四面八方来的人在这儿休息，听乐队演奏。沿着这个公园的最北边——在公共租界界限以外——也就是四川路而行，路线宛若一个螺旋开瓶器，来来回回，蜿蜒曲折。有些人说，这条路是沿着一条老的水牛小道在走，但是大多数人都认为，这条路之所以会弯弯曲曲，是因为原来的中国业主不愿意出售他们的土地，因为这样做可能会有损他们的“好运”。或许，有些年深岁久的坟墓挡了道，活着的人虽然对这些坟墓并无半分感情，但他们唯恐冒犯亡灵，不准迁坟。又或许，附近一带令人闻风丧胆的阴间鬼神，对于在其地盘之上铺设道路这样的创新之举感到愤恨，这样做可能会激怒它，自然是万万不可的。因此，筑路工人便不得不遵循妥协后——而非他们首选——的线路。外国人在此施工，普通民众——由于迷信——心中十分畏惧，关于此事，法租界的卫理公会[(15)]教堂便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多年前，建造这家教堂之时，附近的中国人惊慌失措。他们的守护神遭到触犯，此刻会发表何种言论，采取何种行为呢？在这家外国布道所上方徘徊的邪灵，会将苦难施加于他们，以示惩罚，而他们要如何逃脱呢？最终，惶恐度日的居民忽然想出了一个皆大欢喜的计谋以骗住这些恶灵，似乎还颇为灵验。如今，无论谁去到那个角落，都可以看到教堂对面的房子屋顶上有两个长颈瓶，指向教堂。这两个瓶子——正如最愚蠢的人所猜测的那样——象征大炮，好像一旦有人带有攻击性地瞥一眼，它们就会喷射火焰，将其摧毁。

上海有许多人来人往的街道都比较狭窄，不太便利，而且几乎都没有人行道，以致行人也不得不走在公路上。不过，早期的居留者在设计外国租界之时，就街道是否需要25英尺宽一事，几近争执不休，有些人

认为完全没必要。至于人行道，显然根本就没考虑到。工部局现已颁布法令，邻近街道的建筑一旦拆除，新建筑必须要后撤几英尺，不惜一切代价。这项严格执行的法令使得这座城市的外观和舒适度逐渐有了较大的起色。在上海，外国租界内的所有街道都铺上了砖石。有许多是碎石路，不过人们发现，在只有中国人居住的地区，在混凝土和焦油铺设的地基上铺碎屑更合适更合算。道路需要时常维修，因为土壤是淤积土，无数的重型手推车和卡车使得路况急速恶化。有几条街道，特别是外滩和南京路，已经铺上了所谓的永久性路面——在混凝土路基上铺上木料和石块。如果公共资金足够充裕，所有的街道都铺成这样，对城市而言是一个福音，对民众而言亦是一件喜事。

令人意外的是，只要下几个小时的雨，这些街道就会变得泥泞不堪、不合人意，赶上滂沱大雨，低洼地段便积水成灾——尽管下水道设施已经很完善。街道变干的速度之快同样值得注意。差不多是雨势一停，洒水车就出动了，以免尘土飞扬。工部局的街道清洁工总是忙不停。他们统一身穿鲜红色的棉衣，下面配着褪色的蓝色长裤，头戴一顶宽边草帽，帽子上系有一条宽宽的红色棉带，棉带和上衣都印有三个大大的字母：S. M. C（上海工部局的英文简称）。每个清洁工都配有一个竹簸箕和一把用芦苇扎成的小扫帚，他们拖着它们——如老牛拖破车似的——清扫垃圾。垃圾并没有浪费掉。事实上，在中国几乎没有任何一样东西会被丢弃掉，而且，也没有地方可以丢，因为所有的土地都播种了庄稼。工部局将街道上的清扫物用来施肥或填充洼地。就在这儿，横断上海的河流便证实了它们的实用性，这些废弃物经由镀锌的推车倒入了当地的小船上，不费什么成本，便摆渡到了需要的地方。上海离不开这些感潮河——虽然退潮的时候，这些河流经常令人作呕。

上海是一座反差极大的城市。奢华的静安寺路上，雅致的房屋、俱乐部会所和私人酒店林立，“屠夫、糕饼师傅、烛台匠人”遍布的小店铺却也混杂其中。在时兴的花园前面，有精彩绝伦的“明星”游行，展示他们的突出“装备”，其一就是色彩斑斓的大型纸龙，开开合合的龙下颌以及扭动的带鳞龙身——由舞龙的人们用巧技操控——逼真得可怕。在南京路最繁华的地段，有一条几码长的不起眼的通道，通向一家积满灰尘的佛教寺庙，这寺庙好似与街道上喧嚣的人群和熙熙攘攘的交通相距甚远，仿若天各一方。偶尔有信徒不声不响地走进去，对着已然变黑的祭台鞠上一躬，祭台上的蜡烛滴着烛油，香火一直在熏燃着。偏房里——犹如但丁的地狱之门（Dante’s Inferno）一般阴暗——安放着几排黑色的神像，神像上涂有一条条的镀金和油漆。这一景象让人反感，有人一

副解脱的模样，求助于僧人——这些僧人剃着光头、穿着暗灰色长袍、在院子里懒洋洋地闲荡。

上海最为现代化的街道有时会发生一些稀奇古怪的事情。下述内容为目击者描述：有位中国老太太，把她所有的冬天衣物都穿在身上，试图从迷宫一般的车流中间横穿闹市区的一条街道。离人行道约十码处，一辆有轨电车径直撞到她的胸部，利利索索地将她在轨道上推得更远，然后又有一辆车撞到了她的后背。第二辆车撞得她踉踉跄跄，倒在了一个黄包车车夫的脚下——车夫拉着一位从市场回家的中国厨师，车上有许多蔬菜、火腿和两只活鸭子。其中一只鸭子与老太太精心制作的头饰缠在了一起，不断扑打着双翅，待老太太把鸭子拉扯出来，车夫用他那脏兮兮的袖子将火腿擦干净，各种交通工具——汽车、手推车以及四轮单马马车——早已堵在路上，其后花了好几分钟的功夫，才将这起麻烦事的肇事者安全地送回她出发的地点。

法律规定，严禁乞丐侵扰外国租界，但是执法不严，乞丐——残疾人包括瘸子以及盲人——数量太多了。一些父母会将自己年幼的孩子困在一口很深的、原用于盛水的陶器之中，以此使孩子致残或是使孩子的身体扭曲变形，就为了让他们能够成功乞讨。然而，那些“盲人”的眼睛有好些都是看得见的，穷困潦倒的人经常会在贴身处藏一小笔钱，足够让他们安度余生。在上海，乞讨是一种职业——和其他职业一样——有乞丐行业工会和乞丐阵营，一伙乞丐聚集于此。晚上五六点左右，看着他们将白天的收入妥善地藏在他们脏兮兮的身上，然后成群结队地回到他们的芦席棚舍，是一件让人印象很深刻的事。从前设有丐帮帮主——穿着虽破烂，却如同皇帝一般尊贵——帮主与一群同僚一起制定规则、裁定案件等等，但近年来，这一组织已经没那么完整了。一般来说，外国人是不会在街头行善的。不过，有些仁慈之人，一抵达上海就决定，不吝施舍是他的义务。结果，没过多久他们就不敢冒险走出家门，因为生活都变成了负担，直到彻彻底底地改变了此前的习惯为止。

在外国租界居住的中国人大多住在远离公路、与公路垂直的小巷道里。这些巷道仅有15或20英尺宽，不准车辆通行，路面铺上了水泥，有的脏兮兮的，有的从某种程度上来说算干净的，要视地区和社区而定。房子几乎都是一模一样的，除了有些房子有两间客厅，一上一下，有些有四间，其中几间很小的在后面。屋前是一块小小的空场地，用水泥墙砌起来了，通向二楼。水泥墙——这堵墙虽起到了防护之效，却也挡住了光线和空气——留出了一扇宽宽的双开门，通过这扇门可以进到房子

里面。连接青瓦屋顶的长椽在两端都形成了不失优雅的倒三角墙，这是中国人极其钟爱的。粗糙的手绘以及手工雕刻的木制品通常是最穷的中国家庭所采用的装饰。这类房屋每月租金平均约15美元。这些长长的窄巷，仿若是主干道上裂开的大缝，若俯视，明显有种阴沉沉的效果，因为灰色的外墙将房子的正面和小院落遮挡住了——这儿通常栽种了棕榈树和鲜花等植物，以显得更有家的感觉、更有吸引力。正是这些人为因素，使得这些人烟密集的小巷不至于丑陋不堪。这些小巷生气十足，只不过通常是不得安宁、尖锐刺耳、完全失控的，以致条件好一点儿的中国人抱怨此地太过嘈杂，大多数外国人则觉得根本无法在此居住。

---

(1) 百老汇路（今大名路，1943年10月10日改现名），坐落于外白渡桥旁。

(2) 这里指的是美国“百老汇”，原意为“宽阔的街”，指纽约市中以巴特里公园为起点、由南向北纵贯曼哈顿岛、全长25公里的一条长街。而今百老汇大道是美国现代歌舞艺术、美国娱乐业的代名词。

(3) 自上海开埠后，外滩被英租界和法租界占据，并分别被叫作“英租界外滩”和“法兰西外滩”。

(4) 中国外滩，即外马路，为防止法租界侵占黄浦江滩地，清政府修筑此路，1897年完工。—— 编者注

(5) 即外滩公园。

(6) 沙滩（bar），或沙洲，指河口、港口等处妨碍航行的地段。

(7) 原名“中央饭店”，1906年拆除重建，1908年营业，更名为“汇中饭店”，位于今中山东一路19号，现在是和平饭店南楼。

(8) 直译为涌泉路，今南京西路。

(9) 霞飞是法国元帅，第一次世界大战初期的法军总指挥。霞飞路即今淮海中路。

(10) 油水区，指城市中以奢靡繁华、警察可从中大捞油水而闻名的区域。

(11) 礼查饭店是近代上海的主要外资旅馆之一。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改名为浦江饭店，位于黄浦路15号。

(12) 上海著名菜场，建于租界时期，又名“三角地菜场”。

(13) 四川路是上海公共租界的一条南北向干道。今为四川中路。

(14) 北四川路，1946年更名为四川北路。

(15) 卫理公会，基督教新教卫斯理宗教会之一，创立于18世纪，1939年由美以美会、监理公会和美普会重新合并而成。

第四章　店铺之魅力

从前，有位美国传教士带着10双靴子来到中国，足够他穿到休假了。鉴于他要前往内陆地区，此番准备无疑是明智的，不过皮革在“雨季”损坏得很快。直至近日，内陆地区的外国人依然要完全依赖他们本土制造的商品。如今，他们向上海输送的物品越来越多，而上海人几乎没有向国外输送过任何东西。有位伦敦迷曾激情澎湃地谈道：“伦敦是一座宝库，凡是伦敦所没有的原品，在这里都可以铸造出来。”如是，也可以这样说上海：“凡是没引进的，上海都会仿造。”中国人是精于仿造的能手。以女装裁缝为例，把某本时装书的某张照片拿给他们看（他们中许多人本身就订阅了时装书），他们便能按样制成，即便不是完全精确地复制，也是极其接近的。上海有四家外国百货商店，全都在南京路，统一受英国人管辖。这四家店特别受女性欢迎。还有许许多多的小店，各个国家的都有，大部分都位于南京路或其附近，百老汇路也有。英美品牌鞋店Walkover是很有用处的，对移居至此的美国北方人来说尤为如此。有几家巴黎人开的商店，在平板玻璃后面陈列最新设计的礼服、帽子和女式内衣。有家德国药店享有城里唯一出售美国派德药厂（Parke, Davis ＆ Co）制药的美誉。夏天，有家英国药店出售冰淇淋苏打——这是上海最近的创新——经常有人光顾。白昂其（Bianchi）冰淇淋很有名，莎莉文（Sullivan）的手工糖果也是。赫尔勒（Hurler）和吉百利（Cadbury）[(1)]巧克力在许多柜台都可以购买，包装非常精细，虽然是越洋运输，也没有丝毫影响。有两家钢琴店帮钢琴调音准，除售卖施坦威、查克林以及其他品牌以外，也出售自家工厂制造的、特别参照中国环境的乐器，利润丰厚。东印度和日本商店总是很有吸引力——日本人受中国人抵制时期除外。当两国的信任和贸易关系有所恶化时，有些日本人——和阿拉伯人一样——开始卷起铺盖，准备悄无声息地离开。

众所周知，上海的生活成本是比较高的，不过这主要是与中国其他地区相比而言。市场状况一年四季都不错；许多有资质的内行人都坚称这儿举世无双。中国的牛羊肉每磅售价8至9美分，猪肉和牛犊肉要稍微贵一点点。野味众多。市面上出售的蛋，每一打的售价很少会超过10美分，不过，这些蛋要比土鸡蛋小得多。正如预料一样，鱼类资源非常丰富。小品种的牡蛎是一道绝佳的炖品，都是批发出售的，带壳的大牡蛎

通常有几英寸宽，重量在一磅以上，每只10到12个铜板——6美分左右。西方市场所熟悉的各种水果蔬菜以及东方特有的诸多品种，这儿几乎都有。外国人大多都特别喜欢吃竹笋和荸荠，中国人也喜欢。西柚是从旧金山进口的，但是，普遍不及与之相似的本土柚类品种受欢迎。芒果是从菲律宾运过来的，从日本、澳大利亚和美国运来了苹果，比中国种植的要好得多。不过，中国的橘子口感极佳。秋天最常见的果实要数金灿灿的柿子。一大片的柿子，令人垂涎——价格便宜，味道甘美，没有一丁点褶皱，除非还没熟——仿佛是沐浴在阳光之中一般，当季时无物与其争锋。所有进口的罐装和瓶装商品——蔬菜、水果、泡菜、橄榄、糖浆、萃取物——价格都不便宜，但是这些东西大体上都处于奢侈品行列，大多都不在必需品之列。

上海有一家罐头食品厂，于1907年由一家广东公司创办。人们都料想这是广东人开的，因为中国数南方人最精明。这家食品厂除了制作各式薄脆饼干以外，还出产大量的罐装食品。其中包括竹笋、虾仁鸡蛋、五香烤肉、栗子鸡、田鸡腿、国内外的水果、汤品以及特别合外国人口味、口感极佳的糖渍姜片——广州的姜片可是饮誉五洲的。

药品价格很高，而且那些经常用到的物件——例如挂画所用的金属线和铁钩——不知为何，价位也高得离谱。

百老汇的“萨姆·乔”（Sam Joe）号称市里一流的中国杂货商。这一家当然算得上是名气最大的几家之一。和其他杂货店一样，除了苹果和柠檬，他家不存放新鲜蔬果。地方干干净净的，很吸引人，由一众级别各有高低的店员打理。那些风度翩翩、具有学者气派的中年男子，每一个都乐意屈尊至此采购商品、议论商品的优点，如果是在视线范围以内的东西，甚至还会指出来。但如果是要包奶酪，或是要从架子上拿瓶子，他会高傲地挥一下他那只指甲留得很长的手，示意随从过来，随从便忙不迭地赶过来提供这项不需任何技巧的服务。萨姆·乔以前有一辆汽车，车后面烫印着几个大金字：“上海一流杂货店萨姆·乔”，很是显眼。汽车在街上不足为奇已经有些时日了，但保养费用太过昂贵，因而商行又恢复使用一般的四轮载重马车。不过，马车对这座以人工劳力为主的城市而言，已经非常难得了，中国大部分杂货商对人力三轮货车已是十分满足，而萨姆·乔的装备比他们又要先进。

阳光明媚的清晨，没有什么比去南京路来回闲逛、对各个商铺细细考察一番更令人开心的了。有些中国商铺和外国的商店一样，大门和橱窗锁着，其余的则是依照中国的运营规矩，整个门面都是朝街道敞开

的。有时，除了平常的十字路口以外，建筑物中间还会有一条狭缝，通往狭窄的里弄或是小巷——没有人行道、又长又窄、十分吓人，不过对那些流浪者而言却有不可抗拒的魅力。南京路上的商铺几乎一律都是两层高，上面通常建有高高的花式檐口，视觉上好像有三层。最引人注目的要数一众银器店铺了。几家店铺的正面采用彩色的拉毛灰泥粉饰的浮雕，风格大胆，十分醒目。有个浮雕上面是一只非常巨大的开屏孔雀，色彩绚丽，光彩夺目。另一个上面是两个神话人物，在一大瓶色彩艳丽的鲜花两侧自娱自乐，而第三个——不久之前用朴素的砖头砌成的——上面是用星罗棋布的电灯泡作点缀的。逢上节庆，这些商店——以及其他有能力的店铺——在夜晚将精心制作的电气设备全部打开，灯火通明，使得南京路成了这座城市里灯火最辉煌的一条街。此外，遇到开幕式或是周年活动，商店习惯将色彩艳丽的棉布或丝绸扭、抽、折，再卷成玫瑰形饰物以及其他的出挑图案，以此来装饰整个门面。这些装饰物通常都不是固定在墙上，而是在店铺前面竖一个轻便的竹脚手架。待这些装饰物被晒褪了色，便将它们取下，重新染色，再挂回原位。至于那些未被“洋化”的银器店，紧贴橱窗的位置放了玻璃隔板，一层接一层地摆满了银器。除了酒杯和糖果盘之类的小件没那么奢华以外，许多都是压印浮凸图案的大件，极尽富丽，比如佛像、花瓶、珠宝盒、套装茶具，清一色全是本土设计和制造。走进店内，出乎外国人的意料，没有展示柜，也看不见银器，只能在木制或是金属制格架的玻璃门后面看到一丝微光。侧面的镶板镜子和雕花的黑檀木椅营造出了客厅的效果，一众店员或是悠闲地四下走动，或是慵懒地倚靠在柜台上，更是凸显了这种效果，仿佛那些店员的人生目标就是摆弄姿势，为雇用他们的商行充当无用的摆设。然而事实上，盈利的买卖每天都在进行，不过可能是经过东方特色的细细斟酌，在推杯换盏之间，便悄无声息、不事张扬地进行了。

中国最受欢迎的肉类是猪肉，俗称“大肉”。从售卖腌火腿的商店数量来看——店内通常什么都没有，只有火腿，有一排排挂在墙上的，还有悬在天花板上的——好似这里人们的饮食都离不开猪肉。南京路的猪肉店非常干净。有时候店铺一端卖火腿，另一端卖鸭子和甜食。烤鸭在上海到处都买得到，鸭脖掰成了一个圆环，以此将这种家禽挂在竹竿的钩子上，竹竿有几英尺长，就挂在店铺门前，路过的行人无不驻足凝视，其间没有任何橱窗可以让这道美味佳肴黯然失色。烤鸭光泽鲜亮、色调深赭，中国厨子用烤箱烤得恰到火候，看起来着实好吃。心怀好奇的陌生人如若婉转礼貌，或许可以在离街上几步之遥的一个光线昏暗的

房间里目睹为集市供应这种家禽的工序。这个狭小空间的一端是活的鸭子，圈在围栏里，而近旁厨师的下手则忙着给宰杀掉的鸭子拔毛。鸭子首先在架着大铁盆的中式火炉上烤，然后便是烹调过程的最后一步——上色。在麻油中加入少量的红色蔬菜汁液，厨子用芦苇刷蘸上这种调汁，小心翼翼地在这只家禽上涂抹。鸭肉接触到空气，很快涂层就变硬了，犹如清漆一般，除了使外观让人垂涎欲滴以外，也可使鸭肉不受路面灰尘的影响。

没有什么比在街旁烘焙的面包房更诱人了。中式火炉本身非常简单，在砖块或水泥和铁格栅的基础上铺上一层木炭，炭灰会从格栅落到底部。在烧得火红的煤炭上方放一个容积虽大但比较浅的铁盆，里面炸着或煮着各式各样五味俱全的食物。常言道，全世界最好的厨师是法国人和中国人，这一点并不难以置信。许多平常的中国人将面团滚一滚、揉一揉，熟练敏捷地翻转捻搓，塑造出精美的形状，然后将其煎成恰到好处的棕色，整个过程无需花费片刻的心思和努力，这证明他们在自己的领域可谓设计出精美佳肴的艺术家。

老老少少的顾客经常光顾面包店，有时会带上自家的饭碗，花几块铜板，买上一整碗营养丰富的食物带回家——有可能是解决全家人温饱的一顿饭。有时会有个拿着一套木制托盘的女子走进去，对店主言语了几句，店主便开始将精美的小蛋糕放置到托盘里，每一块都插上了一小簇假花，这一精选的可口之物是婚宴的一部分。一年四季，每天特定时段——清晨更甚——妇女和儿童便手提水壶，慢吞吞地走去饭馆，买热水泡茶。热水价格比燃料要便宜，而且买热水还省得麻烦。

中国的糖果店向来不愁没生意。南京路上的那些店常有外国人光顾，有些种类的糖果是入口即化的。开怀畅食的唯一缺点就是，后来发现这些糖果常常并不是储放在玻璃柜台下，而是在开放的柜台上放置了数小时，染了灰尘、苍蝇叮过、脏手碰过的。

茶叶店的橱窗里可以看见产自杭州的上等茶叶，用精美彩色纸盒包装，旁边摆放着其他装有小颗干花的精致盒子。将一朵抑或更多的干玫瑰花苞放入一盏茶中，茶饮便被赋予了一种清香味，而且据中国人所言，有助于消化。这些都是奢侈品，仅供经济富裕、讲究饮食之人享用的。但是，这一阶层人数众多。

丝绸店是上海分外受欢迎的店铺，因为令上海闻名遐迩的商品首先就要数丝绸。许多丝绸店开在南京路上，规模最大最耀眼的店铺设于外

滩一栋三层楼的建筑物里。但是有两家店铺位于这条繁华大道以南的一个街区，声誉良好，质量可靠，生意做得红红火火的。这两家和南京路上的那些店铺一样，橱窗里都没有陈列商品。更显眼的那一家在每块平板玻璃后面的展位上都摆放了一盆盆栽。马路对面的另一家则不屑于摆放如此繁多的装饰品。这家店的窗户小小的，是那种老式样，合拢起来就像是装了小格窗玻璃的百叶窗一样，每块玻璃上上下下都钉有防护性铁条。

贵族店铺老介福呢绒绸缎店（Laou Kai Fook）[(2)]名扬四海，无需广告。邻近商号可能还在炫耀自身拥有几十年的经商历史，而这家店铺的创办历史已可以自豪地追溯到75年前。这家店铺外观上并无吸睛之处，但是店内让你掏腰包的商品却是丰富多样。老介福的店员严肃庄重，精明得很。如果有潜在的顾客表示，她想看一看玻璃柜里某段丝绸，那些小店里的店员会做出一番虚弱无力的样子，试图打开柜子，尝试未果，便将其修长的指甲向外一撇，冷淡地说一句，“这个打不开”，然后就让顾客走人，但老介福的店员不会这样。靠丝绸店墙壁摆放的架子上，自上至下全都堆满了一匹匹的丝绸，这些丝绸用浅棕色纸张包裹着，成对角横放在架子上。每一匹丝绸上都悬挂着一张记有汉字的白纸标签，这些标签在每一面都看得见，有种奇特的效果，但是外行看不出它们代表的价格。有些上等的丝绸，撕掉了外封纸，放在玻璃柜里，以骗过那些不懂行的人。

所有迹象表明，这些店铺的店员——实际上，大部分商店都一样——远远超过了实际所需要的人数。尽管有些店铺确实业务繁忙，但有许多店员好像就是雇来闲逛、互踩脚趾的。他们对自己从事的这份崇高职业有着极其敏感的优越感，受不得任何怠慢，无论是有意的还是无意的。有一天，有位从美国来的女士——刚来中国——由一位非常年轻的店员接待，谈话过程中，她并无冒犯之意，叫了他一声“伙计”——这是对仆人阶层常用的称呼方式——这个年轻人立即傲慢地挺直腰板，神情严肃，面露不满，纠正了她：“我不是‘伙计’，可以叫我‘史密斯先生’。”上乘的上海丝绸店有两大特点是外国女性特别欣赏的。其一，明码标价，统一价位，无需浪费时间讨价还价。其二，当有货样需要匹配时，配不上的可能性很小。丝绸一匹匹全放到柜台上，然后将货样放每匹上面比对，如果没找到合适的，店员肯定会礼貌地说道：“我们可以为你染一匹。”“需要多久？”“晴天的话，只需三天。您需要几码？”“四码。”“一般少于十码，我们是不染的，但是如果您想要的话，我们可以为您染四码。”大多时候，染出来的丝绸都令人十分满意，而且染色也

没有额外收费。

整座城市都在不断变化。日复一日，那些腐朽破败、卫生条件不好的老建筑，渐渐地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现代化的建筑。令人担忧的是，许多为古文物研究者所珍视的有历史意义的建筑物很快就将消失。去年，有位英国人对朋友说："上海有条街道，我觉得看起来和一千年前一模一样，我可以带你去看看。"但过了几周，他写信给他的朋友说道："那条街道已经不在了。每一栋老建筑都拆掉了，垃圾都清理掉了。"在南京路上一个显眼的位置，中国人刚刚建造了一栋美观的大楼，上面写着抱负十足的"新世界"——这三个汉字镀着金，写在大楼正面。很快，一家财力雄厚的广东公司将在南京路上建一家大型百货商店，其规模和雅致的风格有望超越其他所有的商店。这家百货商店将配有剧院、餐厅、茶室、电梯和屋顶花园，这些配置甚至连最顶级的外国百货商店都不敢企及。

但是，有意思的商店并不止南京路才有。许多吸引人的都在小路上——店铺非常小，很朴素——因为那里或许是可以将中国人的生活习俗研究得最为详尽的地方。老百姓对满怀好奇的陌生人甚是和善宽容，很少会反对他们进一步探究。无需多说，当铺几乎到处都是。当铺前墙的白色水泥或是入口内木制屏风上漆了一个特定的黑色汉字，很容易认出来。



上海如果没有钱庄，就不是上海了。这些钱庄虽然十分体面，但主要都在不时兴的小路上做生意，主干道如南京路对它们不屑一顾。它们不愁没生意，因为"小钱"是每个节俭的人都必需的。黄金和纸币可以去钱庄兑换成白银，拿一块流通的墨西哥银圆，[3]客户大概可以兑换138

个铜板，或者可以兑换11个一角的银币加上几个铜板，这要取决于交易当天的兑换价。不到1美元的购物账单可以用“小钱”支付，至于电车票价，1美元的铜币甚至比一张面值上百的“大美钞”更好。钱庄从外汇银行提取钱款，汇率比后者给顾客的要高一点，以此来获利。必须承认，中国货币的奥秘可谓是超出了普通人的理解能力。

棺材铺必不可少，而且正门直接朝着街开。店主无需承担殡葬承办人的任何工作。他唯一的职责就是制作和售卖棺材。中国的棺材体积庞大而且巨沉，在外国人眼中，甚至是难看到令人毛骨悚然的程度。贵重的棺材是用黑檀木和香樟木做的，棺材顶和底都富有光泽，并饰有色漆和镀金的图案。店主的家通常就在店铺后面，不过家人都觉得一天中大部分时间在店里度过也还不错，未完工的棺材刚好就在店里放着，于很多事情都很便利。老板娘吃饭的时候可以坐在棺材上，老板自己也可以倒在棺材上午睡一会儿，孩子们像松鼠一样，围着棺材打打闹闹。对中国人而言，棺材完全不会让人反感。正如那个上海老母亲一样——她儿子从外面回来，送了她一口棺材，这是他能送的最大方最受欢迎的礼物了——人们普遍认为，买一口棺材摆在家里备用，是在为将来做准备，非常可取。同时，有这件家具在手边，也非常实用，等待百年之日的过程中，如果将这口棺材用作衣橱或者是食品储藏柜，也不会造成什么损害。

走在街上，除了那些最常听到的声音以外，还有廉价留声机发出的刺耳声音。播放的唱片通常都是街上的人群喜欢的中国歌曲。任何店铺想要吸引人眼球的话，都只需摆上一台留声机播放音乐。更高档的理发店通常都有留声机，音乐声夹杂着理发店剃须刀的声音。自1911年革命[4]爆发以来，中国理发店的特色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革命前，顾客坐在凳子上，理发师的主要工作是把顾客前额的头发剃掉，替顾客梳头发、编辫子。现在，传统凳子换成了外国理发师惯用的椅子，理发师小心翼翼地按照已被批准的时兴发型修剪头发。最近，有家理发店门外张贴了如下一则独特的通知：“本店可剪外国、中国以及文明的发型。”只不过和其他发型截然不同的“文明”发型究竟是什么样式，饶有兴趣的大众还不了解。但是，那些渴望在门上面张贴英文标志的店主，学习一门陌生的语言很是费力，经常会遇到严峻的困难。结果往往都是一些醒目的原创——例如，"Horeshueing Manufactured Any Kinds of Foreign and China Horeshueing. Price $2 each hoersh",[5] "The towels are weaving up to the different colors to sell."[6] "House panier and decorator for European and

China", [(7)] "Mating shop and House Furnishing", [(8)] "Gentleman and Ladys snots and bots"。

南京路上美丽的古玩店让人目不转睛、心旷神怡，然而谁会将它们的魅力和猪作弄（Pig Alley）[(9)] 上古色古香的老店铺相提并论呢？猪作弄以前位于这座城市的护城河边上，实际上就是一条小巷。现在，护城河已经被填平，变成了一条用碎石铺筑的大路，但是让这条小巷闻名在外的那些店铺依然保留着它们的特色。经年累月的尘埃依然附着在店铺上面，布满皱纹的老太婆们依然在角落里抿着茶，肤色犹如黄铜的老头子们在外面晒着太阳，心满意足地抽着烟。快与天花板齐平的货架上堆放着大量的青铜、黄铜和瓷器物件，有的如废铁一文不值，但是收藏品之中，有些珍稀古老的上乘物件贵重程度几乎不亚于黄金。在猪作弄买东西需要花时间和耐心，因为必须得讨价还价，可能要去上好几次，才能将令人觊觎的珍品收入囊中。

外国租界内的商店里，估计有两万多名男孩子被雇为学徒。只要店铺是开着的，他们就得工作，很多时候，一天24小时之中有16至19个小时在工作。他们拿的薪水很少，或者压根就没有，但是这些男孩子可以在打工的地方吃住。他们绝大多数没有机会玩耍和学习。他们受父母或监护人约束，这与英格兰以前盛行的体制大体相同。如果有虐待的情况，毫无反抗力的小家伙通常是被打得最惨的，学徒是不会获得赔偿的，只能忍着、逃跑或是了结自己的生命，虽然有时候他们会这样做，但是通常都还会坚持下来，因为中国人的精神就是要坚毅地忍受苦难。不久前，当地的基督教青年会经由男童会（Boys’ Department），针对租界内中国男童的境况开展了一项颇具价值的调查。更令人感兴趣的是，这项调查是由男童们开展的，据我们所知，这在任何一个国家都是首例。他们呼吁基督教青年会的中学生——当然都是中国人——报名做志愿者，有12名学生立马响应了，答应假期去做这份工作。其他人是慢慢列入名单的，直至最后，在一位中国老师和几位中外秘书的协助下，六十多名学生参加了。他们没有奖励，而且他们的任务并不轻松。他们受人嘲笑，被人推来搡去，但是勇敢地坚持了下去，每天5点开会，报告进展情况，繁忙当中喝上一杯茶，再重新鼓足勇气。耗费如此之多的劳力才整理出来的事实和数据不会白费。他们已经制定了明确的计划以改善男童群体的福祉，自基督教青年会为这些男童建造了壮观的新大楼以后，这些计划就已经开始落实。

---

(1) 吉百利创立于1824年，是英国历史最悠久的巧克力品牌之一。

(2) 老介福呢绒绸缎商店位于南京路河南路口，创设于1860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主要经营丝绸织物，并收集国内外优美花形图案，自行设计新品种，以品种多、花色新颖著名，有“丝绸总汇”之称。

(3) 墨西哥银圆又叫作“墨银”或“鹰洋”，后讹为“英洋”。曾在上海流通。

(4) 此处指辛亥革命。

(5) 此处应是将“Horseshoeing”写成“Horeshueing”，“Horse”写成“Hoersh”，意思是“定制各种中国和外国的马蹄铁。每匹马2美元”。

(6) 应指“售卖不同颜色的毛巾”。

(7) 应指“提供欧式和中式房屋装饰”。

(8) 应指“定制商铺和家居用具”。

(9) 猪作弄，位于上海小南门外，旧街巷名称，因此地原有杀猪作坊而得名。——编者注

第五章　持家之难题

“啊，亲爱的，”某个明媚的春天早晨，邓拉普先生（Mr. Dunlap [(1)](#)）将他刚才在专心细读的《字林西报》[(2)](#)放到早餐桌上，轻快地说道，“这里有一栏待租房屋的广告。要不我们去看看吧。”“正合我意呢，”邓拉普夫人迫不及待地同意了，“你去叫黄包车吧，我马上就好。”“不，我们坐马车去。这样更快些，而且我们人不在马车上的时候，也不另外收费。你想一想，”他补充道，“一辆由小马拉着的漂亮的双人四轮折篷马车，我们雇上一整天，加上车夫和男仆，还不到1.5美元！上海生活当然也是有好处的。”“让司机记得带上他的法国执照，”邓拉普夫人对着她丈夫喊道，因为他急着去安排马车，匆匆忙忙地走开了，“对。我们有可能会去法租界。”“是啊，我们可不想像布兰克两口子那样被拦下来。”然后夫妻俩想起他们朋友的经历，都开心地笑了起来。他们朋友为了庆祝结婚纪念日，便乘马车出去兜风，但是他们还没出公共租界，就被警察拦住了，因为车夫没有法国执照，于是车夫就驾着马车，带着这两口子去警局办了一张，付了1美元的罚款，这个插曲并不光彩。邓拉普夫妇俩累了一整天，晚上回到马车停歇的地方，已然筋疲力尽了。但是第二天早上他们又很早就出门了，这次是去找一家房地产公司的办公场所，告知中介他们已经定好要其中一栋房子。“好的，我会把你们的名字加在申请人名单上。你们前面只排了11个人。”“我们前面有11个！”邓拉普夫人大声喊道，有些惊讶和讶异。“为什么？我们猜想在报上登广告的房子都是还没租出去的。”“是还没，”中介兴致勃勃地回答道，“这些只是潜在的租户。你租到这个地方的机会很大。上周有栋房子我租给了申请名单上的第15个人。其他人出于种种原因放弃了。”

这对夫妇终于寻到了一栋他们喜欢的房子，房子相当新，离市中心稍微有点距离。商定好租金后，中介加了一句：“你们得付6个点的税。”“这是怎么回事？”邓拉普先生询问道。“我又不是要买那栋房子。”“是没错，但是在上海，租户付房子的税，房东付土地税。你这已经是便宜了。如果你租的房子在租界境内，那你得付12个点的税。”“哦，那我们不是在租界里吗？有人告诉我这栋房子前面的那条路是工部局的。”“你说得对。确实是的。大约一年前，工部局费了一番周折之后，获准在华界铺设这条路。这路也很好，不是吗？一流的碎石大

道。”“很有趣，”邓拉普夫妇表示赞成，“但是你说房子本身所占的土地是属于中国人的？”“是的，他们不肯卖，所以我们公司只能将这房子永久出租。”邓拉普先生微笑着转向他的妻子：“好吧，如果我们遇到麻烦，可以出去坐在路上。”“哈哈，这主意不错，”中介轻声笑道，“但是你们会受到很好的保护。租界警力会巡查这条路，中国巡警会巡视周围的地区。中国人不想看到外国人的房子被人抢劫，因为这会让他们惹上麻烦。”

邓拉普夫妇一住进他们的新住所，就发现衣柜、架子、挂钩和抽屉不够用，给他们造成了诸多不便。事实上，这栋房子只有一个外壳，就屋顶和墙壁，别的就没什么了。但是有自来水，热水冷水都有，这在上海以外的地方是很罕见的奢侈品。实际上在租界内比较老旧的地区，洗浴用的热水还得在附近的店铺购买，用大木桶装着，然后由苦力用扁担挑着带回家。尽管为电灯铺了线路，但是并没有安装灯具。这是承包商的疏忽，必须立即纠正，于是邓拉普先生又去找中介面谈了。“我们希望能尽快安装这些灯具，”他催促道，“因为我们现在是靠着两三盏煤油灯在照明的。”

“但我们不提供这些东西。”“你说什么？”“我的意思是说这些东西不属于房子的基本配置。”“所以我得去买？”“当然。”“好吧，好吧，闻所未闻！但是卫生间的固定式洗手盆、厨房的排水板还有……这些又怎么说？”“如果你需要，得自己买，情况是这样的，”中介好声好气地继续说着，“上海是非常国际化的，在这里居住的人各种各样的都有。据我们了解，有些租户在搬离房屋的时候，偷走了门上的锁、天花板上的枝形吊灯，有时连固定式浴缸都被人撬松，趁夜深人静的时候顺走了。哦，不，你不会做这种事的。”当看到邓拉普先生露出了难以置信的目光，中介朝他笑了笑：“这种事情比你想象的要多。”此刻，邓拉普夫妇很清楚，他们必须得从最基本的着手，重新装修自己的房子，或者更确切地说，是自上向下重装。因此，他们首先要做的就是买木材、找木匠，请他们制作食品储藏柜，再置办一些其他的迫切需要的必需品。没多久，这个小后院就响起了锤子和锯子的声音。

早上9点左右，工人才懒散地溜进来，或者可能根本就不来。他们下午5点钟就立马走人，中间还要找个地方惬意地午睡一两个小时以上，这对于那些想要加速完工的屋主来说，蛮令人恼怒的。但责骂也无济于事。上海的工人，特别是自1911年革命以来，就是一副轻松、独立的神态，对他们必须要忍耐。

接下来这家人所关心的就是买家具。朋友建议他们去拍卖会买。因为上海的人口流动性很大，所以拍卖会在这座城市里很常见。每天都有家庭解散，都有人搬走，可能就居住了几个月。处理那些家具——通常都还是新的，最简单、确实也最划算的方法就是拍卖。拍卖在社会各阶层中都非常受欢迎，受吸引的人群一般都是急不可耐的，但是邓拉普夫妇通过这种途径只挑选到了几件东西，因为他们觉得拍卖过程耗费了太多时间。后来有人让他们去北京路。如今，最东端的那一段北京路——靠近外滩——是一条极其高雅的街道，但是往西侧走，这条街呈现的特色有所不同，道路两侧不再是大量的红砖写字楼和公寓大楼，而尽是中国的废品旧货铺子（junk shops）。不过，按照字典中对“废弃品”的定义，这个词（junk）用得也并不贴切，因为在敞开的店铺正门、店铺后面黑漆漆的地方，以及楼上布满灰尘、一股霉味、屋顶很低的房间里——有一段像梯子一样的楼梯通向上面——满腹好奇的路人所看到的远不止废弃品。在每家店上写“古玩店”（Old Curiosity Shop）这几个字可能更适合。大部分商品都是在拍卖会上买的，虽然有些是新的，但都或多或少地有些岁月的痕迹。吸引外国人的一般并不是那些常见的新物件，他们乍一看，很容易惊叹一声：“好多古玩啊！”他们在堆积如山的东西中小心翼翼地左拐右绕，若是发现了一件罕见的旧桃花心木或柚木的物件，或是一小块古色古香的瓷器或玻璃制品，有可能用低得离谱的价钱买到，便觉得惊喜不断。当然，如果“找中的”是一件家具，带回家中会冒些风险，有洁癖的人可能会完全避开家具，但是只要通风良好，用消毒剂、肥皂和热水反复清洁，如有必要，再刮擦抛光，这样通常就会非常安全了。

然而，外国人家中需要的家具，只靠北京路上的那些店铺是不行的，所以邓拉普夫妇在花钱买了一些诸如煤斗、铲子和钳子之类的小物件之后，最终毅然决然地决定，不再浪费时间去淘那些便宜货，所有的家具都去订做。这听起来非常奢侈，还有点儿铺张浪费。实际上相反，这是他们能做的最省钱的事情了，因为他们并不是在南京路上的高价英国百货商店订购的，而是在一条小路上的一家中国店铺，他们可能经过了这家店铺的入口和橱窗许多次，都压根没注意到。不过，这个地方之前是有人极力推荐的，事实证明最终的产品也是令人相当满意的。注意“最终”这个词，这个词表示经过深思熟虑，因为距第一个订单下达一年多后，才能完成这一大杰作。走进去，会发现店铺里面要比在街上看起来更像是一家企业。店内有大量库存的现成家具，但是邓拉普夫妇是根据这家商行进口图书上提供的照片来选择设计图的，然后他们选定了

他们需要的木材，最后，费了好一番口舌，才协商好价格。随后，邓拉普夫妇曾无数次去到店里，催促他们早点交货，但都枉然。有时候，他们俩会撞上商行上了年纪的老板和店员正在展销厅正中间旁边的桌上吃午饭——按照惯例，商店是为店员提供膳宿的。但是，顾客进来并不会让他们感到一丝半点的尴尬，他们总是会招待顾客，应酬周全。订购的家具一件接一件地用手推车或是独轮手推车运到了他家里，有些较轻的物品是苦力用扁担挑的。这些家具搁置了一两天，又退回去了，极少数例外！要么是帽架太短了，要么是衣橱的隔板太长了，要么是书桌的抽屉打不开，要么就是锁不合适。总是有东西“差不多”——只是有一点不妥，这是中国人为存在许多故障辩解的时候最喜欢用的一种说法。有一张已经修理多次的软垫座椅，来来回回地搬了许多次，最后终于修好了一部分。但是餐桌的情况是最糟的，有次在运输途中从推车上掉下来，摔坏了。因为木料并没有晾干，桌面不断地裂开，桌腿凹凸不平，摇摇晃晃的，看得人心慌。后来连续打造了四张桌子，才有了一张令人满意的。

虽然漫长的等待让邓拉普夫妇的耐心受到了严重的考验，但他们不由自主地对这家商行一贯和善礼貌的表现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家店总是深表遗憾，无论何时都愿意再试一次，就算损失的钱是算在他们自己头上的。

他们有些产品也确实取得了显著的成功，正如他们按照邓拉普先生借给他们的组合式书橱的样子仿造了一组。这两组书橱并排放在图书馆的时候，几乎很难区分。

这家店经常说，中国人完全相信外国人的道德品行。整整五个月，从开工到交付价值几百美元的货物，他们没有要过一分钱。要知道不诚实的顾客可能会留下家具和债务，不费力气地就溜出了城。

安家那段时间，有天中午，邓拉普先生从办公室回来，惊讶地发现有群男人正在用草皮铺草坪，铺草坪这件事他还没时间考虑。当他得知这是他租房子的那家公司为他做的，他甚至更吃惊了。不是他一个人有这待遇。这家公司所有的房屋都是这样做的。看来，草皮不太容易被人偷走，而照明设备却有可能！

邓拉普夫妇觉得，没有必要去花店物色绿植来装点家里的花园，因为街头小贩会带到门口来。从他们搬进去的第一天早上开始，这些人就经常在这地儿出没。他们把绿植放在微微凸起的圆形篮子里，用绳子将

篮子拴在一根竹竿上，然后单肩挑着竹竿。每次邓拉普太太一出现，他们就涌上来了，一群急不可耐、面带微笑的人，伸出鲜花，用他们那种洋泾浜英语，[(3)]恳求她买一些。邓拉普太太总是摇摇头说："以后买。现在不买。我现在太忙了。"但是在一个阳光明媚的日子里，这个家庭主妇在室内忙得不可开交，有个很有事业心的家伙，竟然擅作主张，沿整个花园一圈——这花园很大——摆放了许多品种的绿植，甚是好看，最后在走廊上摆放了四盆巨大的盆栽棕榈树。效果很迷人。当然邓拉普太太有可能会要求他将绿植从院子里搬出去，但是哪个女人会这样做呢？相反，她很高兴地还了点价——6美元左右。后来有位邻居告诉她，如果她碰巧有二手衣服可以给那个男人，那么他很乐意用衣服抵钱。这位朋友最后说道："每年我都会以这种方式给花园添置些花草。"

邓拉普夫妇在新家吃上第一餐的那一天非常幸福，但在此之前，邓拉普先生已经处理了两件重要的事情。这两件事就是安装一流的过滤器，以及在储存室和食品储藏室的地板上镶钉锌铁皮——老鼠无处不在，为了防止老鼠入侵，沿着墙壁钉1.5英尺的锌铁皮是准许的。上海一般都使用伯克菲尔德滤筒（Berkefeld filter），有了这个滤筒，饮用水就不必烧开了。但是众所周知，这个"滤烛"每周必须用沸水仔细清洗一次，而邓拉普太太很快就发现这事她不能指望仆人——不确定仆人会不会真的把水煮开，或者清洗滤烛的时候会不会弄坏——她得自己处理。

最先登门拜访的人中有几家中国杂货店的"跑腿"。最近的一家得到了她的光顾。每天早上，这家店的伙计都会过来取当天的订单，中午之前，就会用整洁的三轮车将食品杂货送过来。此外，厨师每天都会去集市，因为上海的杂货店既不卖肉也不卖新鲜蔬菜。"试想一下，我们可以告别罐装黄油和罐装牛奶了！"邓拉普太太在搬到这座沿海城市后不久，就对着她丈夫兴奋得欢呼了起来，此刻她的目光转向了她那精致的威尔士黄油碟中的一小块新鲜的澳大利亚纯黄油，十分满足。乳品店——最好的是欧洲的——由工部局卫生部仔细检查，用密封瓶送牛奶，以确保从乳品店到目的地的途中牛奶完好无损。尽管如此，邓拉普一家在餐桌上饮用的每一滴牛奶或奶油都是加热到滚烫的。他们也从未大肆食用过生菜，即使是私人菜园里种植的也未吃过，其他所有未经烹煮的蔬菜都没有吃过。鉴于痢疾和类似的疾病肆虐，这家人一致认为遵守外国医生的指令、不去冒险是明智之举。可以去皮的新鲜水果在当季可以尽情食用，但是要在开水中浸泡，或者要在过滤后的净水中彻底清洗，才能放上桌子。草莓要在邓拉普太太的亲自监督下经过特殊的清洗处理，将草莓放入漏勺中，用开水浇三次，最后再使用高锰酸盐溶液。后

来，邓拉普太太在实践中了解到了一种更好更简单的给水果消毒的方法，那就是把水果放在煮沸的糖浆中浸一小会儿，这样既保留了浆果的味道，也没怎么改变水果的外观。在食物这个问题上，即便所有合理的预防措施都采取了，邓拉普夫妇知道，佣人的疏忽——或者是其他原因——还是会让他们时常面临很大的风险。然而，他们决定尽人事，听天命。

还有一个很早就登门拜访的是公共洗衣工。上海的家庭就没有在家洗衣服的想法，可能有些小件的衣物除外。所以都是送出去洗的，至于究竟是送去了什么样的地方，不必太过费心地深究，这样可能会更舒心一点。公共租界内的公共洗衣房固然需要接受卫生部门的检查，但尽管如此，可能还是会存在一些有失妥当的行为习惯。举个中国洗衣工给衣服洒水的例子，他的方式是先含一嘴巴水，然后闭紧牙齿，把水喷射出来。如果喷到袜子和内裤上，就已经够糟的了，还有手帕和纸巾——好吧，邓拉普夫人很快就觉得在这种情况下，任凭自己瞎想没有好处。小到面巾，大到最精致的白色连衣裙，所有东西每件都只收一分半，这样的价目表她当然挑不出毛病。一般来讲，衣物都洗得很细致，尽管采用的方法确实会瞬间让效果大打折扣。

虽然收拾房子的过程非常单调乏味，但是邓拉普先生和太太最后已经能够应付自如，他们觉得可以转而关注其他更重要的事情。起初，他们有一点烦恼，因为正对他们的并不是路对面邻居家修剪整齐的草坪，而是邻居家的后院，在上海通常都是这样的，所有的房屋都朝南——微风是从南面吹过来的。一排排的衣物——多得就像海岸上的沙子一样数不清——就挂在南面空地上晾干，这事又让邓拉普太太的内心受到了一点考验。但这幅景象，至少要比就在她家东面窗户外面、零星散落在地面上的棺材让人容易接受一些，这些棺材可能是和这家中国房东完全不认识的人放在那的，等方便的时候下葬使用。再稍微远一点儿，有一块地——邓拉普先生每天上班都会经过——显然是个最受欢迎的存放死者的地方。每天早上都有新棺材，大部分都是很小的棺材。婴儿通常压根就没有棺材，而是用草席捆起来，胡乱地扔在地上。每天应该都会有人将这些尸体装起来运走。在中国，对于那些太司空见惯的事情，人们的心肠好像慢慢硬起来。邓拉普夫妇常常会赞叹，尽管他们周围的环境令人沮丧，但并没有对他们产生更深的影响。

邓拉普太太每天早上吃完早餐，都要与厨师“算账”，她的日常生活就是这样开始的。中国的厨师采购也是拿佣金的，或用通俗的说法

叫“挤油水”。意思是说，他买了一磅半的肉，带回来的账单是两磅，或者每磅肉他向女主人收的钱比他实付的要贵几个铜钱。这种挤油水拿回扣的事情双方都心知肚明，只要不超过一定的界限，没人会说什么。上海有份日报，每天早上会报道市场参考价，邓拉普太太会去查阅，偶尔她会亲自去市场，所以应该需要多少费用她是了解的。每当厨师占便宜占得太过分了，她不会直接指责他，但是以下的谈话会发生：“大师傅（大助理），你肉买得太贵了。”“是的，我也是这样跟屠夫说的，但他不肯便宜。”“那就去别家。”或者：“对我们这个小家庭来说，两天用掉104个鸡蛋太多了。”“确实是很多，但我一块蛋糕就得用18个。”“你必须得少用些。”“我会试试。”现在，邓拉普太太知道了——而且厨师清楚她知道了——他买肉的价格没那么贵，他在为那些他从未买过或他自己处理掉的鸡蛋跟她要钱。但是用这种间接的方法对付他——这方法绝不是她原创的——她达到了自己的目的，而且也保全了大师傅的面子。如果他“丢了面子”，他当下可能不会说什么，但后来可能会出现在女主人面前，用悲伤的口吻说他的叔叔或是叔祖母去世了，他必须得马上走。然后可能第二天就会发现他悠哉悠哉地在邻居家的厨房里开工了。偶尔，有年轻的家庭主妇——刚来中国——放话要自己去集市买东西，甚至说完全不需要厨师。但是，过几天——或者最多过几周——她一般就会放弃她之前满怀希望所作出的一番努力，并意识到，鉴于中国的情况，外国女人自己做家务几乎是不可能的。

算完账以后，接下来就是发放当天的“物资”。不同的主妇做法不同。有人什么东西都没锁着藏着，有人用最精密的度量单位发放：一杯米，半杯糖。邓拉普太太觉得，采用折中的方法比较适宜：不要让厨师自由出入储藏室，但他每次用量多少是相当自由的，表明他是受到信任的。如果补给品用得太快，她会用往常那种间接的方式对付他。她和她的邻居经常通过“比对笔记”来交换意见、互相帮助。“一袋50磅的面粉你用多久？”“糖你每周平均用多少磅？”

邓拉普太太的厨子是个艺术家，有他特有的行事方式。他有兴致的时候，会费心地将他做的蛋糕、馅饼和布丁点缀一番——风格可以媲美第五大道（Fifth Avenue）[(4)]的餐饮服务商——然后再送到餐桌上。然而，有一天，他做了一件让这家人万万没想到的事。晚餐上了一个味道极为特别的蛋糕。“我让厨子做柠檬馅，但是这个没有柠檬的味道。”邓拉普太太慎重地品尝了一点儿后说道。“没，有股浓郁的洋葱味。”她的丈夫说。“嗯，不可能！但是，确实有！”厨子被叫了进来。“你做的什么馅？”“洋葱。”答得很快。“洋葱！为什么，我跟你说了用柠

檬。”“不，夫人说的是洋葱，我是个听吩咐的厨师。我一直都是按夫人吩咐的做。”然后垂头丧气的夫人突然想明白了，她之前点了洋葱，这种味道强烈的蔬菜和柠檬在中文中有点儿相似。但这比她朋友家厨子的试验要好多了，朋友家的厨子——没有任何恶意，完全出于一片好心——用煤油给汤调味，还有一次，往布丁里倒入了大量的发油。至于爱干净这个习惯，或者更确切地说，许多厨师的道德因素中缺乏这一值得赞赏的美德——要不然就十分合人心意了——毫无疑问，说得越少越好。但是如果主妇发现厨师在洗碗盆中洗他的背心，或者用（擦拭已洗餐具的）茶巾擦拭炉子，随即便解雇了他，那么有谁可以责怪这个备受考验与煎熬的主妇呢？附近的太太们经常会愉快地花上半小时，一边喝茶一边分享她们的经历，令人捧腹的、悲惨至极的都有。邓拉普太太在中国生活的时间越久，就愈发意识到，虽然东方的“仆佣问题”还未解决——就像许多西方人看上去所认为的那样——但是中国仆人的优点却有很多，而且很明显。这些优点在近期爆发的革命之前，实际上是在1900年之前，相比现在更为普遍，但是，优秀仆人的优良品质仍然值得最高的赞誉。将来去哪儿可以找到更忠诚更可靠的服务呢？如果孩子们晚上病了，或是邓拉普先生乘午夜船或早班火车离开这座城市的时候，仆人们会自愿值班，毫无怨言。

有一次，邓拉普夫妇从外面旅行回来，到家已经是半夜了，结果发现热腾腾的晚餐在等着他们。晚餐7点就备好了，采用某种只有厨师才知道的神秘工序保持食物热度，中间这几个小时，食物没有烧焦，也没有烧干。仆人们都在眨着眼睛，昏昏欲睡，但是态度极为友好。

邓拉普太太可以突然告知仆人有客人造访，不用担心仆人会有任何不愉快，这总是让她感到十分慰藉。实际上，人越多，厨师越开心，因为他需要买的东西越多，他的“油水”就越多。通常还会涉及许多额外的工作，但仆人一直都觉得这是理所当然的。“伙计”很乐意装饰餐桌，如果由他自己做主的话，最钟爱的一个消遣就是用有色米和花瓣，在桌布上摆出几个意为爱、幸福、长寿以及和平的汉字。

这些仆人身上的闪光点，在邓拉普一家办乔迁聚会的时候最显眼。为了省时间，美味可口的小蛋糕是在外国面包店买的。为了省钱，尽管上海有包办宴席，但冰淇淋还是在家做的。冰柜是从邻居家借的，傍晚时分，小院子里已经一幅繁忙的景象。厨师把街上的苦力和周围人家的“伙计”们都叫了进来，很快所有人都埋头苦干了起来，仿佛拼了命一样。冰在上海是一直都有的。邓拉普一家经常饶有兴趣地说起，每当邻

近的池塘结了冰，即使只有半英寸厚，中国人都会小心翼翼地把它凿开，然后放附近的棚里储藏起来。这种碎冰卖得比外国的人造冰便宜得多，不过外国的人造冰用来做蛋糕效果要好得多。邓拉普太太试探地问厨师，奶油能不能搁到半夜，会不会坏掉。这个大师傅高傲地挥了挥手，回答道："交给我吧，夫人。交给我。"她知道他可以。

与此同时，伙计在餐厅里也要履行一定的职责。邓拉普太太将其他的银器放在餐桌上。"有这么多叉子，这么多汤匙，"她解释道，"今晚厨房里有陌生人。银器你负责照看。"就这样，她就再没想过这事。如果丢失了一件，很快就会被还回来。怎么还回来的，从哪儿还回来的，谁知道呢？中国仆人神秘的服务体系对外国人来说就是个谜。

那天晚上，在邓拉普太太上楼之前，她被毕恭毕敬地请去查看银器——洗得干干净净的、整整齐齐地堆放在餐具柜上。这个累了一天的伙计直到她检查完宣布没问题了，才肯去睡觉。

---

(1) 作者玛丽·宁德·盖姆韦尔的丈夫贾腓力英文名为Francis Dunlap Gamewell，本章邓拉普夫妇的经历很可能就是作者夫妇的亲身经历。——编者注

(2) 近代上海著名英文报纸，前身是《北华捷报》，1864年在《北华捷报》副刊《船务商业日报》基础上改名而来，1951年停刊。

(3) "洋泾浜"在上海话里有不伦不类之意。上海人以前把中国化的英语称为"洋泾浜"英语（pidgin English）。

(4) 美国纽约市曼哈顿一条重要的南北向干道，零售业发达。

第六章　交通之点滴

上海的交通工具按规矩和顺序一一列举，排第一位的要数独轮车。独轮车地位如此，并不是因为它比其他的交通工具更大、更优雅，甚至也不是因为它更实用，而是由于它很古老。当然，不能说独轮车早于轿子，但是尊贵高档的轿子已经几乎从上海的街头生活中退场了，所以不予考虑。相反，独轮车并没有降级到内陆或是没那么现代化的城镇上，而是在嘎吱嘎吱的声响中撑了下去，而且不会倒下。独轮车是很实用的交通工具，任何人都不想它倒下，可能有些容易紧张的残疾人，或很疲劳想睡觉的人除外——这个讨人嫌的东西发出的嘎嘎响的、折磨人的、无法克服的噪声愈来愈强，打扰到他们早晨的休息。滴上几滴油，就不会发出嘎吱嘎吱的声音了——这是世上再简单不过的事了，但是那些苦力喜欢那种嘎吱声——他们不会因为任何东西放弃这种声音。有这声音就意味着有生意。这证明了他们正在完成一单生意。中国人说，每一辆独轮车都有自己独特的嘎吱声，用这种方法能够识别那些因距离相隔太远而无法认出来的人。“姓王的朋友来啦，”一名男子对他的邻居说，“我听到他车的嘎吱声了。”与外国独轮车比起来，中国的要有优势，中国的独轮车并不是在车尾有个小轮子，而是在车中间有个大轮子。的确，升高的车轮将独轮车分为左右两半，这样携带重物也就容易多了。车把手上系一根编织的粗绳，从苦力的肩膀上套过去，对稳定负载很有帮助。

上海的独轮车主要用于运输货物，但由于价格便宜，对某一些中国人而言——特别是往返于工厂的妇女和儿童——是很受欢迎的客运交通工具。通常有8个到10个人挤在上面，双脚垂下来，坐在两侧。有一次，人们看到一辆独轮车上坐着11个妇女和女孩子，就一个苦力推着走。通常，一个苦力能够应付的重量从600磅到1000磅不等。他什么东西都运，重到建筑石料，轻到鹅毛。货物很重的时候，这个可怜的家伙就像喝醉酒的男人一样步履蹒跚，左右移动，以使负载的重物保持平衡。他身上的血管像鞭绳一般突出，汗水如注。夏天为了防止汗水蒙了眼睛，他通常都得在前额上绑一条带子——就像假眉毛一样——用来吸走汗水。尽管他一直都是气喘吁吁的，但通常都会继续吆喝，一部分是出于习惯，还有一部分是为了提醒人们注意，他要过来了，让人们让路。但是，电车没法避开，而且有些其他的车辆不愿意避让，所以有时

苦力会陷入困境，独轮车失去平衡，翻了过去。有些类型的货物不会造成损坏，唯一的不便就是耽误了时间，需要重新搬货，但如果车上装的是会裂开的米袋或是易碎品，苦力面临的处境就不妙了。虽然对于穷人而言，他挣的薪水通常能够保障生活，但并没盈余可以支付事故产生的费用。

据说，拉独轮车的苦力比大部分拉黄包车的苦力干得要更久，处境要更好。后者通常都干不长久，他们的从业年限通常不会超过三五年，最多十年。有位在上海拉黄包车的苦力宣称，他已经拉了二十年的黄包车，如果是真的，这是非常罕见的。目前，上海有9 000辆到10000辆公共黄包车，但是一年之中，苦力人数可能是变动的，而且是黄包车数量的很多倍。某个对这一问题有过研究的人估计，上海的苦力总人数——所有类型包括在内——已经高达40万。拉黄包车的苦力平均每天挣七个铜板，大约相当于三四美分，他必须依靠这份微薄的收入养活一家人，而且是在中国这个以生活成本很高而著称的城市里。难怪一位主管教会医院——许多生病的苦力都送去了那里——的医生近期报告道："送进来的许多病人之所以病倒，是由于营养不良、生活卫生条件恶劣，外加他们经受了剧烈的痉挛劳损。"心脏病，还有中国的顽敌——结核病——夺走了大多数人的生命。

即使是在冬天，这些苦力拉完一单客人，也会累得大汗淋漓，然后还得在寒风冷雨中等上一个小时，才能接到下一单乘客，而衣衫单薄的他们又没有其他东西可以御寒，因而他们很容易得病。已婚男子住在郊区的苦力聚居地，住在用稻草或竹子搭的小屋里，每月付15美分到20美分的租金。天冷的时候，全家人都蜷缩在里面保暖，屋内烟雾缭绕——有烟草还有煮饭用的小炭火。许多婴儿染上了眼疾，导致失明。未婚的黄包车苦力，哪儿有容身之所，就在哪儿睡，通常是在廉价的茶馆里，一个小房间里一般挤着五十来人。这些场所的条件无法形容。

苦力拉的黄包车不是他们自己的。黄包车是公司的财产——有些是外国的，有些是中国的，每家公司拥有的车辆在五十辆到七八百辆之间，不过有两家大公司各自拥有1200辆。其中，有家公司自己生产黄包车，每月生产100辆，雇了妇女制作靠垫和坐垫。有几家公司为这些男人提供制服。通常就只有一件外套，如此一来，他们穿的破烂裤子就显得更加破烂不堪。衣服每24小时就送去公司的洗衣店洗涤一次，然后再干干净净还给苦力的，就只有一例。工部局已经下令，公共租界内的黄包车苦力必须得穿得体体面面的，但是这项规则并没有被严格地执行。

归中国公司所有的黄包车后面用中文写了公司的名字，即使不是说具有道德色彩，通常也都富有诗意，比如“飞翔公司”“永恒的回忆”“永葆正义”，有家公司的黄包车牌照上方绣了一辆小型的金属机车，明显是在暗示一种与之并不相配的飞快速度。

一辆配有橡胶轮胎的黄包车——如果是新的——要五六十美元，每天的租金在35美分到40美分不等。租车的苦力用了几小时或是半天以后，将车子转租出去，然后那个人再接着租给下一个人，如此一来24小时之中，这辆车子有可能会经两三个甚至四个人的手，所以黄包车苦力的人数自然是远远超过黄包车总数的。乘客要么按用车时长来付费——收费标准通常是每小时20美分（但是这个可怜的苦力要是能收到8美分或是10美分，就很不错了），要么按照路程来算——比如说，每跑1英里或1.5英里收5美分。晚上，苦力要价会贵一点，因为他得花1美分去买蜡烛，点纸灯笼或是小灯用。这是针对外国人的价位。中国人付的费用通常会少些。黄包车有两种：黑色的高车型和棕色的矮车型。后者全都配备了橡胶轮胎。而高车型的以往大多都没有，因此可以租得更便宜，没钱的中国人经常会用，但是近来工部局已经成功地将所有的这类黄包车从租界清除了出去。大多用旧了的黄包车显然被买了去，投放中国管辖的地区使用——因而那里到处都是摇摇晃晃、破烂不堪的交通工具——可能用十分低廉的价格就能买到。大多都是年轻的男性在拉，几乎还都是孩子。

在公共租界跑生意的黄包车苦力必须具有工部局颁发的执照。如果还要在这个租界以外的地界跑生意，他们还需要法国和中国的执照。这个执照——镀锡铁皮做的——放置在黄包车后面的凹槽里。执照由黄包车所属的公司提供，每辆车每个月得由这些公司向市财政部缴纳1美元。苦力若是行为有失，执照便会被没收。通常都是因为一些微不足道的事，比如说挡了路——一般都是因为他急着想拉个客人——他的执照便被锡克教警察收走了。然后这个可怜的家伙便会遇到很多麻烦，因为没有执照，他就跑不了生意，有时候需要等几天或几周，然后缴纳40美分的罚款，执照才会归还他们。租界内的黄包车，每月必须要更新一次执照，正式检查一次。

在虹口菜场对面的检查站，每天都有三四百辆集放在那儿，由一名英国警察负责。这些黄包车一辆接一辆地带到他面前，他和一位中国助手会摇一摇、拉一拉、捶一捶，看看这些车子状况是否良好。如果有任何部件显露出存在漏洞的迹象，就会被扳下来，执照就会被扣留，黄包

车就会被送回所属的公司进行维修。每逢这些场合，中国工头会代表这些公司进行处理。有时候是个女工头。负责这一职位的通常都是些上了年纪、形容枯槁的人，裹着小脚，眼睛已是半瞎，但是正如外国官员恰如其分的描述：“在照看由她看管的五十辆黄包车的时候，她敏锐如剃刀。”在上海拥挤的街头，黄包车发生事故并不罕见。惊奇的是，事故并没有常发生。几乎所有的苦力拉车的时候都低着头，脑子里——好吧，谁又能知道苦力的心思飘到了哪里呢？很多时候大抵都处于休眠状态。几乎所有的苦力都是来自社会的最底层——没有其他东西可以换取面包，或者更确切地说，换大米——只能出卖自己的体力。“苦力”这个词，按字面意思解释就是“出卖体力的人”。

黄包车苦力跑起来是不稳定的，也是很冲动的。他们几乎都不思考。有些外国人不会拿他们的生命冒险而去坐黄包车，死里逃生的故事几乎每天都会发生。有位美国女士，正在一条狭窄拥挤的街道上坐着车，突然载她的苦力企图从两辆迎面驶来的电车中间横穿马路。他自己成功地跃过了轨道，但是电车撞上了黄包车，黄包车被挤压成了碎片。这位女士临危不乱，抓住了其中一辆电车前面的栏杆，一直抓着，直到她被人拉起来，这才救了自己一命。还有一起引人注目的死里逃生的事故，是一位母亲带着她的小宝宝，正在一条安静的街道上坐着车——理应是非常安全的。这个苦力看到有个男人骑着自行车过来了，在他面前骑得弯弯绕绕的，然后他就被吓坏了，失去理智，放开车把跑开了。黄包车突然来了个急刹车，使得那个婴儿从母亲的手臂中甩了出去。这个小不点摔了下去，脸朝下，趴在坚硬的碎石路上，一动不动，母亲担心孩子已经死了，结果孩子只是晕过去了而已，除了有些严重的瘀伤，第二天孩子似乎并无大碍。

黄包车平常的磨损由车主负责修理，由于事故导致的损害通常要记在苦力的账上，至少要记一部分。他需要赔偿多少取决于公司。有家大公司每个轮胎要两三美元。苦力负担不起这些代价，不得已要借钱来付清罚款，而那些放贷人索取的利率高得离谱。无力偿还债务的苦力别无他法，只能跑路、自杀或者被关进债务人监狱。若是后者这种情况，除非是更有福气的朋友或亲戚来救他，否则他可能得一直做个阶下囚。

有趣的是，从西方国家过来不久的人很快就会习惯坐黄包车。起先，他常常会猛烈地抨击黄包车，或者他坐了一辆黄包车，怀着帮助苦力的初衷，会轻轻地坐在座位上，有只脚可能从一边悬出去。但是现在，他乐在其中，享受这个舒适的小车厢——或者正如有个满腔热情的

女人所描述的那样，它是“成年人的婴儿车”——几乎都不再把车夫当作人看。但是，有朝一日，让他傍晚时分站在外滩，看看那匆匆而过的车流，几乎没有哪一个苦力的脸不是憔悴苍白的，好像是痛成这样的，许多人的脸其实都是扭曲的。虽然黄包车苦力的生活远远算不上称心如意，但他确实以自己的乐天心态从中获得了一些乐趣。有家黄包车公司本着善意，承诺在公司总部为公司的伙计们免费提供热茶，但是这个计划没有成功，因为苦力们更愿意自己去茶馆买茶喝。低端的茶馆尽管条件恶劣，却是最受苦力喜欢的聚会场所，在这里，到处都是他们的好友，他们可以闲聊、吸烟还可以赌博，直到他们不得不去继续工作。

与其他苦力相比，那些冬天从农村来到城市、春天又回去务农的苦力可以说算有钱人了。极少数——少到可以忽略不计——能够靠拉黄包车盈利谋生，像那个之前在某户人家做“伙计”、月薪6美元的那个男人，放着“伙计”活儿不干，去做黄包车苦力，因为他说可以赚得更多。

许多物品会落在黄包车里。有乘客下车就急匆匆地走了，忘了还有包裹或是雨伞，那就是他最后一次见到这些东西了，除非他事先想到要看看黄包车的号码。不过也不尽然。这些可怜的苦力每日都得依靠这份微薄的收入生活，这就让特别实诚的车夫在五颜六色的人群中脱颖而出。有位上了年纪的先生，带了一个非常贵重的包裹，下车的时候把包裹就放在了黄包车上，然后进了一家商店。他处理的事情耽搁了他一段时间，最后他坐电车回家了，完全忘记了还有一辆黄包车在等他。过了许久，这个苦力——没注意到这位先生已经离开了——走进店里去找他。有位店员说他已经走了。这时候，苦力带着“奖品”走人的机会就来了。但他没有，不一会儿，他把包裹带进店里，放在柜台上，焦急地询问如何才能物归原主。因为这位先生是这家店的常客，所以店员同意将包裹送去他的住所。那位苦力，不仅没有因为诚实得到任何回报——因为他消失在茫茫人海里了，要找到他是不可能的——还损失了时间和车费。还有一个例子，有位女士从黄包车跨出去的时候，丢了一张5美元的钞票，在她走后，苦力才发现。不确定那位女士进的哪栋房子，这位苦力就挨家挨户地找，直到他找到了钱的主人，将其归还。有时候，有些不诚实的行为发生得猝不及防，有些不守道德原则的乘客——说来伤心，有时候有外国人——坐黄包车坐了几个小时，然后为了躲避苦力、不付车费，就走进了某家店或某栋房子，再从另一扇门消失。

黄包车并非源自中国本土。是早在五十年前从日本引进的，而且在未来一段时间以内，有望继续出现在上海的街头，尽管更加现代化的交

通工具愈发流行。

有一家为黄包车苦力设立的基督教布道所。这是在四年前由一位苏格兰商人创办的，这位商人一直将备受忽视的这一阶层的精神需求放在心上。在苦力人口密集的地区有两个中心，除了为黄包车苦力的孩子创办的主日学校[(1)]和私立走读学校，以及为妇女举办的一周一次的宗教礼拜，还有平日以及周日礼拜在中国的出租屋里进行。当地的传教士前往那些男性的家中以及他们素日常去的茶馆拜访他们，妇女之间有女读经员走动，天气冷的时候，他们会为那些真正贫困潦倒的人送去热腾腾的米饭和暖和的床铺，会将病人送去医院。有一年圣诞节礼拜仪式上，赠予了每位苦力一条廉价的毛巾，这让他们乐不可支。但是不要以为，苦力之所以觉得满足是因为可以擦掉手上和脸上的几层灰。这一考虑因素，就算他们真的想到了，也完全是次要的。这条毛巾主要是在他们拉车的时候用来擦额头上的汗水，这样他们能看得更清晰些。那些苦力十分讶异，不敢相信竟然有人关心他们，这是令人最受触动的。起先，当他们一窝蜂地挤到大厅的时候，他们会对着传教士说道：“这是给我们的吗？”集会结束的时候，“我们从未见过这样的东西！”他们之中有许多悟性高的皈依者。这项工作的资助来源是那些苦力自发的捐助——虽一贫如洗，仍慷慨解囊。有些人有志建一座教堂！这是一个崇高的目标，但是就他们那微薄的财力而言，这是不可能的。

1907年电车开始在上海公共租界内通行。六年后，华界引入了电车。中国这座城市里的所有街道都不够宽，汽车无法通行，因此计划沿城市四周建一条轨道，取代老护城河，这一圈要不了多久就能完工。这些车子内部分成了面积不等的两段，大的是三等座，小的是一等座。有些外国人乘坐三等车厢，许多中国人坐一等车厢。租界内有一条线路，中国妇女可以付三等座的车费而乘坐一等座，这是因为中国男子在三等座车厢中对她们粗暴无礼。在三等座车厢中，有两则通告异常醒目。一则是禁止随地吐痰，工部局卫生部为预防结核病张贴的。另一则是警告乘客，切勿在车子行驶过程中上下车。这一警告还配有一幅彩图加以强调，图片上一名男子从车上跳下来，摔倒躺在地上，伤口鲜血直流。尽管如此，每年都有一些中国人无视物理定律，看见外国人这样做便去模仿，最后因此丧生，受伤的就更多了。不过，这些事故并没有阻止他们乘坐这些车辆，在高峰时段，还会成群地挤上车。几乎每辆车都带有拖车，除了为头等舱乘客预留的几个座位外，那上面也挤满了中国人。车费按照乘坐的路程采用分级票价。驾驶员和售票员都是中国人，后者的英语水平仅够收车费。但如果这座城市里有外地人用英语询问一些基本

信息，他就很难听懂了。1914年秋天，从英国引进的无轨电车在某条路上试行，但结果证明，电车太重了，地面无法负荷，一两周以后便被禁止通行了。第二年春天，路基加固了，这些车辆进行了第二次试行，这次取得了显著的成功，它们很快就流行了起来。上海还没有地铁和高架电车出现，但是在最杰出的中国公民之中，有一位的儿子已经在巴黎学了一段时间的飞行，所以在不久的将来，待他回国，差不多所有的新事物都有望在这个东方的先进地区得以发展。

上海是远东地区最大的航运港之一，每天要处理大量的货品。除了手推车，以及将货物用绳子捆起来、用棍子担起挑在肩上的苦力以外，手拉板车也会经常用上。苦力取代了作为役畜使用的马匹和骡子。确实，外国酒店和许多外国公司都有自己的小推车和货车，现在更多的是汽车了，但是这些西方制造的车辆总数远远不及本土的手拉板车。这些板车采用最简单的设计，将几张长方形的木板钉在一起，再装上两个轮子。大多数货物都必须用绳索捆绑好，不会考虑重量问题。苦力的肌肉就遭殃了。通常安排三四个或者更多的苦力在板车前面拉，还有几个在后面推。15英尺或20英尺长的粗绳，一端拴在板车上，一端打上结。苦力一人拉一根绳子，从肩膀上套过去——偶尔换一边肩膀缓一缓——用双手抓住绳结。如果货物太重了，例如铁棒或建筑石材，那么即使在平路上，车夫也不得不经常停下来休息会儿，缓口气。但是展开拉锯战的是穿过苏州河上的拱形桥。前面的苦力身体前倾的角度差不多翻了倍，后面的苦力拼尽全力地在推，直到他们的脸都充了血，好似他们必须将体内的每一根血管都爆破才行。但是板车有可能还纹丝不动。休息片刻后，他们又作出了一番努力。这一次，后面的苦力抓住车轮，最后成功地让它们转动了一点点，板车慢慢地——非常慢、非常慢地——上了斜坡。待拉到桥面的最高点，除非前面的道路畅通无阻，否则又得停下来。然后那些之前一直在推车的苦力，向后拉着车，其余的苦力也过来帮忙，而前面的苦力火力全开地向前冲，以防被板车撞到。这样一种残忍的完工方式，令外国人印象深刻，极大地引起了他们的同情心。但是如果突然从人力改为使用马匹的话，毫无疑问，这些苦力一定会第一个大声提出抗议、表示反对的。

---

(1) 又名星期日学校，英美等国为在工厂做工的青少年提供免费宗教、识字教育而创办的学校，通常在星期日开课。

第七章　学堂之印象

“不算教会学校，上海有多少所面向中国人开放的学校？”有人向基督教青年会的一位干事询问了这一问题，这位干事刚刚与其他人一起完成了一项就这座城市教育设施展开的调查。“要确切地说出有多少所，是不可能的，”他皱着眉头，回答道，“就我们能找到的计算，至少有500所，有可能更多。这当然不包括女子学校。关于女子学校的详情，可以询问布兰克小姐。”女子学校调查委员会主席接受了采访。她拿出地图、图表和报告，把它们展开放在桌子上。“这是一项非常艰难的调查，”她解释道，“仅寄宿学校，我们就找到了三四十所，但这还不是全部，这一点几乎是可以肯定的。有些学校隐匿在最为奇怪的地方。”“女子学校和男子学校的数量，差距太大了！”访问她的人惊叫道。“嗯，好吧，你得记住，我们还没有将小型的私立走读学校统计到表格上。那些学校数不胜数，到处都是。”列举的大部分学校都是1900年以后建立起来的，有许多是在1911年革命时期出现的，或是紧接革命后出现的。

就这些统计数据而言，上海儿童的教育条件似乎是相当不错的，但是缺乏义务教育制度，成千上万个儿童在工厂打工、签订了契约做学徒，他们从未跨入学堂半步，有的被推去外面行乞，有的就在闲混。

公共租界市政当局为四所面向中国男孩（没有面向女孩子的）开放的大型公立学校提供资助，场地均由热衷慈善的中国人捐赠，这些建筑物的税收由租界内的本国居民——占了人口的大多数——缴纳。

法租界最为美观的建筑之一就是一所面向中国男孩子开放的公立学校。

私立学校——或称为“贵族学校”——深受中国人的欢迎。在上海，这一类学校的数量远比其他类型的要多得多，而且在政府管辖的学校之中，有许多是由个人或私营企业创办的，这一事实颇为有趣。中国是一个崇尚学识高于一切的国家。只要是写过或是印刷过的纸片——哪怕上面只有一个汉字，都不可随意吹刮，也不可在脚下践踏。这些宝贵的碎纸，尽管可能已经脏了碎了，还是会被那些男人或男孩子用钳子或尖头棍子不辞辛苦地拾起来，这些人在街上来来回回，寻找这些碎纸。富人会雇用代理人来完成这项值得赞赏的工作。这些纸被运到公共焚炉烧毁，之后灰烬被扔进了河里。人们认为，充分尊重象征知识的神圣之物

的那些人，上天会特别地庇佑，这种信仰已有千年历史。因此，对中国人而言，创办以及维持一所学校的运转，自然就是个人可以为人类提供的最高级别的服务形式了。

自从西方教育传入中国以来，中国许多最优秀的年轻人都倾其所有、献其一生、加以推广。仅上海就可以列举诸多例子，大同学院（Akademio Utopia）[(1)]就是其中之一。四年前，十个满腔热血的年轻人在一栋小出租屋里创办了一所学校。他们没什么资金，但每个人都同意将收入的20%用于支付运营费用。曾在国外留过学的几个人也奉献出自己的时间，教一个或更多的班级。校长毕业于康奈尔大学（Cornell University），也是该校入选美国大学优等生荣誉学会（Phi Beta Kappa）的第一位中国学生。学生缴纳的学费很快就足够支付或差不多够支付当前的开支，学生人数很快就超过了100。到了又必须要建楼的时候，这些年轻的发起者再一次自掏腰包，将他们那微薄的收入大方地出了手。校长的父亲在经济上施以了援手，但校长本着男子气概的独立精神，拒绝了，他宁愿依靠自己和学校的资源。这座精美的新楼已经完工并投入了使用，尽管课桌是用普通的长椅代替的，随着债务慢慢地还清，课桌以及其他所需的陈设以后都会添置。

在租界内的平民区，有一条外国人不太常去的街道，那儿有一所既可以寄宿也可以走读的学校，有550个男生在那儿就读。与之前的学校不同，这一家完全合格，是义和团运动那一年创办的——义和团运动后有众多新机构诞生。这所学校由三栋砖楼组成，中间一栋顶上建有一座庄严的钟楼，三栋楼都由带顶的走廊连接起来。主楼分成了前后平行的两部分，中间有开放式庭院，楼上有天桥相连。这样，46间教室都能保证良好的光线和空气。有一间实验室，一间配有阶梯式座位的科学教室，一间提供中英文书籍的图书馆，一个为纪念孔子而建的大厅，墙上挂有卷轴，上面题有孔圣人著作中的语录，学生们每半年在那里聚集一次，进行拜读，最后还有一间接待室，主要的摆饰是学校创始人的半身画像。创始人一开始是靠小船谋生的。他挣的钱一分一毫都攒起来了，慢慢地他便开了一家小型金属制品商店。他很有商业头脑，一步步地发展，慢慢地累积财富，直至他成了百万富翁。这个白手起家的人，虽然从未学过识字，但心怀抱负，慷慨解囊，为穷人提供免费教育。年过花甲的他萌生了创办一所学校的念头，这是他可以为这座城市留下的最美好最永恒的纪念。计划制定好了，大楼开始建了，但是这位慈善家并没有活到大楼完工的那一天。不久，一群上海商人就竖起了一尊他的雕像，以表纪念。这位创始人的儿子们在位于操场和户外体育馆中间的学

校区域为他们的父亲建立了一座美观的小纪念堂，他们定期去那里跪拜祖先的牌位，就像学生们跪拜接待大厅里这位慈善家的画像一样。但是他们不爱学习，对学校里的一切也没兴趣，这证明保守派并不止上个世纪才有，新世纪也并不都是进步的人士。学校收费一直较低，整个学年有十个半月，寄宿费加学费还不到24美元。其中有50个男孩子是免费资助的。学校里教授英语和法语，法语是本校一位毕业生教的，还有一个规模较小的工业系。学习年限11年，将学生一直教到高中三年级。

靠近华界南门或是南门以前所在的位置，有一栋普通的红色砖楼，英文名叫“上海中学”（The Shanghai High School）。内部布置再简单不过了，横穿其中的是大厅——也是寄宿生的食堂，大厅两侧都是教室。楼上是宿舍。在这栋楼和另外三栋小楼里面，有500个男孩子——有一半是寄宿生，平均年龄16岁——正在接受全面的教育。有位外国教育工作者在访问该校时说道：“这表明中国人可以用非常有限的设备取得异常出色的成绩，这些设备可以在方方面面满足他们的实际需求。”这所学校的故事值得借鉴。十三年前，四个进步开明的兄弟联合起来，致力于上海年轻人的教育事业。他们没有足够的钱在合适的地点造楼，于是将自家住宅布置成学校，大部分都是用自己的积蓄。其中三个兄弟是成功的生意人，排行第四的成了校长。老四毕业于上海新教圣公会圣约翰大学，正值早壮年时期，有着文人品味及修养。这所学校一开张，就有90个男孩子蜂拥而至，学生人数迅速增加，一两年内就有必要寻找更为宽敞的宿舍。与此同时，学校得到了当地政府的认可，并获得了年度拨款补贴。中国市政府为新校舍捐赠了一些公共土地，现在的这栋宏伟建筑是1909年竣工的。学校招聘了30名老师，其中有3位外国人——都是女性。某天，谈到所招外籍教师的资历时，有朋友提到其中一位以优异的成绩毕业于爱丁堡大学。“没错，”校长微笑着说，“我觉得自己能招到她很幸运，不过我向来都是为学校寻求最好的，因为保持最高水准是我的目标。”而且他确实这样保持了，他的几名学生经考察无条件被圣约翰大学录取一事则可证明——这是中国人经营的学校第一次获此佳绩。

四兄弟创业四年后，他们的三个姊妹创办了一所女子学校。这所学校和其他学校一样，起步规模较小，但从一开始就取得了显著的成功。后来，学校发起人也获批了公共土地用以建造校舍。更重要的是，当时正在拆除城墙，城墙上的砖块便被捐来用作建筑材料。历史上有名的老城墙有一部分摇身变成了中国女子学校，还能想象出比这更奇特更浪漫的事情吗？设计这些城墙的城市元老们对于这样不合时宜的“亵渎之

举”得有多震撼多畏惧啊！孔子本人就更不用说了，他也没有预见女性可以自由地接受教育。三姊妹都结婚了——有一个是寡妇——她们的家人都住在学校后面整洁有序的公寓里。她们生活富裕，教书是为了爱，并不为了钱。实际上，这所学校尚未做到自给自足。三姊妹有一位是校长，另一位指导刺绣课程，第三位管业务。130位天真烂漫的学生，除了那些常规学科以外，还学音乐、素描、油画和简单的缝纫。她们定期从一位在波士顿受过教育的中国年轻女子接受体格训练。该校已经向几个展览会送去了精美的刺绣和绘画样品，并荣获奖章。

五十年前，一位女婴出生在上海一户富贵的中国人家，其职业生涯注定是不平凡的。她是在荣华富贵里养大的，在家接受着简朴的教育——娇惯孩子的父母通常让她这种地位的女孩子在家接受教育。她选择不婚，父母同意了，最后她加入了一个提倡苦行的被称为“素食主义者”的佛教徒团体。岁月流逝，这个女孩子已然长大成人，度过了39岁生日。她早就注意到，父亲是个思想开明的人，而且经常捐款资助女子学校——女子学校已渐渐变得常见了。“如果我父亲对女子的教育感兴趣，”她在心中盘算着，“我为什么不干脆办所学校，他来帮助我呢？”但当她向父亲提起这个计划时，他严厉地皱起了眉头，她的继母更是强烈反对。别人需要教育或许还能容忍，但是他们女儿接受的教育已经足够了，更不要说她竟然渴望成为促进教育的媒介。此外，父亲意识到女儿年纪虽轻，但能力超群，于是他有了自己的打算，以后可以让她帮忙管理他的财产。然而，父母越是反对，她的决心就越强，直到最后，这场争执差不多剥夺了她的继承权，她被赶出了父母的屋檐下。她用她所有的一点钱，成功地办了一所小学校，后来卖掉了她的珠宝，以维持学校的运转。那是十二年前的事了。她曾搬过两次家，最后一次是在1914年春天，她搬到了一幢漂亮的新楼里，这主要是用父亲去世时她继承的遗产所建。新楼建成后举办了一场非常重要的开幕式，邀请了许多中国客人和一些交好的外国人。礼堂的墙上挂了一张校长父亲的大幅肖像，因为在中国，无论狂风吹得多么狂野，孝道之花都鲜少枯萎。讲台上方挂着中国国旗，随风飘扬。女孩子们的劳动作品经过详细的整理，正在侧室里展览。

这所学校的建筑和场地总是一如既往的整洁，充满吸引力，一天中无论什么时候有访客意外来访，都必会发现，宿舍和大厅，甚至连厨房和洗衣房都经得起最严格的检查。幼儿园的校舍和主楼稍微有点距离，在任何地方都很难找到同类型之中比这更完美的典范了。可行的时候，会时常召集孩子的母亲们开会，直白地讨论与孩子道德、心理和身体健

康有关的事项。

毕业典礼那天的庆祝活动非常隆重，博得满堂彩。去年，四位“甜心毕业生”坐在舞台上，着装十分相似，都穿着中国风的白色丝绸、外国式样的白色高跟拖鞋，脖子上系着蓝色丝带打的小蝴蝶结，头发上绑着窄窄的蓝色丝带发箍。这一届的颜色是蓝色和白色，女孩子身后拉着她们这一届的横幅，白底上用蓝字写着她们的校训“精益求精”。每位毕业生都准备了一篇用英语写的文章，但只读了一篇——《中国年轻女性的影响和责任》。这篇文章的思想和语言可以让任何一个地方的女学生都增光添彩。其他学生写的是《关于义务教育的必要性》《抽烟习惯的弊端》《中国教育相较于国外教育的优势》。歌曲、钢琴独奏、二重奏和八手联弹曲目、英语和法语朗诵，最后中国外交事务专员以一篇极具口才的演讲《女性教育的价值》结束了本次活动，整场活动都井然有序。然后便是激动人心的高潮环节——闭幕。前任驻美公使伍廷芳博士，[(2)]从校长手里接过用丝带系着的毕业文凭，然后授予每位毕业生，这是公认的西式风格。很难想到，站在伍博士旁边的那个如此朴素腼腆的小女子——穿着简单的深色旗袍，头发按照中国过去的发式直接梳到了脸后——就是这所最成功最现代化的学校的创始人和管理者。她不会说英语，可以的话，她都更喜欢待在幕后，但她的个性却非比寻常。她虽然没有自称是基督徒，但内心是个虔诚的信徒，她会定期参加新教圣公会宣教教会。

另一所受欢迎的女子学校通常被称为“女子法政学堂”（Suffragette School）。与其他许多学校一样，这所学校是最近这场革命结束的时候创办的，而且发展起来了。由于革命的迫切需要，女性涉足了公共领域，尽管此前她们从未想过涉足其中。一些曾经学过医学的人去前线做了医生，更多的去了红十字会做护士。许多人充当间谍、乔装成难民，向士兵运送弹药，为她们的国家献出了财产以及生命。来自各地的一百来名女学生——大多都是离家出走的——聚集在上海，怀着受人激发的满腔热忱，要全身心报效国家，她们穿着统一的服装，昂首挺胸，进行训练，乞求准许她们立即行军，前往前线——万幸没有准许她们这样做。她们被称为“亚马逊女战士”。[(3)]不管怎样，所有的这一切都激发了上海女性的爱国情怀，许多公司联合起来为这场革命筹集资金，而且她们做得非常成功。战斗结束的时候，她们并没有解散，而是成立了一个永久性组织，名叫“中国妇女合作协会”（The Chinese Woman’s Co-operative Association）。该组织旨在保护妇女的整体利益，尤其是为女性争取选举权。

如今这个协会依然存在，但是风格改变了许多，人员也减少了许多，因为那些最为棘手的极端之徒已经消失了。偶尔会召开会议，男性经常受邀在会上致辞，主席一职由一名女性担任。自革命以来，该协会展开的主要工作就是创办及发展女子法政学堂，旨在将先进的思想灌输给年轻人。起初，任教的老师——都是女性——没有工资，对男性和婚姻不屑一顾，心生厌恶。教授的课程虽包括西方研究，但侧重点是中文学科，特别是汉字的书写——学生写得特别好。学生被鼓励用中式布料做衣服，在家中使用中式家具，保留旧时的习俗和旧时的信仰；简而言之，要做个纯粹的中国人，不受外国货和外国宗教的影响。

这所学校人员兴旺，经济状况倒没那么理想。一天，有位感兴趣的传教士在和C小姐谈论这所学校——C小姐不久前毕业于韦尔斯利学院（Wellesley College），[4]是校长的亲戚。“你说这所学校很穷？”“工作质量不差，但是，确实，很穷。”“这是什么原因？”“嗯，它没有经济上的支持。你听我说，革命刚结束的时候，很多女性都热衷于选举权。但现在不一样了，他们对继续经营这所学校并没有那么大的兴趣。”“你觉得是什么让他们对选举权的问题没那么感兴趣了？”“他们不相信在中国推动选举权的时机已经到了。他们认为目前有其他事情更加重要、更为必需。”“你个人怎么看？”这位年轻女子一副若有所思的模样，那明亮的双眸在向她提问的这个人身上停留了片刻，然后斩钉截铁地说道：“我相信有关选举问题，我们还没准备好，若还想着这一问题，并为之努力，使我们分心无暇应对更大的需求，这是错误的。”

以往脱离实际的方法逐渐被“新学”淘汰，将学校工作与人民生活联系起来的欲望也愈发强烈。迄今为止，技工培训在中国并未受到重视，但是，共和国[5]已经慢慢地意识到了它的重要性，因此这类学校如今是最受大众欢迎的，而且得到了政府和私人的最大支持。在上海，商科和技工学校，或者在课程中增添这些科目的学校，在不断增加。

全球华人学生联合会（The World’s Chinese Students’Federation）——总部设在上海——正在组织日间和夜间学校，参加人数众多。教师免费提供服务，都是些有独立收入的年轻人，或者是那些有能力并且愿意为这项工作投入一部分时间的人。校长只有21岁，毕业于基督教青年会学校，天赋异禀。

在上海，得到中国政府大力支持的最重要的学校是交通部上海工业专门学校（The Government Institute of Technology）。[6]和许多其他教

育机构一样，这所学校最初是由个人——一个身居政府高位的人——推动创办的。这所学校创始于1897年，最初是一所师范院校，后来增添了预科和文法学院的科系，在约翰·卡尔文·福开森（John Calvin Ferguson）[7]博士的精明领导下，发展成南洋大学堂（Nanyang College），后来又增加了土木和电气工程方面的课程，改名为交通部上海工业专门学校。宽敞整洁的场地之中，美观的建筑、齐全的设备、优秀的教师团队——其中8位是美国人——保持的工作水准以及庞大的学生群体所有因素综合起来，使得这所学校很有可能让上海为之自豪。这里每年都会选派一些最优秀的学生到欧洲和美国进行一段时间的实习训练。

矿业和铁道学堂（The Mining and Railway College）没那么大，也没那么古老，但是凭其自身的特色也相当引人注目。其创始人，也就是该校的校长，是个30岁刚出头的年轻人，面容精致、轮廓分明、颇有学者风范、态度亲和。他在香港皇仁书院（Queen’s College in Hongkong）[8]完成学业后，去国外旅行，其间他渐渐相信，比起其他任何东西，中国更需要的是训练有素的工程师。于是，四年前（四年前上海发生了许多事情），他独力创办了这所学校，毫无保留地将其全部心血和家产投入到这项工作。学生规模已达260名，正如人们所希望的那样，学生是一群年轻人，前途无限。他们几乎来自全国各省，有一些来自爪哇。15名教师中有5位曾在国外学习过，但只有一位是外国人——一位教授矿业和矿物学的比利时人。学生一入学就立马学习英语课程，短短一年他们取得的成绩就非常出色。书法是一门专业课程，“因为，”校长说，“除非这些男孩子学会认认真真地写字，否则画画他们是画不好的，而作为工程师，画画是他们必须要会的。”

德国人为中国学生创办的医工学堂（The School of Medicine and of Engineering），[9]有其独一无二的特色。上海有位杰出的物理学家说过，在他看来，这是中国最好的教育机构。这所学校两大科系截然不同，学校性质既不是教会学校，也不是慈善事业。纯粹是德国政府出于商业意图而兴办。他们提供最好的培训，收取高额学费——对中国人而言，目的是让这些人为以后从事的工作做好准备。这里配备了最高水准的师资力量，按照收取的费用水平，提供最为完善的科学设备。

在上海的所有学校中，小型的走读学校或许是最吸引人的，这源于它们一贯秉承的人情味以及蕴藏其中的可能性。这些走读学校类型不一，优异程度——或者说拙劣程度——各异，这取决于怎么看待它们。

总的来说，大多数似乎都还不错，即便是最差的，也使得孩子不至于流落街头。有些特征通常会引人发笑。在这座中国城市里，门口的招牌上会出现一则相当特别的通告："英语字母从A教到L。"字母表中剩余的字母要怎么办，并未解释。走在某条小路上，路人可以看见用大大的英文字母写着"天天向上学校"（Daily Progressive School）。一所中式的老房子里，有两间灯光昏暗、并不干净的房间，里面有三四十个孩子把身体伏在他们那粗制滥造的课桌上，用叫嚷的语调大声地学习。偶尔有访客来的话，校长便让他们安静下来，并满腹自豪地指着地理课和英语课所用的国外教材。他也有理想，当提到学校的名字时，他回答说："没错，这就是我想要做到的——每日都进步一点点。"他补充说道，他的"天天向上学校"已经在上海其他地方创办了两家分校。然后是一个意想不到的问题："你是基督徒吗？""我是基督徒。"他随即说出就读的那家教会学校的名字。

有时，一座布局凌乱的老房子后屋还藏着一所小型的走读学校，或是在一座佛教寺庙的里屋，那里蜿蜒曲折，宛如迷宫，不熟悉的人很容易迷失方向。在群情激愤、打破旧习的革命时期，寺庙和祠堂都被临时政府大规模地改造成学堂，尽管有许多现已恢复了原来的用途，但仍有一些——如上海的李鸿章祠堂[(10)]——仍然留作学习的场所。用公款筹建的这一伟大政治家的纪念馆，五年前由复旦中学（Fuh-tan College）的受托人拥有，如今，著名的李公铜像[(11)]——基座设于园内——每天都俯视着350名在数不胜数的庭院和走廊中匆匆过往的学生。毕业典礼在祠堂举行，那儿背景华美，高台上坐着中国的校长——耶鲁大学的校友——他身边坐着全校教师，全体着学士帽和长袍，构成了一种怪异奇特的场景，而这在那个过渡时期是很常见的。

去年，有30位年轻人从省立师范学校（Provincial Normal School）[(12)]——校区设在上海——毕业，自该校办学11年来，已有500多名年轻人走出了校门。社会上对教师的需求如此之大，以致早在学年结束以前，毕业班的每位学生就已经都被人要走了。这所师范学校校友遍布全国各地。学校附近有一家拥有400名学生的大型实习学校。师范学校的学生学习音乐、陶艺、木雕、油画和素描，他们是怀有一腔热血的爱国志士，对一切施加于他们祖国的侮辱行为——无论是真实存在的还是他们误以为的——都深表怨恨。他们有时会采用一些独创的方式表达他们的爱国情怀，正如不久前他们所做的那样——当时日本对中国提出无理要求，国内情绪高涨。这些男生的宿舍和教室通向那些布局凌乱的庭

院，或者说是构成校舍的一连串中式建筑。这些房间被清空了，每一间都变成了展示与当前政治问题相关的图片或材料的地方。许多展品设计得非常精明，有些是很有趣的，不过所有展品都鲜明地传达了学生群体的愤怒之情，而且表明了那些被派往中国的教师将他们的观念灌输到了新生代的思想之中。

几个月前，上海有个年轻人去找他父亲，求父亲将家里的赌款拿出一部分给他，这是那个时代精神的重要体现。他拿着这笔钱创办了一所学校，学生人数现已达150人。省立教育协会（Provincial Educational Association）的干事——去美国旅行了很长时间，最近刚回来——请一位常驻上海的传教士给他上英语课。美国体制的优秀之处让他印象深刻，他决定尽快将相同的方法引进自己的学校，并希望更好地掌握英语，这样他可能会够格选取教材、安排学习课程。

去年夏天，上海县县长[(13)]首次规定，7月22日至8月25日这五周，小学统一放暑假。发布通知的时候，县长还增加了一项条款，大意是说，假期之中学生必须在两周的时间里每天花三小时复习功课。

上海有两所日本人办的学校，办得红红火火的。其中一所是大型公立学校，该校发展迅速，校舍楼群已经新建了一栋，足以容纳六七百名学生了。所有年龄段的男孩和女孩都被安置在同一屋檐下，但是读幼儿园的小孩子除外——他们使用单独的房间，休息的时间也不一样。他们穿着色彩艳丽的服装，构成了一幅美丽的景象：玩耍的时候在阳光下跑来跑去，仿佛是光芒四射的蝴蝶一样；或是下课后欢天喜地地涌到了街上——有的是由保姆陪同坐黄包车走的，更多的是步行，许多儿童则是爬上了电车，用他们那脏兮兮的小手攥着铜板，每个人都带着一个书包，或是几本用方巾包起来的书，还有一个小饭盒，每个小顽童头上都戴了一顶整洁的小军帽。

另一所学校是日本公学（Japanese College），[(14)]有近300名学生——身体强壮，心思警觉，全都是精挑细选出来的。他们由各县选拔出来，从日本派遣到上海学习三年，每项费用都可报销。学习课程包括商业、工程学和农业。学校办学14年以来，已有800位学子毕业，去年6月，有70人获毕业证书。第二学年结束的时候，由学校出资，将七八十名最有前途的学生送往中国各地，研究这个国家及其现状——包括农业、矿业、社会以及政治。“等这些人读完了公学，会回到日本，是吗？”有人问到校长。“啊，不是，”校长强调道，“他们将留在中国，帮助中国人开发他们的资源。”

上海有一批不是为了学习书本知识而创办的学校，在特定领域具有极大的价值，民众对此基本上都不了解。那就是面向妇女和女孩子的六所胜家缝纫机专科学校（Singer Sewing-Machine Schools）。[(15)]10年前，胜家缝纫机在中国亮相，至今无可匹敌。它几乎立马就让中国人着了迷，现在随处可见，即便是在最想不到、偏僻得离奇的地方亦是如此。1910年，胜家缝纫机专科学校在上海创办。起初，他们取得了小小的成功。面向男性的那些学校成绩惨淡，很快就关门了。少数几个学校敢于招收妇女和女生，但是必须要给报酬女性们才去。不过以往的保守主义似乎随着革命消亡了。表现最突出的学校现有50名学生。培训期限依据所承接的工作类型——是简单的裁剪还是花式绣花——可为3个月、6个月或12个月。这些学生来自五湖四海，他们计划回到自己的村子或镇子，自己开办一所学校，以此将这些机器引入全国各地。中国已经有400多家销售点，每一家由一名中国代理商负责。这些机器可分期付款购买。“我们觉得我们是在用自己的方式做传教士，”该公司驻上海的外国代表说道，“我们以分期付款的方式，向那些勤劳的穷人出售我们的缝纫机，以减轻他们的劳动负担，这难道不是一种慈善吗？”胜家公司大方地为所有善行提供支持，在大革命以及次年的兵变时期，它将机器免费借给那些为穷人制作服装的组织机构。它有一个行之有效的广告方式，那就是让一些男性穿着自家店铺制作的华服，走到上海的街头，同时将一些小物件摆在便携式展柜里出售。

---

(1) 直译为“乌托邦学院”，应是上海最早的私立大学，1912年成立，1921年更名为大同大学。首任校长胡敦复（1886—1978），江苏无锡人，曾留学于美国康奈尔大学，1912年与立达学社同仁创办大同学院。—— 编者注

(2) 伍廷芳（1842—1922），清末民初外交家、法学家，获伦敦大学学院法学博士学位，曾被清政府任命为驻美国、西班牙、秘鲁公使。

(3) 古希腊神话传说中一支完全由女性组成的战士群体。

(4) 成立于1870年，位于美国马萨诸塞州，著名的女子学院，宋美龄、冰心曾在此就读。

(5) 指辛亥革命后成立的中华民国。

(6) 全称为Government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of the Communications Ministry，英文缩写为GIT，即上海交通大学的前身。上海交通大学名称多次变更，1896年名南洋公学；1911年更名南洋大学堂，1912年更名交通部上海工业专门学校，1929年更名国立交通大学，1959年更名上海交通大学。

(7) 福开森（1866—1945），加拿大教育家、文物专家、传教士，曾任南洋公

学监院。上海曾有福开森路（今武康路）。

(8)　香港最早的官立中学，也是香港著名的男子中学，以英语为教学语言。前身是创立于1862年的中央书院（The　Central　School），孙中山曾于此求学。

(9)　应指1907年成立的德文医学堂，1908年更名同济德文医学堂，1912年成立工学堂后更名同济德文医工学堂，今同济大学、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和上海理工大学的前身。—— 编者注

(10)　李公祠（李鸿章祠堂）隐身在百年名校复旦中学内，建于1904年，后为纪念复旦中学第三任校长李登辉，又更名为登辉堂。现为复旦中学校史陈列室。

(11)　今已不存。

(12)　指江苏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此前上海地区属江苏省，1927年上海特别市成立，直辖于中央政府，上海始有直辖市一级建置。

(13)　1925年，北洋政府允准上海改为淞沪市，此前为县。

(14)　有可能是上海东亚同文书院，前身是上海日清贸易研究所，培养了诸多日本“中国通”，在1920年前只收日本学生，长期组织学生在中国各地调查，有间谍机关性质。—— 编者注

(15)　胜家缝纫机于1851年由一位名叫列察克· 梅里瑟· 胜家的美国人发明。

第八章　行业之翘楚——商务印书馆

几个世纪以来，“笔尖胜于干戈”在中国一直被奉为公理，因为军人位处社会的底层，而学者则傲居顶层。确实，最近发生的事情，虽然没有彻底扭转人们的观点，但多多少少有所改变。但是改动后的俗语“印刷品胜于干戈”似乎已经流行起来，虽然早在古登堡（Gutenberg）[(1)]出生以前，古老的中国就发明了活字印刷术，[(2)]实际上，京报（Peking Gazette）[(3)]是有史以来发行的第一份报纸，从它发展而来的衍生品仍然在首都蓬勃发展。京报采用木活字印刷，有些至今依然存在，没人知道来自多久以前，尽管惯例是说早在千年以前。但几个世纪以来，这一技术鲜少为人使用，甚至到1894年甲午战争爆发时，新闻传播的速度竟然慢到距离海岸仅75英里的人们都不知道有这样一场战事。如今，单上海——在这个方面要远远领先于其他城市——就发行了30多种报纸和期刊，其中12种是日报。许多报纸都配有插图，而且家喻户晓的享有专利的成药的广告都刊登在重要版面上，这也证明它们是与时俱进的。

随着中国“新时代”的到来，借鉴西学的欲望日益强烈，长期被需求的不止有报纸，还有书籍，大量的书籍。于是，为了满足这一需求，商务印书馆（The Commercial Press）出现了。这家优秀的出版社快速地发展壮大，它的故事读起来就像读《一千零一夜》一样。这个主意是由三个头脑清醒的中国年轻人想出来的——他们仨都是脚踏实地的印刷工，都是基督徒，都出自上海一所长老会教会学校（Presbyterian Mission School）。1897年，他们使用两台小型印刷机开展了小规模的工作。门面是一栋中式房屋，位于一条主干道附近的小巷里。这块场地很快就不够用了，历经两次迁址，这家印刷厂最终在一组精致的砖房建筑群中长期安顿了下来——位于这座城市的北端，占地8英亩。如今，60台现代化的印刷机——最顶级的还未添置——每年大概要使用25000令[(4)]外国纸张和3400令中国纸张，大部分都印成了教科书，散发到全国各地，从满洲到西藏都有。大革命爆发后的那一年，尽管购买了新机器，也尽快地雇用了更多的工人，印刷机昼夜不停地运转，依然无法满足社会对书籍的巨大需求。

从一开始，商务印书馆的原则就是从不印刷任何与基督教相悖的书籍，这一目标一直在坚定地奉行。实际上，20多个部门负责人要么是基督徒，要么就是支持基督教的。

这家出版社管理员工的规定，在西方人听起来可能并没什么独特之处，但是与中国一直以来的情况——大部分情况今天依然存在——相比，才能清清楚楚地意识到这些规则的真正价值。商务印书馆雇用了约1400名男子和400名妇女。其中几个男孩是从北边一家传教机构过来的聋哑人，有一些是从上海少管所出来的——这家出版社雇用他们是为了让他们重新开始，还特地建了一栋宿舍供他们住宿。大部分妇女在书籍装订部工作，不过在出版社的各个角落都可以见到她们的身影，有些更轻便的机器由她们操作。其中有一名女工头，有几个聪明的女孩子在学习做簿记员。14岁以下的不招收，大部分工人年龄都远不止14岁。最近引进了一项新举措，允许妇女与男子在同一个房间工作，尽管是在不同的桌子上。事实证明这一举措取得了圆满的成功。所有人都在完全用心地做事，而且新安排与之前的相比具有明显的优势，因为房间的空间更大，员工可以享受更好的光线和空气。劳动时间为上午7:30—12:00，下午1:00—5:30。妇女下班的铃声比男性早五分钟。“女士优先，你看。”一名工作人员笑着向一位访客说道。妇女若是怀孕了，可以全薪休假两个月，还另外补助5美元以支付其他费用。工人们星期天休假。大约有八分之一的人是基督徒，工厂附近有两所新教礼拜堂，他们中有许多人都会参加。有专门的业绩奖金，工资也比较丰厚，还有一笔发给死者家属和退休老员工的储备金。分红也是制度的一部分，每个部门的主管都是公司的股东。

拥有一家配备20余张床位的小医院——配有非常整洁的医务室和手术室——是这家卓越机构的又一特色。护理员随时都在，有位受过国外培训的中国医生每天早上会到医院坐诊。该医院对外人以及员工和家属开放。所有病人都需支付三个铜板——约一美分——因为据发现，必须要收些费用以防止有人侵占这个地方。在商务印书馆附近，管理者建造了许多虽然小却舒适的房屋，租给那些喜欢在这里居住的员工，象征性地收些房租。有一所对员工子女开放的学校，为学徒工提供夜校和阅览室。有所幼儿园——商务印书馆为其提供了场地，配备了来自美华书馆（The Presbyterian Mission Press）[5]的教师——也在附近。

这些学校都不是免费的，因为父母付点学费可以更有自尊。员工下班后的休息场所环境宜人，配有茶庭，修剪整齐的草坪上有三三两两的灌木丛、鲜花和座椅点缀，颇为诱人。消防队是这家企业不可或缺的一分子。消防队由26名男性组成，都是在职员工，因为经常演习，效率一直很高。距主楼一步之遥的地方就是消防站，配备了鲜艳夺目的水带车、梯子、水桶，以及用来装安全性高的黄铜油灯的照明工具。对于那

些男士而言，除了统一的制服，锃亮的黄铜头盔也让他们格外自豪。外线打来的救火电话为数不多，但消防队依然随时待命。

来这家印刷厂参观的访客一直都是受到热烈欢迎的，会有一位称职的导游——尽可能安排一位员工——带他们参观整个机构。工厂场地很大，就算是粗略地巡视一圈通常也需要几个小时。有两栋楼用来印刷和铸造，一栋用作中文书籍装订所，还有一栋用作编辑部——中英文都有，然后是两个仓库：一个是木器工具储藏室，另一个——一栋长长矮矮的建筑，与其他楼房有点儿距离——用于摄影及其他事务。室内通风良好、干净整洁、令人愉悦，与中国大部分工厂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每栋楼的电话都通主楼，而且铺设了轻轨，以便来回运送货品。动力由电动机供应，照明既用燃气也用电力。

大部分印刷机是英国和美国出产的。那些用于更加精密工作的机器，包括创造奇迹的彩印大机器，是德国制造的。商务印书馆是第一家引入三色印刷的中国公司。人们会在这些奇妙的印刷机旁流连忘返。蓝黄红三色，按照顺序快速简便地就印到了地图、图表、图片和幼儿园画轴上，访客几乎就要相信，他正在观看的是魔术师表演的一种奇巧艺术，而不是一台没有生命的机器在机械地运转。放在眼前的是一幅色彩鲜艳的哥伦布踏上新大陆的图片，旨在用中文讲授美洲历史，那边同样是一幅吸引人的图片，上面是孩提时代的雷利（Raleigh），[(6)]用于诠释英国历史。许多印刷品被用作教材插图。商务印书馆针对小孩子出版的伦理道德方面的读物非常有吸引力，每一页都是一幅彩色插图，一页教一课。图片上描绘的是孩子在上学途中，向老师敬礼、背书、施舍穷人、关爱老弱病残、擦灰扫地、洗衣刷衣、补衣叠衣、刷牙、吃饭以及玩耍，房屋画得很干净很卫生，生活画得很洁净很健康。特别强调教养礼仪、品行端正，可悲的是，当时的势头令人惊慌——旧政权下那些真正值得赞美的一切都将摒弃，从西方传来的一切哪怕不好的都将被全盘接纳，而这些旧政权下的教诲正是如今的中国所需要的。小学一年级的课本中，几乎没有对阅读材料的介绍，只有几个汉字解释课文。小家伙们聚精会神地翻阅课文，在不知不觉中吸收知识。这与以往的方式相比简直是天差地别，以往孩子们整天都被关在黑漆漆的密闭房间里，大声读着中国名著中那些没有意义的词句，而老师却在椅子上打瞌睡！

这家印刷厂添置的最新设备是三台平板印刷机——远东地区第一家。有位专家从美国一起过来了，负责安装这些机器并指导中国人使用。他们经常一天24个小时都在忙着为政府印刷数以百万计的债券和纸

币。

对于编辑部的工作，再怎么褒扬也不为过。有栋僻静的三层楼建筑，整个二楼还有三楼的一部分都用作了编辑部。没有上漆的长木桌旁——上面堆满了书籍和纸张——坐着150名弯腰工作的学者。他们那忙得不停的工作室已经输出了4000多部原版书，除此以外，还翻译编辑了无数其他书籍。编辑部员工出版了八本月刊——一本普通杂志、一本教育的、一本政治的、一本学生的、一本儿童的、一本短篇小说的、一本妇女杂志，还有一本名为《英文杂志》（The English Student），每月发行两万本。最新出版的刊物名叫《英语周刊》（The English Weekly）。这两本英文主题杂志旨在帮助中国学生学习英语。《妇女杂志》（The Woman’s Magazine）是最受欢迎的杂志之一。有一天，有位留过美的聪明伶俐的女生和一群外国朋友谈起这本杂志。“想想看，”她说道，“最新一期上面刊登了烹饪鸡蛋的食谱，有十二种不同的方式。”“那有什么特别吗？”一位感兴趣的听众问道。“嗨，这些食谱不是用来做外国菜的，而是做中国菜！我以前从未听过有印刷出来的中国菜食谱。如果中国妇女开始了解饮食的价值，这对于她们的生活将具有非凡的意义。”《妇女杂志》创刊于两年前，主编是位男性。今年秋天，一名年轻女子将接替这一职位。她不久前毕业于韦尔斯利学院，嫁给了一位哈佛大学的校友。她谦虚可爱，和蔼地回答了外国访客的问题。“没错，”她带有一点歉意地笑着承认了，“我将试着做这本杂志的编辑。”“肯定会有助理编辑吧？”“哦，没错。”“是妇女吗？”“不，我觉得全是男的。”这位年轻的妻子是位漂亮的主妇，有理由认定她并不会因为即将在外面工作就忽略她的家庭和家人。事实上，没有人比那位年轻的丈夫自己更高兴了，这点很值得讨论。

关于商务印书馆的编辑部，有一件事很有意思，那就是大部分西方书籍并不是直接从英语翻译过来的，而是以日语为媒介。这是因为中国现行的教育制度是以日本的为基础，因而用日语译写这些科学术语更容易一些。但是，留洋归国的中国学生强烈认为，这种通过二手途径获取知识的方法必须马上被一种更加直接的方法所取代。

瞟一眼编辑室里面那些辛勤工作的人——他们倾注全部的心血，就为了振兴祖国，启发国人——内心没有一股莫名的触动是不可能的；看一眼仓库——一间间房子里全堆满了书，有的堆到天花板高，有的装在箱子里准备运走——也会让人兴奋不已。有些最大的订单来自最遥远的省份。这家出版社的目标并不是发行许多美观昂贵的书籍，而是让所有

人都能买得起的普及本遍布这片土地。

踮起脚尖，轻声走出编辑部，访客又走到了中英文排字车间，那里面呈现的是一幅非常不同的景象。中文字体有一种神秘感。由二十几个独立的小笔画组成的“汉字”可以用一块干净的铅块完美再现，简直不可思议。中文排字无比复杂。活字盘放置在倾斜的架子上，架子拼成了三角形状，排字工人站在里面。大约有6000个汉字是常用的，一副活字重达1500磅。英语文本主要是一位美国女士负责校对，一位葡萄牙人以及多个中国人从旁协助。印刷部后面是铸字厂。铸字是一门技术活，都是大规模操作的。实际上，很长一段时间内，市场上（的活字）基本都是商务印书馆供应的，他们生产的尺寸成了全中国通用的标准。字模都放在防火的保险柜中保存，这是这家公司最具价值的资产之一。有几台现代化的自动铸字机在使用，但是数量远不及旧式的手工机器。老式机器生产的铸字模必须得分类、修整、抛光，这些工作都由女性完成。“我们并非一直热衷于使用新的机器，”工作人员解释道，“因为中国的劳动力太便宜了，而且为尽可能多的穷人提供工作也是在做好事。”

除了学校里用的物理学、生理学、化学仪器，用于生产劳动的工具以及簧风琴以外，商务印书馆车间里采用的所有小型机器几乎也都是由他们自己的铸字和木工车间制造的。承接订单印刷部门绝对是最现代化的，已有了巨大的收益。最近，该公司的一名负责人为研究最先进最时兴的印刷工艺，前往世界各地游览。这家印刷机构每月都要散发两百份英文版的基督教青年会官方刊物《中国青年月报》（China’s Young Men）。

商务印书馆不惜一切花费去完善照相凸版印刷部门的设备。为了不受天气影响、快速交付订单，该部门配备了弧光灯以及喷酸液蚀刻机，附有一间精美的摄影画廊，其主要装备是一台在伦敦购买的新相机，这是投入使用的第五台相机。其镜头可以拍出32×43英寸的照片，这是全世界最大的——只有一台除外。相机放在一辆手摇车上，车子在一条小轨道上来回运行。多年以来，该公司四分之一的股票由日本人持有，但1914年初买回了股票，这家公司现在完全属于中国人。人们欢欣鼓舞地庆祝这一期待已久的希望得以实现。

离工厂几英里远的地方，有商务印书馆的商行——坐落在公共租界华人区最繁华的一条街道上。这栋——以铁柱做装饰——用钢筋混凝土建造的四层楼建筑于六年前耗资2万美元才建成，还算蛮新的。精美的橱窗立马就吸引了眼球。入口右侧的橱窗专门陈设中文书籍，左侧是英

文书籍。后者除了文学、小说、传记和游记方面的权威著作以外，还会见到如下著作：《即兴演讲》（Ready Made Speeches）、《烹饪秘诀》（Cooking）、《人民如何翻身做主》（How the People Rule）、《病号及护理》（Our sick and How to Take Care of Them）、《家禽和利润》（Poultry and Profit）、《关于铁路的一切》（All about Railways）、《征服世界的铁路》（Railway Conquest of the World），以及拟有笼统标题的丛书《常见的贸易商品》（Common Commodities of Commerce），包括茶、咖啡、糖、铁、油以及橡胶。门市部位于一楼。不过那儿除了书籍以及书店的常见配套以外，还有许多东西。后面公寓的玻璃柜子里，除了有对中国学生极具价值的东西——如大米、棉花、蚕以及其他产品——以外，还陈设了许多由这家工厂生产的学校设备的样品，以及一大批来自不同国家的鸟类标本，各种各样的昆虫和动物，都是用酒精加以保存的。这展示了其发展过程中的积极转变、最佳方法及其用途和可能性。至于那些希望在闲暇时来看书的顾客，有许多长椅分散在各个角落，可供其歇息，十分便利，环境宜人的小阅览室也一直备受欢迎。

第二层和第三层主要用于办公，第四层有很大一部分用作了餐厅。按照中国的惯例，对这200名员工是提供伙食的，这是薪酬的一部分。商务印书馆也为所有月收入低于10美元的人提供宿舍，不过不在同一栋楼。屋顶花园——员工可以在此午休，也可以在天气炎热的时候来此感受凉飕飕的晚风——是这个地方诱人的因素之一。最为有用的两个配件或许要数客货两用的电梯和电子收银交付系统——中国仅此一家。商务印书馆在中国设有40多家分馆，北京的那家大型机构主要从事政府业务。此外，它还在华人定居的其他国家设有1000多家销售代理商，而且是整个东方最大的出版社。

---

(1) 约翰· 古登堡（1397—1468），德国人，发明了金属活字印刷术。

(2) 北宋庆历间（1041—1048）中国的毕昇 发明泥活字，标志着活字印刷术的诞生，比古登堡早约400年。

(3) 京报是古代邸报的一种，是中国古代民间刊印的、翻印从内阁有关部门抄来的一部分邸报的报纸。始见于明末，盛行于清代，消亡于辛亥革命后。

(4) 令，纸张的记数单位，等于500张。

(5) 美华书馆是于1860年由美国传教士创办的印刷厂。商务印书馆早期创办人出自该馆。

(6) 雷利，英国探险家、美洲殖民者，将烟草和马铃薯引进了英国。

第九章　华界之实况

许多游客一来到这个繁忙的口岸城市，便立马赶去更为富裕的租界区，至于华界，从不会瞧一眼，有些人甚至都不知道有这样的地方存在。然而，真正的上海并不是公共租界，也不是法租界，而是华界。这座城市位于中国南北的中心，外国租界就是因其饱经风霜的城墙才出现的，若没有城墙，便不存在租界。西方人来此是最近才有的事，以前没多少西方人了解这个地方，肯定是在1842年上海作为条约规定的通商口岸开放以后，才有西方人来此居住。这座城市虽正值鼎盛，但与中国其他许多城市相比，其历史依然要以世纪为单位来衡量，接近千年。这些城墙到1555年才建造，此前一年这座城市被日本海盗劫掠、烧为灰烬，只剩满目凄凉。如今老城墙已不复存在——革命以后就不在了——那些吱吱作响的城门，这么多年来一直咬着生锈的铰链，早晚来回转动，如今亦荡然无存，或者就算有遗迹保留了下来，也早在斧头和锤子的重击之下消失殆尽了。但并非完全如此，因为拆除城墙的工作刚刚被叫停了。据报道，上海华界当局内部有分歧，其中有些成员强烈主张重修城墙，以作保护之用。后经表决，达成了折中的办法，那就是同意拆除城墙，但城门——或者说是遗留下来的那部分——保留，以作凯旋之门。

老城墙拆掉当然会更好、更卫生、更现代化。臭气熏天的护城河，其西边和北边由一条壮丽的林荫大道所覆盖，宽90英尺。如今，电车是沿着河两侧运行的，久而久之，整个华界都将被电车轨道所环绕。城市外围的许多街道都在拓宽，市中心的那些街道正受关注，不过要改善很困难，因为涉及财产利益。随处可见的破烂不堪、老鼠肆虐的棚舍已经消失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全新粉刷、闪闪发光的新茶馆以及店铺。这里正在全力对付公害。一户富裕人家报告说，自从他们房子后面那条引发瘟疫的小河被填平以后，他们的房价已经上涨了数百美元。街头垃圾每天都有专人扫除运走。肉类会经受检查。管道已经铺设了，引进了自来水，这样人们就不用再听到挑夫快步疾走时发出的单调乏味的号子声了——他们肩上挑着一根扁担，扁担上悬挂着水桶，水桶里满满一桶的水，每走一步，水都会溢出一些。电灯已经在很大程度上取代了多烟的小煤油灯或更原始的用陶瓷或锡制作的灯——这些灯将一根小灯芯浸泡在植物油之中。

所有这一切都是理所当然地发生的。这些改进受到了每个人的高度

赞扬，然而，我们是反复无常的人类，为什么当我们为这些变化欢欣鼓舞之时，我们的内心还是感受到一阵遗憾呢？对我们而言，那些稀奇古老的事物——虽然令人厌恶反感——有什么亮点是全新的事物所不具备的呢？因此，随着老城墙和一把旧土的逝去，某种难以名状的魅力也随之流失，一去不复返了。虽然自城墙拆除以来，华界的界限没那么明确了，但是华界依然存在，在恶臭难闻的小巷、吵闹的店铺街道、包括乞丐在内的人群聚集的地带，依然保留着诸多古老的地标，足够让大多数对东方魅力魂牵梦绕的人感到满足了。

华界周长约为3英里。除了最粗略的轮廓以外，并没有地图，也没有《穆雷旅游指南》或者《贝德克尔旅游指南》[(1)]帮助我们徒步穿梭于这些迷宫般的偏僻小道。但是踏入华界的外来人员并不会受到冷遇，不能自行其是，因为他会遇上一群喋喋不休、自作决定的导游。倘若后者的服务遭到拒绝，他们仍然能够小心翼翼地套用《傻子国外旅行记》，[(2)]诱使他前去一些店铺，这些店铺几乎都一定会让他掏腰包，而他们可以从他的付款之中抽取高额的回扣。

如果说租界内的店铺是复制品，那么华界的店铺就是原件，作为原件，它们更为奇特、更加讨人喜欢。如同鸟以群分，从事相同行业或是售卖同类物品的店铺更容易聚集在一起。例如，出售精美的红木和黑木家具——产自南方省份广东——的店铺大多位于北门附近，售卖精致象牙雕刻品的店铺亦然。其他地方则聚集着银器匠、珠宝商——他们的店铺陈列着诱人的玉器、琥珀、珍珠和宝石——布料和丝绸商人、鞋帽匠人，专营各类扇子的商家；出售黄铜、白镴、瓷器制品的店铺，订做棺材——从昂贵的红柚木到便宜一些的松木榜木棺材——的匠人店铺种类之多，让人眼花缭乱，不胜枚举。华界没有百货商店。每位商人都严格死守他自己的商品种类。他一生之中决不敢侵犯他人的权利和特权，因为各行各业都有自己的协会，以保证其成员的利益受到保护。许多行业协会——如丝绸商和银匠协会——无论在政界还是商界，都是有钱有势的。这些协会有自己的行会公馆，都或多或少地配备了会议室和宴会厅，并附有一排排长长的低矮建筑，这些建筑隔成了许多小房间，只要付些租金，已故会员的棺材就可以存放在此，方便的时候再行埋葬。

某些店铺什么都不卖，就只卖葬礼服饰，但是这些服饰并不会显得很令人伤感，反而是这座城市里最鲜艳最华丽的。挂在高处、显得最为好看的是精心绣制的用来盖住棺材的深红缎面，货架上或玻璃柜下面是死者的服装——绣得富丽堂皇的长袍、便鞋和头饰，头饰形似僧帽和头

盔，设计和装饰都是极为上乘的。也有为送葬者准备的僧侣长袍以及白色的棉麻布衣。其他的店铺只出售纸扎的家具摆设，这是葬礼的重要组成部分。按照中国人的迷信观念，当死者的魂魄离开躯体，进入灵界，为舒适起见，他需要生前已习惯使用的那些便利设施。于是，孝顺的长子会确保他那尊敬的父母能享有这些东西，他的尽孝程度与经济能力成正比，但通常都严重超支，因为中国的葬礼用品贵得离谱。这些物品是用彩纸制成的——较大的物件扎在轻便的竹架上——大至轿子，小至茶杯，但凡能想得到的物品，都应有尽有。这些相像之物由出殡的队伍运送，穿过街头，送到坟墓燃烧。他们认为，烟会将这些物品从苍穹吹拂给那些游魂。他们对实物的复制如此精确逼真——特别是花瓶、珠宝盒、火盆、灯具、钟表、盆这些小物品——以致很难相信它们是假的。上海店铺制作的史上最好的仿造品之一是一件毛皮衬里的对襟绣花外套，每一处细节都如此完美，中国人自己都差点被骗到了。

总是不愁生意的店家要数画肖像画的画匠。他是个很重要的人物，而且是闭门做生意的——就是说，大部分店铺都是直接朝街道敞开的，而他的店铺正面有一扇门和橱窗做隔断。橱窗上粘贴了一批从报纸杂志上剪下来的人头像。店内存放的头像则要更多。有可能是某个寡妇想要一张已故配偶的画像，因为他没留下什么照片可做纪念，也有可能是某个年轻人，渴求一物能让他记住未曾谋面的舅公，于是他们走进了一家画像店。店家在他们面前铺开一排照片，经过仔细研究后，挑选出某一张画像，要么是与挚爱的亡者有几分神似之处，要么是悲伤的亲属想要的样子。然后，店家先画好头部，大小和真人一样，再加画身体，着装的风格只要是共同选定好的就可以。最终，完工的画像将挂在家宅的墙上，并满脸骄傲、一腔真情地认定，这就是已故亲人的面孔。

药铺很多，有一种安静、独特、半专业的气氛，但是天气炎热的时候，店员会追随其他的店家，脱掉碍事的上衣，光着上身度过一日，稍微有损其专业性。店铺的货架上摆放着一排排的大白镴罐子，还有蓝白色调的瓷罐，看上去再简单不过了，但其设计却让旁观者对容纳之物的性质和特征十分好奇。架子下面是大量的抽屉，里面装有干根、草药、骨头、海草、白垩以及一些难以形容、神秘莫测的东西——是从天上地下以及地下水之中提取的。除了药物以外，这些店铺经常还会展出一些特别吸引眼球的东西，比如用酒泡着蛇的广口玻璃瓶、干鳄鱼皮、珊瑚和地质标本。装处方药会用到瓷瓶、彩色的硬纸板盒和正方形的白纸。有时候，会一下子在柜台上放20张左右的方纸，然后从不同的抽屉中抓出各种有趣的药物，放在上面。有陈皮——据说用来治疗食欲不振，屡

试不爽，有一种化痰的黄色浆果、一种风干的甲虫——溶于水中便是最上乘的眼药水。从蚕茧中剥出来的蚕，与米饭一起食用，大大有助于消化，有种扁蝽——看上去可能算臭虫的始祖——也具有同样的功效。瓢虫，或类似于瓢虫的东西，是治疗肝病的灵丹妙药，还有一种昆虫，如果用来擦拭伤口，可使伤口快速愈合。据发现，针对某些疾病，如果内服一点点蛇酒，是特别有效的。店铺后面的墙上挂了一幅药神的图片，药神的神龛里细细长长的烛火一直在燃烧。出售外国药品的中国店铺——其中有一些是非常不错的——在租界并不足为奇，但是在华界却很少见到。

和其他国家一样，牙医向来很抢手。偶尔会发现一位志向远大、事业有成的男士在店铺里坐诊，病人可以坐在凳子上保持平衡——不过完全是在好奇的路人注视之下进行的，头向后倾斜，那颗烦人的蛀牙立马就拔出来了。但是通常情况下，专业的装备仅限于一张小木桌以及桌上所能容纳的物品，就摆放在街上。风吹雨打的摊位后面，牙医懒洋洋地躺着——脏兮兮的，粗鲁无礼——守卫着他的营业工具：几瓶软膏药膏、一把镊子以及其他不起眼的工具、布满灰尘的玻璃橱柜下有几套牙齿，最后，很重要的还有一堆腐烂的牙齿，是成功从备受折磨的病患嘴里取下来的，是用作诱饵吸引顾客的。有一些流动牙医，他们的店铺就是一辆带有牙科装备的手推车，中间照例有一堆显眼的牙齿。他们从一个地点转战另一个地点——天气恶劣的时候，便撑开一把巨大的彩色雨伞——鸣锣以招揽随时准备就诊的人群。

更为常见的是流动小饭馆。这种迷你餐馆的经营者所采用的装备是便利性和紧凑度的典范。用竹子做的简易支架——即使是所有的工具都带上，一个人携带起来也很轻松——分成两个部分。一侧放置着一个陶土做的火炉，下面有一个用来放置柴火的地方。另一侧是各种大小的抽屉，里面存放了生面团、糖以及各类调味料。两个抽屉中间的狭缝里可以拉出一张案板，糕饼师傅可以熟练地在上面做出各种饼和肉馅，然后放进浅铁盆里用植物油煎炸；如果是要烘烤的话，则将它们贴在火炉的内层上面。尽管有泥土、灰尘和苍蝇，但即便是有严重洁癖的人也无法否认，成品确实非常开胃。

华界就没有哪一块宝贵的土地上建有人行道。因此，所有人所有东西都在大街上，异常狭窄的通道就非常拥挤。摇摇晃晃的人力车、几架很快就会从上海绝迹的轿子、挑夫以及行人络绎不绝，来去匆匆，他们用刺耳的声音彼此叫嚷着，以此开路奔跑，随时都有撞上粗心之人、踩

到儿童的危险。不过，并非所有的街道都是窄巷。有一些——但必须承认只有极少数——足够宽，让马车通行相对来说还比较轻松，相比之下，它们看上去俨然就是大道。还有一些街道，如果车夫技术过硬、路人再紧靠道路两侧，或是远离危险地带、急速退回店铺里面的话，马车是可以缓慢移动的，但是如果经常心存这样的侥幸，就太冒险了，而且警察基本上也不会允许的。偶尔会发生马车在急转弯的路段卡住了，既无法前进，也无法后退，甚至也没有直转弯、进入十字路口的空间。那时唯一的办法就是解开马具，将马牵出来，将马车向后拉，最后用力地将马车举起来、转过来，再将马套到马车上。

整座城市并非都是街道的布局，因为还有一些露天的场地，甚至还有欣欣向荣的菜园子，这些都是相当具有乡村特色的。在人口如此密集的地区，竟然还可以这样，这似乎让人惊异，人们都隐身何处，如何隐身，这是一个不解之谜。在较为贫困的地区，随着夜幕降临，人们就像变魔术一样地消失了——天气炎热，许多人在街上纳凉的时候除外——到了早晨，人们又神秘地蜂拥而出。

这座城市最有名气最受欢迎的活动空间是在湖泊或者说池塘附近，湖中心的一座小岛上矗立着远近闻名的柳条盅茶馆（Willow Ware Tea-House），[3]位于华界的同款茶馆因为饰有垂柳图案的陶瓷餐具而备受追捧。对普通的环球旅客来说，这是该城市的主要景点。但可惜，“距离产生美”这句话，向来都是再适用不过的。不可否认，老茶馆的照片着实令人神往：雅致的飞檐翘角，通向茶馆的九曲桥——之所以采用这种曲折的设计，是因为据说恶灵是直线行走的，便以此来抵挡它们。然而走近一看，其魅力瞬间便烟消云散！污秽、破烂、喧哗就是这所声名大噪的茶馆如今主要的特色。湖面并没有映射蓝天的倒影，而是被一层厚厚的蔬菜浮渣所覆盖，一片碧绿，很不卫生。岸边活跃着一群小商贩，他们兜售的商品摆在桌上或是铺在地上。显然，他们靠着售卖画卷、陶器、毛巾、羊皮大衣、玩具以及各种廉价的外国小摆设——这些都很抢手——收入颇丰。乌黑发亮的长假发——数量特别多，因为辫子已经不再流行了——特别突出。毋庸置疑，很多都销往国外，为上层社会夫人们的发型增色不少。

收破旧衣物的行贩生意，如果依据从事这一行业的人数来判断的话，一定像绿油油的月桂树一样旺盛。收破烂的店铺里面的景象多么壮观呐，到处都是破布，篮子里、袋子里都塞得满满的，有的挂在墙上，有的一大堆地混杂在一起铺在地上。这些布都感染了细菌、可致中毒、

害虫丛生，天知道是从哪里收进来的！然而，每天都会有妇女和儿童花上很长的时间勤勤恳恳地将它们捡起来，将它们做成拖把，纳成中国人穿的鞋底，这些东西销路都相当不错。

上海曾经出过一位极其了不起的市民。他生活在16世纪，是名副其实的中国版米西纳斯（Maecenas）。[(4)]他不仅是一个鼓励西学的文人，还登上了高层统治地位，担任内阁大臣。他的名字对外界没什么影响，但倘若有人想知道的话，他叫徐光启。[(5)]他在耶稣会神父的引领下皈依了天主教，过着纯洁、始终如一、虔诚的生活，尽管俸禄丰厚，但是去世的时候一贫如洗，葬礼的费用都不得不由国库支付。他建造了华界地区有史以来的第一座天主教堂。后来非常时期，改成了关帝庙，但后来又赎回恢复了原状。这座教堂如今依然存在：与嘈杂的街道稍微有点距离，是一栋引人注目的宏伟建筑——典型的中式屋顶，正面外墙上有一尊漂亮的镀金十字架。[(6)]

现在的关帝庙位于孔庙附近，院内杂草丛生，厅内空寂无人。一年一度，上海军政官员会在黎明时分踏进供奉关公的圣殿，举行一场奇怪的庆典仪式，以纪念两位当地的军事豪杰。华界的守护神——凶神恶煞，令人反感——占用的是一座位于中心地带的大寺庙，这座寺庙比其他任何一座寺庙都更受信徒的欢迎。其宽敞的外院和耶路撒冷的圣殿庭院一样，变成了买卖、饮食、赌博、算命之所，整座城市就没有哪个集市比这儿更繁忙、更嘈杂了。

华界的地方长官叫作“知县”，或者叫县长，由北京任命。他的官邸称作衙门，是一栋常见的普通建筑，穿过几间不修边幅的庭院即可到达——庭院两侧是为衙门随从以及小官吏提供的平房宿舍。每日，在衙门三间小小的空房间里升堂办案，中国的“法官”穿着他们的职业服装，看上去明显与周围的环境格格不入。衙门左侧和后边是县衙牢房，与之相邻的是一间小得多的女牢。牢房里面恶劣的卫生条件、囚犯的遭遇，关于这些的调查结果让人畏惧，如今真相已经浮出水面。但是，无论旧政权统治下的事态究竟如何，牢头现已坦承，今天与十年前的情形大不相同，如今没什么可挑剔的，值得赞扬的地方反而有很多。这些灰色的砖房修缮完好，400名男囚和50名女囚的牢房卫生干净、光线充足、通风良好，不过，正如牢头自己迫不及待向访客交待的那样，太过拥挤了，不利于健康。每个庭院的中心都栽种了一些精心照料的植物，这种增添美感的尝试值得称道。男牢开展了大规模的生产劳动——虽然政府所拨款额太少，无法让所有囚犯都加入工作。这些工作包括制造木制和藤制

家具、毛巾、垫子、鞋子和衣服。有少量的生产劳动——裁剪和制作服装——给了女囚，但是资金不足，无法提供作坊和材料，这些可怜人儿大多时候只能无所事事地荒度光景。女牢的看守是女的。牢房里纪律很好，但并不严格，囚犯看起来吃得好照料得好，特别是男囚，看上去既快乐又满足。按规定，患病的囚犯会被送往一家中国的医院，在那里他们会接受最好的照料。

衙门的外观虽令人失望，但却见证了一些激动人心的场面，就像不久前，在衙门前面的空地上，当着一群看热闹的路人的面，焚烧了大量的鸦片以及吸食鸦片的工具。华界一家鸦片馆或是鸦片店都没有。很久以前，政府下令关闭了，很是有效。

这座城市治安很好。近年来，尤其是自大革命以来，治安部门的架构作出了惊人的整顿。警察局局长由地方督军举荐，由南京决定，但是消防队队长由市民选择，该部门事务完全由他们做主。消防队的700名成员均为志愿者，无偿提供服务。近来，消防队的效率已经达到了高水平，在遍布城市各处的消防车站里，可以看见一套非常可靠的现代化机械设备，包括一些小型汽车。这些汽车必须是小型的，这样才能通过狭窄的街道。东门和南门中间的中央消防站有一座壮观的塔楼，上面支承着一座重达6000磅的钟，这座钟不仅发布上海本市的，也会发布周边地区的——隶属于中国人管辖的行政区——火灾警报。[7]这座塔楼是上海天才工程师Nicholas Tzu的作品，他照着一个埃菲尔铁塔的小模型仿造，但作了一些调整，让它更好地适应当前的用途。在这座城市最近发生的一次大火中，中国的消防队员被迫英勇地奋战了三小时，才控制住了火势，公共租界和法租界消防队的队长都在现场观看，却无人请求、也无人需要他们的协助。

当人们知道罢工已是相当普遍，基本上也就不会否认华界所呈现的是一副全新的面貌这一说了。最近一次是染工工会罢工。中国的广大人民群众穿的是蓝色的棉布衣，事实上，穿它的人太普遍了，几乎可以将之称为民族服装，因而染坊是最常见的店铺之一，染工工会非常有影响力。总统已经颁发指令，所有工会都必须经由警察局核准，正如此次，警察介入其中，镇压了此次罢工，所以罢工的目标并未达成。但去年冬天有次罢工更成功些。在一家机缫生丝厂——虽不在华界，但仍然属中国人管辖——工作的妇女，因减薪被激怒了。有天早上，她们百来号人在工厂大门集合，又吵又嚷，又捶又喊——只有被激怒的中国妇女才会那样。当局知道理亏的不是罢工者，便乐意迅速达成令人满意的和解方

案。

---

(1) 此处指约翰· 穆雷（John Murray, 1745—1793）和卡尔· 贝德克尔（Karl Baedeker, 1801—1859），分别是英国和德国的出版商，并称为现代旅行指南的出版先驱。

(2) 《傻子国外旅行记》（The Innocent Abroad）为马克· 吐温作品，于1869年出版。

(3) 中文为直译。

(4) 米西纳斯（前70—前8），罗马贵族、巨富，著名的文学赞助人。

(5) 徐光启（1562—1633），官至礼部尚书兼文渊阁大学士、内阁次辅，上海地方史上的杰出先贤，中西文化交流史上的重要先行者。

(6) 上海最早的天主教堂应为传教士郭居静在徐光启旧居创办的圣母玛利亚祈祷所，此处作者指的应是敬一堂，由传教士潘国光在徐光启孙女资助下购得重修，雍正年间被改为关帝庙，19世纪60年代发还天主教。—— 编者注

(7) 应指1910年落成的上海救火联合会瞭望钟楼，即小南门钟楼，近代上海华界的重要消防建筑，这里用的警钟重4800磅，作者可能将此处与19世纪80年代工部局中央救火会在公共租界设立的瞭望台混淆，那里的钟重6000余磅。—— 编者注

第十章　新旧之习俗

一个就读于女子教会学校的学生收到了她认识的一位年轻先生的邀请函，邀请她某天晚上陪他去一个娱乐场所。这张纸条落到了管事的传教士的手中，传教士便约这位男士面谈。“我们学校的女生在无年长女伴陪同的情况下外出，是违反校规的，”她对他说道，“而且你怎会提出这样的要求？你明知道这不符合中国的风俗。”“哈哈，”年轻人嘲笑了一声，“以前可能不符合，但现在成立了共和国，我们做什么都可以。”

共和国的诞生也随之带来了巨大的变化和严重的危险，没有哪个地方像在上海这么明显。旧事物正在消逝，新秩序的根基还不稳固。年轻女性对环境的变化尤为敏感。她们急不可耐地去模仿西方国家的习惯，但至于其真正的含义，她们中许多人并未完全理解，“自由”（liberty）和“许可”（license）这两个词她们经常弄混。但是对女孩子不能太苛刻了，虽然有部分女孩子胆大妄为不害羞，但是其他女生则像是被囚禁起来的鸟儿，突然发现鸟笼的门是半开着的，便屏住呼吸，试图张开翅膀。如果有时她们飞得太远，疲惫不堪，伤痕累累，有所落后，这也不足为奇。条件好一点儿的、在国外留过学的学生帮忙纠正问题。他们会示范如何可以做到与异性朋友在有轨电车、街上或是彼此的家中见面，自然却不失谦逊地一起聊天。一位从未出过中国国门的年轻女护士，无拘无束地和出国回来的人打着交道，她聊到她所在的中国教会男女混合唱诗班度过了一次愉快的野餐，聊得兴致盎然。“我们带着晚餐，乘着舢板顺流而下。”“把中餐放在篮子里，携带起来不是很不方便吗？”“哦，我们带了外国的食物——蛋糕和三明治。我做了些花生三明治，大家好像都蛮喜欢吃的。”“去野餐的人都是已婚人士吗？”“不是的，有些没结婚。”她笑着答道。一位韦尔斯利学院的毕业生，有八年没回过上海的家，后来回来时有人问她，让她印象最深的是什么。“我嫂子会独自上街，甚至可以去大商场购物。”“你去美国以前她不会这样吗？”“我得说不会！但现在她似乎压根没当回事。”“你母亲呢，她也会出去吗？”“不会，母亲更喜欢遵照以前的习俗，但我们做什么她不会反对。”

以恐惧和焦虑的心态来对待社会变化是很容易的，许多变化趋势确实足够糟糕，再怎么焦虑都不为过，但是也有好的一面，或许在对其弊端表示强烈反对的同时，好的一面经常就被忽视了。没什么比夫妻之间

萌发的爱意情谊更值得称赞了。那些曾在国外生活过并习惯外国习俗的学生，对此或许会有期望，但绝不仅限于这类群体。“你家很漂亮。”一位外国朋友对新婚一年的新娘子评论道。她的丈夫是一家颇受欢迎的中国日报的编辑，他们俩都从未离开过他们的故土。新娘子眉开眼笑。“你的蕾丝窗帘挂得很是雅致，”这位拜访者继续说道，“要教你的仆人挂成这样，岂不是很难吗？”“我和我先生挂的。晚上他下班回来后，我们弄的。”这位娇妻满脸通红地回答道。几个月后，她已是一位年轻妈妈，既腼腆又满足地展示着精致小巧的新生儿全套用品——每件小衣服都是她按照外国式样亲手做出来的。“孩子好可爱呀！”另一位朋友向这对喜获头胎、欢欣雀跃的父母欢呼道。“是个男孩吧？”“不是，是女孩儿，”父亲骄傲疼爱地注视着小婴儿红润的小脸庞，纠正道，“但她哭得很厉害。昨天夜里我起来哄了她三四个小时，大部分时间都得抱着她走走，免得她吵到我妻子。”“我很高兴你妻子周五来参加我的聚会了。”有位美国女士向某位工作繁忙的中国部长说道。“没错，为了让她去，我早早就下了班，回家照顾孩子。我决不会让她错过这件乐事。我的玛格丽特是个好妻子。”

当娇小迷人的F太太乘船去美国，看望她毕业于加利福尼亚大学的兄弟时，她的丈夫在码头照看行李，并陪她一起坐舢板到远洋客轮停靠的地方。不久以后，伍廷芳博士——前驻美公使，上海最有名气的市民之一——与F博士见面的时候，打趣地说道：“哟嗬，昔日中国的习俗是丈夫外出，妻子顾家，如今好像刚好反过来了，妻子外出，丈夫留守家中。”F博士——妻子不在家的这段时期，他在母亲和妹妹的帮助下，一直在照顾他的三个小孩——和善地笑着解释说，还是他自己力主妻子去旅行的。有次，还是这位丈夫，他在主持一场正式的宴会，坐他旁边的人注意到，宴会中途他悄悄地离开了座位，走到了长桌的另一端。F太太——可能是因为哄孩子睡觉耽搁了——刚刚进来，F博士——并未由于专心交谈就没留意到妻子——起身拉出她的椅子，以骑士风度[(1)]请她就座。下午，C先生和太太举办了“茶会”，这位年轻的丈夫在门口迎接来客，而茶桌上则是由他的妻子——身着质地轻柔的中式白色真丝服装，一头乌黑的头发，戴了一顶粉色玫瑰花蕾编成的花冠——负责，她应对自如，具有社交名媛的优雅，此外还兼具社交名媛均不具备的可爱与谦逊。

或许这些微不足道的事件本身，对从未在中国生活过的读者而言意义不大，但对于那些生活过的人来说，这些事件足以振奋人心，它们表明酵母正在发酵，久而久之全国范围内的女性地位必将有所提升：将从

丈夫的财产——其主要任务就是养育孩子——变成与丈夫平等的伴侣。中国事务方面的专家明恩溥（Arthur H. Smith）[(2)] 博士最近在谈话中说道："我认为，中国女性生活的调整是现代最重要的具有社会学和教育意义的事件。"

在上海，缠足已经愈发地不流行。所有学堂日益普及的体育锻炼对反缠足运动大有裨益，因为小脚是做不好那些流行的运动的。目前备受推崇的折中办法是既不放任也不裹紧，而是采用相对宽松的绷带来防止脚长得过大。旧时所裹的小脚——在内陆地区依然相当普遍——在上海一般会让年轻一代觉得羞耻，如果她们不幸裹了小脚，会穿长裙或是穿大鞋来隐藏她们那残缺不全的身体部位。不赞成缠足的不单只有女性。多数情况下，她们的丈夫也同样持反对意见，这些男人几年前还会对没有摇晃着一双令人倾慕的"三寸金莲"的女人嗤之以鼻。有位当地的老师——按理说应该是"老一派"的——和他的外国学生谈起他妻子最近去世了。"她经过院子的时候摔倒了，便再没醒过来。""这太怪异了，"学生惊讶地答道，"她怎么会突然跌倒？""就是她的小脚导致的。她失去了平衡。但是她的脚是在嫁给我之前就裹的，否则我决不会让她裹。""那么说你不赞成这一习俗，你不打算让你年幼的女儿们缠足了？"那人突然提高音量，愤怒起来，以中国人罕见的怒气喊道："不让！"

在美国或欧洲留学多年回来的年轻人——在上海这样的人有很多——穿着洋装，很好看。有些人其实对他们的着装非常讲究。许多上层社会的年长人士，在正式的场合会穿礼服、戴高顶黑色大礼帽，但日常生活中，他们通常会将让人煎熬的浆硬衬衫和令人窒息的领子抛在一旁，穿回宽松舒适的中式服装。回到中国的女学生通常会立马穿回本国服饰，她们这样很明智，不仅是因为这种风格很舒适，也是因为再没其他的更适合她们。几年前，有两个从内陆过来的女孩到了上海，她们要前往美国学医。有人告诉她们，要想在船上不惹人注意，立马改换洋装比较好，于是她俩照做了，换上了紧身的束腰内衣等。年纪大点的那位女孩玛丽对自身感受的描述非常好笑。"我没法呼吸。没法吃饭。咽不下食物。我从未这么难受过。""那你怎么做的？""我把紧身衣脱了。""你穿了多久？"玛丽举起小食指，一本正经地宣布说："正好整整一天。"

上海年轻女性之中，超级时髦的"紧身装"（fast set）指紧身裤、紧身短款短袖上衣，而且衣领非常高。在西方人看来，这既不美观也不庄重，内陆地区的中国人则是投以质疑的目光。冬天里，女孩们不再光着

脑袋，开始戴帽子，不是那种有帽檐的帽子——那些改穿洋装的人除外——而是那种绒线做的软帽，通常有彩带或假花做点缀。有一条繁华的街道上有家店，叫作“爱国店”（Love Your Country Shop），主要售卖这些精致的装饰品。洋鞋也逐渐取代了布底缎面的中式鞋履，如果生活在这座多雨城市里的女性要经常外出，这是一个明智的转变。

在公共租界，旧式的迎亲队伍不是每天都能看到的了——虽然古风爱好者很乐意看——不过在华界一带依然很常见。马车已经在很大程度上取代了华丽的花轿——轿子用深红色绣缎做装饰，新人穿淡粉色丝质、正统的深红色缎面喜服。戴头纱的也很多，偶尔会有一位非常时髦的新娘子穿着完全按照西方式样制作的白色绸面或缎面的长礼服。然而，更常见的是毫无艺术感可言的中西合璧风。可爱的Y小姐在婚礼前不久邀请她的外国朋友去查看她的嫁妆。一件件由厚重的锦缎、光泽发亮的丝绸以及质地轻薄的网纱制成的服饰，在满是羡慕的目光前铺开。最后，喜服的亮相迎来了最高潮。精致的粉色绸面上那令人叹为观止的刺绣引来了欢天喜地的“哇”声和“啊”声，伴随着“天仙一般”和“我从未见过如此尤物”之类的感叹！但是当一条普通的粉色头纱、廉价的白色仿真花以及粗糙的白色棉手套——是在外国百货商店购买、明显是当作整套服饰的点睛之笔——放在精美的中式礼服旁边，大失所望的来客内心发出一声叹息。Y小姐左手无名指上戴着一枚镶有钻石和珍珠的沉甸甸的戒指。婚礼当天，她会像西方国家的新娘一样，戴上她的金戒指。“你肯定非常喜欢这位先生。”有人问她。她那明亮的双眸立马垂了下去，小声地回复说：“我只见过他一次。”“你一个人见的吗？”“不是，当时我阿姨在房间里。”显而易见，尽管她身着高雅华丽的洋装，但她并不是所谓的现代的“自由女生”。

W小姐的情况完全不同。她和她的未婚夫以传统的方式相识相爱。他们的婚礼是新娘的父亲主持的，新娘父亲是圣公会的圣职人员，身材高大，长相俊秀，穿着神职人员的长袍，仪表堂堂。待他走进去，在圣坛内就位后，伴着歌剧《罗恩格林》中《婚礼进行曲》的旋律，[(3)]一位教会执事正式引导着新郎和伴郎迈上走道。这一环节结束后，他们留在那站了整整十分钟。婚礼进行曲放了一遍又一遍，站在圣坛上的人动来动去、一直回头，观众为了瞥上一眼即将亮相的新娘，脖子都伸酸了。出了什么事？她病了吗？她是惊慌失措了吗？婚纱出了什么意外吗？这些灾难都没发生在这个女孩身上，她已经穿好婚纱，等着她的未婚夫挽着她迈进教堂。但是，中国古老的婚俗规定，新郎必须要一次次地派人去接新娘，最后新娘子才满含泪水、极不情愿地被人劝着离开

家。尽管这是一场现代的婚礼，但要完全无视历史悠久的习俗是不可能的，因此新娘子可以等上一段合理的时间再出现。仪式期间，中国客人多次发出阵阵笑声，显然他们有许多人从未目睹过基督教的婚礼，对他们而言，宣读誓词以及其他环节都非常有趣。这些情绪的流露，以及执事屡次上前，挽着一个或另一个人的胳膊，让他们转身，猛地将他们拉到应该所在的位置，这些都丝毫没有干扰到这对新婚的夫妇。仪式结束后不久，新娘便离开了，摘下了头纱——毫无疑问，头纱这个配饰虽然时髦，但并不舒适，她很高兴可以就此摆脱了。

有时会产生令人尴尬的情况，因为年轻人喜欢新的习俗，而他们的先辈却更偏爱旧俗。这种事最近就有发生，一位刚刚从美国回来的法律系学生与在他离家前就和他订了婚的女孩结婚了。新娘身穿一件白色的缎面礼服——配上鱼尾形裙裾的开衩窄底裙，戴着头纱、羊皮手套，脚上穿着便鞋，手上拿着捧花。一切都是极其现代化的，但在最后一刻，新郎焦躁不安，因为他的父母及那些保守的朋友拒绝参加婚礼。按照中国古老的习俗，他是要派交通工具去接亲属的，但他希望所有的筹备都遵从西方的观念，便省去了这一环节。此举却让亲属大为光火，他们不肯从家动身，虽然他们完全有能力雇得起四轮马车，也雇得起他们也许会更加喜欢的轿子。最后关头，新郎费尽周折，找到了足够的交通工具，急匆匆地赶去接家人来参加婚礼，但是他们太生气了，费尽了口舌才肯过来。

不久前，上海有一位新娘子，因为在婚礼时流露出开心的神情，被她的朋友们训斥了一番。“你难道不知道悲伤哭泣是新娘子的本分吗？你非但没这样，反而看上去还真的很开心。”他们喊道。“我确实很开心，那我表现得开心有什么不应该？”她激动地回答。上海有一位少女——其父母很富有——宣称，她是否接受她的求婚者，要看他是否愿意剃掉他的胡子，然后对方立即温顺地同意了这一要求。这已经达到了自主的巅峰。确实，旧中国的形势与秩序已经发生了变化！

上海有样东西是中国其他城市无可比拟的，那就是婚礼大厅。缔结婚约的双方，若想要办一场现代化的婚礼，但又没有合适的房屋，可以租用这栋建筑。这栋建筑内设一间客厅、宴会厅和多间卧室，都是经过精心布置的。这对新婚夫妇可以留在这里度几天蜜月——如果他们愿意的话——也可以安排汽车或马车立马将他们送走。

偶尔，新旧习俗会发生冲突，酿成悲剧。不久前，一位青年和一位少女——两人均在上海的一所公立学校教书——深深地爱上了彼此。这

位女孩的父亲有所耳闻，但他反对女儿嫁人，因为女儿是家里的支柱，他吵着说，出于孝道，她得继续做他们的顶梁柱，虽然他自身完全有能力扛起这一责任。有一天，他带她乘着小船来到他们家附近的一条很深的河中间，要求女儿放弃她的爱人。她始终不愿放弃，她那没有人性的父亲便将她扔出船外，任她在自己眼前淹死。几年以前，这样的行为可能没什么人会注意。普遍的意见就是“这女孩是她父亲养的，他对她做什么，任何人都管不了”。但今天的上海不再如此。报纸上全在报道这桩可怕的罪行，肝肠寸断的爱人将这件事告到了中国公堂（The Chinese Court），引起了巨大的轰动，以后再没人敢做这种事，至少不敢公开地做。

不能说上海已经过了一夫多妻制的阶段。在旧制度下，一个男人娶一个或多个所谓的“小妾”几乎是一种普遍的做法。但这种做法在年轻的、受过教育的阶层中不复存在了，用不了多久，在通商口岸也将永远成为过去。女性自身也在站起来保护彼此。有个例子很有趣，上海有名男子抛弃了怀有六个月身孕的年轻妻子，失踪了好几年。当他回来的时候，带回了一位新太太，抛弃了原配。原配妻子的处境非常可怜，在她孩子夭折以后，她最终被丈夫的亲戚赶了出去，便去了一家胜家缝纫机店学裁缝。正是在这个节骨眼上，由上海杰出女性组成的中国妇女合作协会对她的诉讼案施以了援手。她们散发了大量的纸质通告，上面写着：“×××的合法妻子没钱聘请律师。我们谨此请求那些同情她的人施以援手，务必帮她寻求公道，否则我们的两亿姐妹将永远困于异性的枷锁之下。”这一举措使得这件案子呈上了公堂，被告被判处了八十天的监禁，这一处罚虽远远不够，但却迈出了正确的一步，一群进步的妇女取得了胜利。

上海的丧葬仪式正在发生彻底的改变，不过变得没婚俗那么快。大多数人仍然认为那些古老的仪式应该受到尊重，旧时的出殡队伍依然拖着步子穿过街头。有些仪式朴素得可怜，就一口廉价简朴的棺材，在苦力肩上的扁担上摇摆，苦力大步向前赶着，后面跟着几个坐在手推车或是黄包车上的送丧者。其余的仪式则是富裕人家的，长长的队伍，场面异常壮观。最前面的是苦力，排着散乱不齐的队伍，高举着俗气的横幅和灯笼；苦力身后是做法事者、乐队（通常是两队，一支中国乐队，一支西洋弦乐队）、要在墓地烧掉的纸质扎彩、一盘盘需要留在墓地的熟食、死者的轿子以及他生前拥有的或未曾拥有过的四轮马车，马车上空荡荡的，只有一张死者的炭笔画像垂直地放在座椅上，四周都是花圈和棕榈叶，最后是灵柩，上面罩着深红色的绸缎，顶端放着一只仿造的仙

鹤，据说可以将解脱的亡灵带向天堂。棺材由雇来的苦力抬，苦力抬得大汗淋漓——苦力是社会阶层中最底层的，只有这些人才会被人说服去做抬棺者。走在棺材后面的是死者的成年的儿子，他们是主要的送丧者。他们身穿白色的棉袍，头上绑一条粗麻布条做的头箍或孝帽。将一条床单铺开，由苦力拿着，这就相当于屏风，男人走在里面。他们后面的马车里面坐着寡妇、女儿及其他亲属好友。即使这样，也是对旧俗和新习的怪异结合，以前没有四轮马车、没有铜管乐队，最重要的是没有棕榈叶——这个对于非基督徒的葬礼而言，自然是没有宗教意义的。完全现代的葬礼和这种类型之间存有不同程度的差异。经常会用到灵车，灵车的侧面和顶部会铺上大量鲜艳的花朵，以盖住灵车的黑色，这样它看起来就不像是承载死者的运输工具，而更像是一辆欢快的双轮轻便马车。中国人素来反对看上去很阴森的葬礼，守丧的人穿的是白色的衣服，帐帘用的是最亮的颜色。

最近发生了一起奇怪的事件，这一事例明显表明，新旧习俗有可能会按人们所说的那样，为了争夺主权而相互攻击。一个外国人觉得累了，想要睡觉，但附近一直有金属类乐器的杂音干扰他。最终万般无奈之下，他起床往街外面看了看，决定要找到噪音的位置，如果可以的话，再加以制止。当时正值夏季，透过邻近一户中国人家敞开的窗户，他半睡半醒地看到一幕奇怪的场景。床上躺着一位老妇人，明显病得很重，一位中国郎中和几位帮手拿着中国的摇铃和哨子，在房间里跑来跑去，以驱除引发这种疾病的邪灵。最后，似乎邪灵被赶到了楼下的院子里，在那里停顿了一会，这位粗鲁的不速之客也就是郎中，礼貌地问它想做什么，它答道他想去看看邻近的村庄，然后便被告知可以去。于是这家人付了这位郎中一笔丰厚的服务费，便宽心地关上了外面的大门，插上了门闩。整件事发生的地方附近就有一家上海最现代化的工部局医院。

近来中国最给人以希望的迹象之一就是人们对体育锻炼的态度正在发生转变，因为这意味着这个民族的健康状况会更好、品行道德会更好。不久前，事实上就几年前，圆肩还是每个人都大力称赞的，在女性之中象征着谦虚，男性之中则代表着文人习性。挺直身板的女孩子，加上胸部发育良好的话，会立马被人认为是大胆前卫。不仅如此，任何一种体力活动都会被上流阶层——无论老少——视作是苦力的活计，而且相当有损其尊贵。有些中国女孩子第一次去看网球比赛，然后其中一位面带困惑，看向她的同伴说道：“这种活他们就不能让苦力替他们做吗？”几个住在城西边的英国人习惯每天早晨早起，去乡间远足。有人

告诉附近的中国人——这些中国人是瞧着他们日复一日动身出发的——这些人徒步旅行是为了其中的乐趣，但是他们满脸不信地摇了摇头：“我们知道他们是要去某个秘密的神庙去朝拜，如果不是非做不可的话，任何一个有理智的人都不会这样卖力。”

几个外国人正经过外白渡桥，突然一群腋下夹着足球的中国小伙子跑了过去。这位绅士笑着对他的同伴说道：“前不久的上海还是看不到这一幕的。”“为什么？因为男孩们当时还不踢球？”“是的，他们也不会做出像奔跑这么没教养的事情。刚刚他们是因为太过关心即将开始的球赛，以致完全忘了形象。”

1915年春天，上海见证了一场独一无二的壮观场面——将会载入史册的一幕，当然也是这座城市生活中的重大事件之一。那就是第二届远东奥林匹克运动会——第一届[(4)]已于前一年在马尼拉举行。工部局将上海最好的公园改作运动会所用，基督教青年会为之配备了必要的配套设施。但凡去过那里的人，没有人会忘记那一个星期。许多外国人出席，但是他们几乎被人山人海的中国人淹没了，这显然是一场中国人的庆典，也本该如此。中国的上层人士和普通民众——无论男女老少——都到场了。他们睁大了眼睛、绷紧了神经，看着他们的同胞与来自日本和菲律宾的一流选手展开角逐，为中国队的屡次“艰难胜出”欢呼雀跃。看到这些健壮的年轻人——并没有像昔日的中国文人那样留着长指甲、放不开手脚，而是穿着健身的紧身衣裤——撑竿跳高、跑步、游泳、用球棒击球，与此同时他们的父亲以及祖父将自身以及传统抛之脑后，甚至为他们呐喊助威，这真的是太好了。

不久之后，在基督教女青年会的协助下，几百名就读于教会学校和私立学校的女生举办了她们自己的体育表演赛。不对外开放，嘉宾凭票入场，只邀请了几位男士。有些女生穿着改良后的健身服，但大部分女生还是穿着日常的校服。至关重要的是，那些保守派竟然没有震惊——对于让自己的女儿进行体育训练的这一想法，他们的态度可是并不友好的。母亲、祖母和阿姨——她们的好奇心在一定程度上战胜了她们的偏见——坐在绿树成荫的校园里的花坛上，观看着这些运动，起初是一脸漠然，然后便饶有兴趣，最后便怀抱着极大的热忱。负责的是一位年轻的中国女性，她在波士顿受过训练。这两个事件标志着中国青年的体育发展进入了一个新时代，结核病造成的伤害得到了控制，而善良、勤奋、诚实的工作被人们——至少被运动员——所理解，明白这不是一件令人羞耻、应当回避的事情。

(1) 流行于欧美各国的“女士优先”风尚，即所谓的“骑士风度”，是中世纪法国人的创造。

(2) 明恩溥（1845—1932），美国传教士、基督教活动家、神学家。自1872年至1926年在中国工作生活了半个世纪之久。一生有多本著作问世，如《中国人的气质》《中国人的特性》等。

(3) 《罗恩格林》（Lohengrin）为德国作曲家威廉·理查德·瓦格纳（Wilhelm Richard Wagner）创作的歌剧，著名的《婚礼进行曲》（Wedding March）便出自其中。

(4) 第一届远东奥林匹克运动会（后改称远东运动会）于1913年在菲律宾马尼拉举行。

第十一章　上海之婚俗

这是在婚礼的前一天。新娘家楼下热闹非凡。已经准备了数周的嫁妆，就等着搬到新郎父亲的家中。大大小小的、实用的、装饰性的物件到处都是。

首先，也是最重要的，就是嫁衣。每一套都有三件——裤子、裙子和短上衣——每一件都是用相同材质做成的。它们都被小心翼翼折好、一件叠在一件上面、放在婚礼专用的大箱子里——这些箱子是中等大小的木箱子，上面蒙着一层亮红色或棕色的油布。尽管家里忙乱得很，但是遇上亲朋好友过来看看进展并贺喜的时候，还是会掩饰不住内心的得意，拿出更多的服装以供查看。它们太值得一看啦！大量的丝绸、织锦缎、绉绸、薄纱——颜色各异，从颜色最淡的粉色、绿色、蓝色和紫罗兰色到深红色、深灰色、棕色甚至到黑色——全都叠放在一起，令人眼花缭乱。有些如海面的泡沫一般柔和，有些很漂亮但并不张扬，而那些精美的刺绣则可能让那些娇贵的小姐心花怒放。珠宝则摆放在许多带有玻璃盖的小盒子里，最大程度地凸显其亮点。珠宝琳琅满目——手镯、戒指、扣形装饰品、项链、头饰，钻石、红宝石、珍珠和蓝宝石璀璨夺目，但玉器是最主要的珠宝。

不过，新娘的衣橱虽然十分吸引人，但不过是她嫁妆的一部分。其余的装备则把所有的通道都挡住了。惯常会有的一套按大小分级的木盆、木桶和配有显眼的黄铜锁的木箱占了整个房间的一侧。这一套漆成了深红色或深棕色，打磨得很光滑。房间另一侧最惹眼的物体是上面压着一大堆被褥的长榻或睡榻。没有哪一个中国女性不带一批床上用品嫁去丈夫家里的。虽然数量和雅致程度大有不同，但颜色一贯都很鲜艳，沿纵向折叠得精致整洁。这种时候大部分被褥采用的都是最昂贵的材质——饰有花卉图案的丝绸和花缎，有几床艳丽的印花布和柔软的开司米，以备夏天使用。

隔壁的房间里，有一组卧室用的柚木雕刻的家具：衣橱、桌椅以及盥洗台。华美的铜床是外国制造的。丝绸材质的窗帘以及稍后要一起挂上去的银饰，暂时搁置在众多箱子中的其中一个。压印浮凸图案的中式纯银茶具、纯银筷子和象牙筷子、外国的玻璃洗指钵、俗艳的本土银酒杯、糖果盘、珠宝盒、手绘卷轴以及稍后要做成新娘喜服的丝绸，这些财富仅仅是慷慨给予这位女孩子的嫁妆的一部分——女孩子羞怯怯地坐

在楼上的卧室里，有点儿害怕，但却十足地期待。

在这一盛大的场合，如果没有提到一盘盘的食物、水果、花式糕点以及各式各样的甜点——以作新娘父母送给新郎家人的礼物，那么所列举的具有吸引力的事物清单就不完整。婚礼当天晚上，作为答谢礼，新郎的父母将会派人送一份丰盛的膳食到新娘家中，其中包括糕点、水果、煮熟的家禽、鱼以及一头——也可能是三四头——烤猪。猪烤好以后，会涂上一层芝麻油，芝麻油接触到空气，便会变硬，并且可为猪皮增添光泽，令人食欲大振。这头牲畜放在红色的托盘中，托盘挂在杆子上，然后由苦力挑着，走街串巷，以供所有路人羡慕，以使饥饿之人绝望。待送到了目的地，猪头的上半部以及猪尾——上面系着一片薄薄的肉片——会切下来，回赠送礼之人。此举是为了确保这对年轻的夫妇福祉不断，猪头和猪尾象征着新婚生活幸福的始末。

要将如此丰厚的嫁妆从一家安全送达另一家，这项任务绝不轻松。一大早就开始准备了，但到下午3点，婚礼的仪仗队还没出发。人来人往，行色匆匆。挑着长竹竿的苦力挡住了所有人的路，说话的声音又大又刺耳。侧室里面坐着一位有学问的名流，在一张张红纸上书写着汉字。这些红纸要垂直张贴在每个箱子的锁旁边，既能起到公布新娘姓名，又能起到在运输途中保障箱子里的东西更加安全的目的，因为纸不撕掉，箱子就开不开。被褥用装饰性的红网绳牢牢地固定在长榻上。放置在盒形托盘上的小物件以类似的方式确保其安全，以防扒手。红卡纸、红丝带以及鲜花是主要的装饰，很是醒目。这些物件一件件全都准备好以后，便拿到街上，用绳索固定在苦力挑的扁担上。当浩浩荡荡的仪仗队伍就绪以后，便等待出发的指令，那欢快的场面简直无法想象。新娘的所有嫁妆——嫁衣除外——好奇之人尽收眼底，沿途的所有观众可能都对这户人家的财力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打头阵的是两辆封闭的马车（不久前还是轿子），每辆马车里都端坐着两位“媒人”先生，他们此刻的主要使命是将装着珠宝的箱子运到新郎家中。但是，唉呀，都是人类的骄傲和野心！就在这个关键时刻，车夫策马起程，苦力将扁担挑到肩上，整个队伍都有所震颤——下了几滴雨。然后，仆人便冲进屋里取出油布，以保护容易淋坏的财物，随之而来的是一阵匆匆的脚步声！因此，仪仗队伍最终带着这份黯然失色的荣耀上了路，所有的相关人士都大失所望。

婚礼当天，关注的重点从新娘的家转移到了新郎的家。他住在一栋三层楼的公馆里，这与他父亲的级别是相符的，他父亲身居政府要职，

是一位高级官员。在大院——或院子——门口，驻扎着几位中国警察，他们的主要职责是防止外面杂七杂八的人侵入宅邸。但要么是他们无法胜任这一职责，要么就是——更有可能是——他们在放任衣衫褴褛之人闯入其中，因为缓缓经过守卫的不起眼的人越来越多，直到前面的院子里挤满了人。拱形门以及通向住宅的主要入口用鲜花和青枝绿叶做装饰，宽敞的游廊则挂着一排巨大的灯笼，那深红色的丝绸装饰和流苏很是华丽。游廊的一端挂着一连串的鞭炮，给这一画面增添了一抹色彩。庭院盖有玻璃顶，这座房子就围着庭院的四面而建，游廊在第二和第三层，这儿的房间是开放的。院子里有两支乐队驻唱，一支是中国的，一支是菲律宾的，后者是来自公共租界的工部局乐队（The Municipal Band）代表团。两支乐队之间的反差十分滑稽。菲律宾乐手穿着亮丽的制服，拿着亮铿铿的乐器，直挺挺地坐在领队面前，演奏得很有生气。那十多个中国乐手各个年龄段的都有，在他们那褪色的夹克下可以看见里面破烂的衣衫，他们手中拿着一些不可名状的乐器，时不时地吹奏、击打和拉扯一会儿，除了在场的几个外国人觉得煎熬以外，所有的客人显然都乐在其中。过了院子便是接待大厅。大厅正门是完全开放的，一进正门，目光就被里面的富丽堂皇吸引了，视线便再也移不开。墙壁上满是深红色的缎面横幅，桌椅也盖着深红色的绸缎，每一块绸缎——和横幅一样——都绣得很考究。婚礼仪式上的装饰是租来的，因为买的话需要花费一笔不少的钱。一楼主要是给男宾客的，他们按社会地位分坐在前厅，抿着茶、喝着酒、抽着烟。

楼上，家里的女性在接待前来祝贺的客人。客人到了以后，立马有人带他们去新人的房间，新房宽敞明亮，装点着前一天新娘家里送来的家具和小摆设。床是最引人注目的物件，因为白色的丝质床帷悬挂得颇为讲究，虽然各式各样、古雅珍贵、经过加工的银制装饰品闪闪发光，差不多将其淹没了，但是所有东西几乎都有寓意。一张经过雕刻的柚木桌子——上面铺着一条厚厚的绣着桃花的白色缎面——放在房间的中间。朋友提前送来充实嫁妆的礼物太多了，多到新房和后面的房间几乎都装不下。精致的象牙或玉石旁边通常都放个便宜的玻璃花瓶或是陶瓷火柴盒——看起来像是在美国的小零售店买得到的那种。隔壁的房间里摆放着一张按外国风格摆设的餐桌。桌布是一条粗糙的棉布，上面摆放着各种各样的糕点、水果和甜点，甚至像刀叉这样的配件，以及绣着边的深蓝色小餐巾都一应俱全。中间铺着一条大幅的设计不俗的绣花餐巾。等新娘子上门的期间，为了消磨时间，会请客人享用点心，他们享用起来也毫不拘束。

几个小时慢慢过去了。请帖上定的婚礼时间是下午1点钟，但3点的钟声响了，新娘还没来。时针转到了4点，依然没有新娘的身影。实际上，没有哪位中国客人指望她（此时）来，因为如果新娘准时亮相了，那她就违背了礼节，会惹人气愤，不可原谅。根据习俗，新郎已经三番五次地派“使者”去接新娘过来，但只是徒然。新郎必须亲自去。最后傍晚时分，在一片欢欣鼓舞之中，传来了他即将出发的消息。他乘坐一辆由一排马拉着的封闭式马车出发了，同行的还有车夫和仆人。他的两个小妹妹——花童——穿着白色洋装，系着粉色腰带，扎着粉色发带，坐着另一辆马车，跟在后面。那支外国乐队也步行前往，而中国的音乐家们为了让等到萎靡的客人打起精神，使出了浑身精力，努力演奏，着实难能可贵。

分针慢慢地转动，一个小时过去了。其间，这无聊的局面偶尔会有所改善。苦力急匆匆地送来了姗姗来迟的新婚礼物，新娘的女仆们带着其他的珠宝盒到了，重要的是，最后走进了三位男士。其中两位穿着中国传统服饰，第三位穿着最上乘的现代式样的外国服装。周围的人窃窃私语，说他是一路从北京赶来担任婚礼的主婚人。此刻，新郎的马车驶进了大院。然后众人激动到极点，所有还未挤到前面的人都冲到了大门口和前面的游廊。不久到处都在高兴地喊：“新娘来啦！新娘来啦！”首先穿过大门口进来的是菲律宾人，用乐器演奏营造出一种激动人心的氛围。紧随其后的是花童的马车，再是新娘，新娘是一个人坐的。她的马车顶上看上去像一个花园，有精致的彩虹色装饰。马具也装饰得喜气洋洋。但是，当擦根火柴，点燃了鞭炮，噼里啪啦的声响划破了长空，这些可怜的动物可被吓惨了。它们扬起前腿，腾跃而起，虽然有一个仆人紧紧地抓住了所有的马勒，但是有那么一两分钟，载着宝贵重担的马车好像要无法安全地驶进大门了。到了这个时候，警察已经完全顾不得要控制街上的群众了，他们涌进了大院，一大群人张口结舌地看着，与绝佳的环境形成鲜明的对比。

手持漂亮花篮的小花童，脚已经轻快地着了地，这时新娘家里的一位亲密的女性朋友走上前，为新娘打开马车门。新娘的容颜不曾泄露半分，因为窗帘是紧闭的。按习俗要求的那样，她徐徐走下了马车，但是就算这可怜的孩子非常渴望想要快一点，她的穿着也是极大的阻碍。一双精致的绸缎便鞋将她那虽没缠过但依然很小的脚包裹得严严实实。她的礼服是那种旧式的粉色缎面，绣得硬邦邦的。她那双纤纤玉手戴着一副宽松的棉手套。独特设计的项链数不胜数，几乎都遮到了衣服正面的腰身，大量的金手镯和玉镯环绕着她那纤细的手腕。但最让人惊叹的创

作还是新娘的头饰。这种盔状物历史悠久，几个世纪以前，中国这些地方的新娘子就已经佩戴了，但现在的上海很少能见到了。上面镶嵌着宝石和彩色玻璃，四周都垂了一串串的手链，这女生的脸几乎全都盖住了，其重量必须能够让负荷它的头部可以低下鞠躬，以显谦逊，而且要不费吹灰之力便可做到。但是，哦，你们身上有以往那老一套的影子，那新娘礼服有什么高潮，让旁观者为之关注、大吃一惊的呢？有可能吗？有，当然有——一条现代的白色网状头纱，簇状束在盔状头饰的上方，打着波浪一般的褶皱，一直垂到新娘的脚上！女孩子在女伴的搀扶下，小心翼翼地向房子走去，高高的头冠也随之摇摇晃晃。

她一进门，穿着合身无尾晚礼服的新郎便上前迎接，但新郎环顾四周，非常局促不安。这对新婚夫妇保持着恰当的距离——一肘远，他们后面——不是前面——是花童，花童后面是新郎的亲戚。他们穿过庭院，走进会客厅，大厅里有个女孩正在一架叮咚作响的钢琴旁猛奏门德尔松（Mendelssohn）的《婚礼进行曲》。他们走到一张长桌前面几英尺处停了下来，桌子后面站着那些先新郎一步到屋里的男人。新郎新娘给这三位贵宾每个人都深深地鞠了一躬，先从中间的那位开始，他就是那个穿着外国服装的矮个男子。这位先生拿起一份写有汉字的文件，双手拿着，大声读着。之后，他递了一枚戒指给新郎，新郎将之戴在新娘左手的无名指上——戴在新娘的棉手套上。与此同时，一方向另一方正式地鞠上一躬。然后新娘从她女伴那里拿到了一枚戒指，羞怯地套到新郎左手尾指上。随后是鞠更多的躬。这时，一些小女孩走上前来，面向新郎新娘，非常甜美地用英文唱着《恩光歌》（Jesus Bids us Shine）——这是这场婚礼的一大特色，是一位中国的基督徒朋友征得这户非基督教徒家庭的同意后提议采用的。这首歌结束后，计划的流程就是鞠躬。鞠躬取代了西方新婚夫妇接受友好祝贺的这一环节。新郎新娘首先向彼此行礼，然后是向主持婚礼的三位先生，之后是向新郎的父母——头贴地跪在他们面前，以示孝敬，最后一般是兄弟姐妹、叔叔婶婶以及朋友。每一群体都会接受三次行礼，再鞠三次躬回礼。那些更为年长、地位更高的人站的位置比这对夫妇要高，如果是孩子的话，则反过来。最后要致敬的是新娘的姨母——照习俗，姨母是女方家中唯一一个可以出席的成员。仪式非常正式，占用了相当长的时间。整场仪式期间，新娘的女伴一直忙得不停，因为她的职责是要把新娘转过身来，并在恰当的时间将新娘的头向前按、让她鞠躬。

一切终于结束后，门德尔松的乐曲再次奏响，新娘想悄悄地将手伸进丈夫的臂弯里，尴尬之下，他将手臂无力地垂在身侧。在一群叽叽喳

喳、你推我挤的人包围之下，这对新人踏上了楼梯——楼梯没铺地毯，你一脚我一脚的，上面全是灰尘——走进了新房。正如一般的新婚夫妇一样，他们一起在床沿坐了几分钟，然后新郎便逃到了楼下的房间里，在那儿，新郎将拘谨约束抛到了一边，尽情地享受着当前的时光。但等待新娘的就不是这样的好运了。她的磨难才刚刚开始。她站了起来，她的女性朋友挤到她身边，开始像往常一样打趣。“你傻不傻！”“这身礼服多难看呐！”“你的表现太可笑啦！”“有谁看过这么丑的新娘呀！”整场滔滔不绝的批评发言中，新娘脸上的肌肉丝毫没有颤抖，低垂的眼睛从未抬过一次。但她的额头上挂着汗珠，圆圆嫩嫩的脸颊红扑扑、火辣辣的，因为粗心大意、嘲笑打趣的那群人挡住了空气，而且，当天她粒米未进，滴水未沾。

7点的时候迎来了喘息的机会，因为那时会宣布婚宴已经安排妥当，新娘在女伴的陪同下回到了已摆好餐桌的会客厅。有张餐桌是专门为她留的，她被安排独自坐在那儿，面对一整个房间的客人。新郎则不然，他坐的是一张墙边桌，周围是一群朋友。新娘的头纱已经揭下，但是盔状头饰还在，头饰同时也是一副“微醺”的模样，仿佛是下面的头部已经太过疲惫，无法稳住它，又或是狂欢作乐之中，它被震得失去了平衡。但是没人伸出援手去调整一下，女孩子自己就更不用说了。她一动不动地坐着，眼睛低垂，脸庞如佛陀般没有表情。一盘又一盘诱人的中国菜放到了她面前，又原封不动地撤走了。整个房间里的其他人都开心地吃着饭聊着天，她依然是独自一人，一言不发。上酒的时候有所改变。新郎双手捧起一盏小小的银酒杯，递给主宾，主宾双手接过，抿上一小口，再将杯子还给新郎。他再以同样的方式将杯子递给其他主要的嘉宾，最后在饶有兴趣的观众发出的欢声笑语中，递给他的新娘。然后就轮到新娘了。无论她内心感受如何，当她拿着酒杯，淡定地从一位客人走向另一位，最后将酒杯放回新郎的手中，这期间她都没有表露任何情感，而客人们则是欢呼一堂，哄然大笑。

婚宴随着仪式一起结束了，但婚礼庆典尚未散场。庆典一直持续到清晨，劲头不减。晚上，新娘的四个兄弟来了，但他们并没有找她。这些男子，包括新郎在内，都在楼下畅饮聚赌。楼上，新娘那些年轻的朋友们再一次聚到她身边，准备来一场狂欢嬉闹。首先，根据习俗，她们会要礼物，然后新娘的一名女仆便会分发几盒为此而准备的中式甜食。之后，她便要进行一系列荒谬的表演——比如爬行、跳行、蹦跳、打鸣——以此逗乐“加害”她的人们。最终待黎明的曙光划过天空，客人离去，房间的灯火熄灭了，这个年仅十八、筋疲力尽的新娘瘫在离她最近

的长榻上，哭到睡着，这有什么好奇怪的吗？

第十二章　外国人慈善之举

一位住在上海的主教表示，他有时会想写一本关于中国“号叫声”的书，读起来会蛮有趣的。号叫声多种多样。例如，大部分苦力——无论在陆地上还是在水上——都是一边工作一边有节奏地喊号子。这些可怜的人肩负重担，在体力劳动的重压之下，努力地继续这项声乐训练，简直快要喘不过气了，仿佛他们不这样做，就无法继续干活似的。

早期，在外国人刚刚移居上海的时候，据说家里的仆人——无论是送食物去桌上，还是从桌上撤走食物——都沉迷于这种寻常可见、单调乏味的音调起伏，直到心烦意乱的就餐者强行叫停了这种习惯。

但在中国所有的号叫声中，最可怜的要数孩子的——在这片伟大的土地上，饱受折磨的孩子发出的响亮持续的喊叫声，昼夜不减。如果勃朗宁夫人[(1)]曾到访过远东，那一定会促使她再写一首类似《孩子们的哭声》的崇高诗篇，其感染力必会深深地打动世人的心。许多人认为奴仆问题在中国已是过去式了，因为大批人认为缠足已经不复存在了。确实，时常会颁布法令，废除奴仆制度，但是它们并没有得以执行，况且旧习难改。最多可以说，这个难以根除的怪物不再像以往那样明目张胆、无所顾忌地公然横行，但是罪恶依然存在，这一点是任何了解情况的人片刻都否认不了的。

出了喧闹的市中心，便是绿色的田野，充满清新的空气，那里矗立着一栋牢固结实的红砖建筑。主管的天才人物是一名面色和蔼、慈母般的女性，穿着新教圣公会女执事的服装。“这是女奴收容所吗？”访客问道。“这里是儿童收容所。”然后，女执事不以为然地笑道，“我们现在略去‘奴仆’一词，因为我们想尽我们所能帮助孩子们忘记他们那悲伤的过去。”房子很朴素，没花钱去装饰，还挤满了人。可容纳75人，去年挤了156人。楼上的游廊上，小折叠床排成了一排，负责人的卧室改成了托儿所。“你当然应该拥有一个可以称得上完全属于你私人的地方。”访客有点儿愤愤不平地喊道。“我竟觉得很平静很愉悦，但是和我的大家庭在一起时，我就做不到这样。”常挂着的微笑又一次让那和善的脸庞变得神采奕奕。

这项不属于任何宗派的事业是在1900年动荡之后由一群女基督徒开创的，不过现在的这栋建筑是在那十年以后才占用的。如今，在这么短

的时间内，这栋楼就已经不够用了，迫切需要加以扩建。这些孩子的年龄从3岁到20岁不等，因为有些已经在所里待了很长时间，已经长成了派得上用场的助理。小孩子大部分都是警察救出来，送到会审公廨，再从那儿移交到收容所。这些面黄肌瘦的小孩子最终会怎样呢？有些被拐走的送回到了父母身边，其他人由家庭或教会学校收养，但是有一大批因饱受折磨、身体过于虚弱没能扛得住疾病，便死掉了。收容所偶尔会举行一场简单的婚礼，女孩子从这儿出去，嫁到别的人家。上海是一个巨大的奴仆市场。中国各地的孩子都被送到这里，在这桩可耻的交易中，有许多是经拐骗犯之手而来。父母经常贩卖他们自己的孩子，因为有很多张嘴要吃饭，而米饭往往又非常非常稀缺。只有女孩子会变卖成奴。她们的身体、心灵和灵魂成了主人的财产，主人可以随心所欲地对待她们。那些可怜的小生命的经历复述起来太痛心了。一个5岁的孩子被人用烧得通红的烙铁夹了，还有一个6岁大的，没吃东西，在柱子上绑了好几天，指甲下被人扎了烧得通红的针头。有一个被活埋了三次。一个3岁大的小孩子——无人过问，没东西吃，差点儿死掉了——送到收容所时，体重只有10磅。有个孩子流血了，医生数了数他身上的烧伤和瘀伤，有240处。有一个进来的时候，胳膊都扭到变形了，有只眼皮都快被扯下来了。有个小奴仆，屡次被打得快奄奄一息了，最后被她的女主人扔到灰堆上，让她自生自灭。被人救到收容所的时候，她的脑子似乎有点糊涂。她几乎没有察觉到她周围的环境，如果有人靠近她，这可怜的孩子便会惊怕到尖叫。“你要杀了我！我知道你要杀了我！”“几周以后，”这位负责人说道——她讲述这个故事的时候，眼里满含泪水，“这个小家伙到处跟着我，一直轻声地对她自己说‘耶稣爱我，耶稣爱我’。”这位负责人是如何用她那颗温暖的心像母亲一般地照顾那一群孩子的呀！他们受的伤害越大、越虚弱、越可怜，她对他们的爱就越深。这些伤痕累累、遭人忽视的花朵，在她的细心照料下绽放，这是最令人赞叹的。直到最近，她还是唯一一个负责这项工作的外国人。虽然在炎热的夏天，许多人为了吹上凉风，都飞速搬走了，但这位忠实的工作人员，任季节变换，始终留在了她的岗位上。“我不能离开这些孩子。”她会这样强调。她不求任何人同情，因为中国没有人比她更热衷于此。

有一家叫“流浪之家”的收容所，正好位于上海的另一边。这一家收的孩子有点儿不一样，奴仆不多，大多是弃儿，甚至有刚出生的婴儿——警察在街上捡到的。很多孩子精神有缺陷，有些患有不治之症。这家的负责人是一位虔诚的女基督徒，这家收容所由工部局资助——这项

工作是几年前由工部局启动的。

长期以来，茫茫农田之中就只有一家儿童收容所，如今在旁边建造了一栋新建筑。那就是盲童男校。在一个因眼疾导致半失明或完全失明如此普遍的国家，没有哪个慈善机构比这个更有吸引力了。这所学校是三年前在一栋出租屋里创办的，但这些男孩子的心智发展尤为显著，很快就会迫切地需要给盲人教学的教师，这所学校的宗旨就是为他们的男孩子提供全面的教育，以使他们能够胜任这份工作。它也具有一个不断发展的产业部门，盲童男校——和儿童收容所一样，有部分资金来源是靠出售其产品，之后计划在同一地方再建一所类似的女子学校。

上海最著名的机构之一叫“济良所”。顾名思义，这家机构旨在救助被最残忍的奴仆制度束缚住的女孩。在这个国家，没有哪座城市的青楼有上海这么多。这里通常被称作是中国的所多玛（Sodom），[2]内陆地区的许多本土基督徒，只知道这里是“浪子他乡”（Prodigal Son）。[3]可悲的是，堕落的外国人的存在是在这个灯红酒绿的大都市门口种下罪恶的主要原因。

可以肯定地说，混迹于名声不好的那些场所里的中国女孩，大部分都不是因为她们自身的过错。拐骗犯会以这种方式处理许多被他们拐走的孩子。父母通常会卖掉他们年幼的女儿，特别是在饥荒时期，不愿看到她们饿死，便无知地为她们选择了这样的命运。

“栖身之所”位于南京路旁边的一条小巷中——南京路堪称“上海的皮卡迪利大街”。几年前，几位乐善好施并具有影响力的中国绅士成功地从工部局获批一则法令：可在每家妓院张贴通告，介绍这家“栖身之所”的基本情况及其联系地址。同时，还通过了另一条法律：禁止妓院接收14岁以下的女孩子。然而，这两条法规已经逐渐被默认为一纸空文，现在已很少或压根无人在意。获救的女孩只能在救济所过夜，或住到她的案件提交会审公廨为止，然后她会被送到济良所。该建筑位于市郊，远离了那些女孩子太过熟悉的既拥挤又危险的地带。因为一些显而易见的原因，人们发现将首年部和工艺部分开的做法是明智的——虽然她们都同住一个屋檐下。该机构的资助来源有工部局拨款、自愿捐赠以及售卖其劳动产品。济良所制作的玩具娃娃远近闻名。那些雕刻精美的小木脑袋是玩具娃娃身上唯一一个不是由这些女孩子制作的部位。上海的商行很乐意为此捐赠大批颜色鲜艳的丝绸、缎子和棉布的剩布料。这些娃娃的打扮代表了这个社会的各个等级和阶层，一整套有16个，具有真正的教育价值。

首年部的女孩子上午学习，下午工作。她们首先学习制作自己的衣服和布鞋等，待完全掌握了裁缝手艺后，她们便开始给玩具娃娃做衣服。女孩子可以从这份工作中获取微薄的报酬，以作激励和鼓励。工艺部的女孩子整日都扑在刺绣绷架上，晚上接受点教育。她们拿固定的薪水，主要是希望她们能负担自己的服装。绣品精美雅致，在上海内外需求不断，特别是对那些准新娘和准妈妈们而言。在长条形状、两侧开窗、气氛愉悦的作坊里，每天早晨8点都有工艺部的六十来个女孩子聚在这里一起祷告。女孩子们将刺绣绷架放到小桌上，铺开布料。当一切准备就绪，有人指着挂在墙上的一本《圣经》经文日历上的当日经文，此时房间里突然变得鸦雀无声。女孩子们一起齐声跟读这段经文，然后由其中一位女孩子做一个简短的祷告。这是一种甜蜜的习惯，好似让这一天有了一个恰到好处的开始。该日历由一位住在上海的中国妇女每年编写一次。

没必要去问这些女孩子过得是否幸福。她们那生气勃勃、心满意足的面容已表明一切。很少有本性不好的女孩子。很长一段时间里，仅有一次有人因厌倦了这种清净乏味的生活而反抗或逃跑。但她们渴望改变是很自然的，她们非常开心可以看到外界的面孔。住在附近的一位外国女士注意到了这一点，曾经请这些女孩子轮流到她家喝下午茶。首年部女孩子们去的那天，其中一个指着钢琴问主事的传教士："那个黑盒子是什么？"于是传教士向她解释那是一种乐器，后来有人去弹的时候，那些女孩子喜不自胜。这件事深深地触动了一位美国游客，她为济良所准备了一台漂亮的留声机作为礼物，如此尤物肯定也同样会为女孩子们带去永恒的欢愉。

进入济良所的大多数人，在几个月或一年之后，都会变成虔诚的基督徒，迟早有一天会嫁给基督徒。在中国，娶一个误入歧途的女孩子并不丢脸，只要她已经改了以往的作风。最近，有位女孩子嫁给了一位牧师，她丈夫的朋友对她称赞不已，以至于这位朋友来到救济所，乞求许给自己一个像她那样的妻子。"可是要如何把这些通常是花大价钱买去的女孩子从她们主人的手下救出来呢？"这位访客迷惑不解地问道。
啊，这就是黑暗之中透进的一线光明。中国有一条法律，没错，还是一条非常古老的法律：不得违背妇女意愿强迫其过着一种蒙羞的生活。如果她有机会上法庭表述自己的意愿，她可以选择更好的生活方式，任何人都不得反对。难就难在要摆脱束缚，获得发表抗议的机会。此外，许多女孩子因为年纪太小无法为自己辩护，比如那个三岁大的小孩，前几天就被亲生父亲抱在怀里，卖去了妓院。老鸨更喜欢买非常年幼的孩

子，因为这些孩子售价低，早年还可以卖唱。

济良所儿童分所坐落在一片舒适的农耕区，距上海五英里远。在这座美丽的保护区里，幸福地生活着160个被救出火坑的小家伙。幸运的是，童年时期通常很健忘，在她们的记忆之中，往事逐渐模糊，最终几乎消失于无形中。通行的是小屋制（The cottage system），这个大家庭约莫分成了20个小组。每个小屋都配有一位女舍监——由城市之家（City Home）的一位年长且可以信赖的女孩子担任，统归两位颇具奉献精神的外国人士照料。孩子们的时间主要用来做家务、学习、从事简单的生产劳动、从事园艺和玩耍。倘若某个女孩子展现出特殊的天资，便会被及时送往教会学校，那儿的课程更全面，更适合她取得最大的发展。

孩子们一长大，就会接受布道工作的训练，比如在免费的贫民儿童主日学校（Ragged Sunday-Schools）教书，到乡村召开祈祷会。实际上，每个孩子都长成了一个真正的小基督徒。

上海最引人瞩目的慈善机构之中有两家是由罗马天主教徒组织的。如果有哪个社会阶层比无依无靠的孩子更能博取人们的怜悯之心，那便是孤苦无依的老人，因为他们自觉承受痛苦的能力更强。中国人非常令人钦佩的一大特点是他们通常会善待老人。孝道在贫困家庭中最为耀眼，在这些家庭中，赡养父母需要作出真正的牺牲，而这些父母往往比他们的孩子更能照顾好自己。但是，有很多老人被独自留在了这个世上，食不果腹，无家可归，甚至没钱买一口棺材——那是他们会欣然躺下、去往极乐的地方。

天主教为贫困老人设立的养老院是用仁爱修女会（Sisters of Charity）的名字命名的，即“贫民救济修女会”（The Little Sisters of the Poor），这个名字流传最广。这栋宽敞的三层建筑收容了150位老头子和同样数目的老妇人，这已是养老院所能容纳人数的极限了。但只要有老人去世，立马就会有其他人补上他们的空位，因为总是有很多人在排队等着进来。入院的唯一条件是申请人必须年过60岁并且完全没有经济来源。收进来的大多数人年龄都在70岁或以上。人们很容易就认为，像这样的地方——这么多老人同住一个屋檐下，而且他们一生基本都是在贫困和肮脏的环境中度过的，从未想过要养成爱干净的习惯——应该不会那么诱人。然而，这里可以说就像伊甸园一样，擦得干干净净的地板上没有一丁点灰尘，在通风良好的大房间里没有丝毫难闻的气味，白色的床帐上以及老人用商行送来的碎布做出来的漂亮的补丁床罩上都没有

一点污渍。说到住在院里的人，那些可爱的老人脸上流露出何止幸福的神情呢！在这里，他们可以抽烟、喝茶，拿着烟斗和茶盏像喜鹊一样叽叽喳喳不休。为了不让新环境新生活束缚他们，老人们不必每周洗澡，但每周日早上要换上干净、修补整齐的衣服。这些淳朴的老人如果病了，会安排传统的中医照顾，不会安排训练有素的西医——因为这些病人排斥他们的那套新花样。所有有劳动能力的老人都有固定的职责，如纺纱、洗衣服、缝纫、护理等。女宿舍在大楼的一侧，男宿舍在另一侧，中间是小礼拜堂。“没错，”修女会会长说道，她在经过祭台前时停了一会儿，跪下来用手划了一个十字，“小礼拜堂在中间，所以你看，是上帝把我们区分开，也是上帝将我们团结在一起。”其中有几位修女是中国人，还有一位圆脸的见习修女在厨房里工作，那里闪闪发光的黄铜及铜制容器让人想起劳伦斯神父（Father Lawrence）及其特别整洁的活动领域。没有哪个中国女孩——除非她属于第三代基督徒——能够以“有志之士”的身份享有加入修女会的特权。

上海非常值得参观的场所是徐家汇（Siccawei）——一座地处郊区的村庄——的天主教堂，它是以耶稣会传教士主保圣人的名字来命名的。没有哪个人来到这座城市，还没一睹其尊容就愿意离开的——如果是女游客的话，当然就另当别论。因为（于她们而言）在法国修女们指导下制作的精细网织品和刺绣品才是艺术魅力的精髓所在，去售货处的客人基本不缺。

五十多年前，太平天国运动落幕，耶稣会会士们在几经周折之后，回到了他们此前逃离的上海，在徐家汇安顿了下来。他们在那里开始了一个规模较小的工程项目，该工程一直稳步发展，最终建成的规模可以用巨大来形容。簇拥在这座耀眼的现代化大教堂——其高耸的塔尖堪称地标——周围的有旧堂、一所男子公学及神学院、天文台、博物馆、孤儿院、学校和工业厂房。向妇女及女孩开放的建筑位于一条感潮河的一侧，向成年男子以及男孩开放的则在另一侧。一个外地人向一位修女打听向男孩子开放的建筑，被问的修女用斩钉截铁的口气答复：“我没法告诉你。那边发生的事，我和你一样都不知道。”每位修女都有她们自己需要负责的本职工作，她们一门心思恪守自己的本分。一共有50名修女，其中三分之二以上是中国人。这些中国隐士有时流露出优雅风趣的神情，非常引人注目。外国修女都是法国人。她们的奉献精神毋庸置疑，她们从不休假回家，有几个已经在她们的岗位上工作了40多年。

修女们要照料的虽然是一户平均有1700人口的大家庭，但是工作分

工极其细致，有条理有规则，没有争执和混乱的迹象。按照次序，首先是弃儿。每天，都有刚出生的小婴儿被带到收容所，或是常常趁着黑夜被人丢在门口。收容所都是来者不拒的，会为他们洗好澡、穿好衣服、放在干净的婴儿床上，然后会尽快带去机构里的小礼拜堂，给他们施洗礼取教名。许多弃儿进来的时候就太虚弱了，短短几小时或几天后，他们那磨难重重的生命便结束了。接下来是为天主教儿童开设的设有不同年级的日间学校、大型孤儿院以及为非基督徒或教外儿童——修女经常这样称呼他们——开设的寄宿学校，其操场、宿舍、餐厅和教室与其他学校是完全分开的。这个场地有一处僻静的角落，那里住着60位不幸的人，他们要么是盲人，要么是瘸子，要么就是智力有缺陷。他们的主要工作就是借助粗制的纺车纺棉——最迟钝的人也可以学会。

但是，徐家汇最为公众所知的是它的工业部门。数百名妇女被雇来制作精细网织品和刺绣品，她们大多都是收容所抚养的，然后嫁给了信奉天主教的丈夫，而丈夫的收入又不足以满足家庭开支。有专门为员工的婴幼儿子女设立的日间托儿所和学校。车间很大，光线充足。每个车间的中心位置都有一个高台，某位修女会坐在上面，俯瞰着这些女性。出售这些产品获得的收益非常可观。

在这条河流的另一边，向成年男子和男孩子开放的工业厂房要更多。其中包括许多部门，如木雕、木工、制鞋、与铁铜相关的活计、玻璃吹制、油画和水彩画及印刷机构。负责木雕和木工活的神父非常亲切，是他所从事行业里的天才。在他的监督管理下制作的一件作品精美绝伦，位居最精致的中国艺术珍品之列，送到了巴拿马博览会（The Panama Exposition）参展。年纪最小的学徒——10岁或12岁的男孩子——从为街对面的弃儿做小棺材起步，开始他们的技工培训。B神父指着那些男孩子，习惯性地说：“没错，他们开始谋生的地方就是别人生命停止的地方。”徐家汇传教机构在其自身所在的区域内经久不衰。源源不断涌入其中的无助之人使其发展壮大。但无论是传教士还是中国教友，都没人付出任何努力去接触未听福音的民众。这项工作以前由法国资助，但现在完全依靠自身的产业业绩以及自发的捐助。

上海所有的慈善机构时常都会收到中国人的慷慨捐赠，他们中有许多人都能理解并由衷地感激这些机构正在为他们国人所做的一切。最近成立的“有组织慈善协会”（Society of Organized Charities）（新教）为针对应受救济的穷人开展系统化工作提供了很大的帮助。

(1) 勃朗宁夫人，即伊丽莎白· 芭蕾特· 布朗宁（Elizabeth Barrett Browning），英国维多利亚时代最受人尊敬的诗人之一。《孩子们的哭声》便是其代表作之一。

(2) 依《圣经》记载，所多玛是一个耽溺男色而淫乱、不忌讳同性性行为的性开放城市。

(3) 据《圣经》记载，浪子是耶稣讲道时用的一个比喻。

第十三章　中国社会服务之成就

几年前，约有40名生活在中国南方某个省份的麻风病患者被赶出了他们那寒碜的棚屋，并被活活烧死。下令执行这一暴行的官员奉命为此提供解释的时候辩解说，因为麻风病人是公害，只会拖累这片土地，所以他决定，让他们越早离开越好。这就是他的社会服务理念，他代表的是在中国的一类人——将饥荒、洪水和瘟疫等灾难视作天赐良机，用以缓解这片土地上人口过剩的问题。但对于受过教育、深受兄弟情谊触动的年轻人，以及上一辈中的精英来说，他们和西方人一样，对刚刚讲述的这起事件深恶痛绝。

有一类慈善在中国并不新奇。为了赢取胜利以及蓄积功绩而进行的赈济已有数百年的历史。但是，恼人的贫穷、激烈的生存斗争、奇怪的习俗和迷信，这些都麻痹了情感，浇灭了内心本能的善念。例如，对普通百姓而言，要照顾一个病倒在路边的男子，就意味着行善之人（The Good Samartian）[(1)]要将这个可怜的倒霉蛋身上的厄运带到自己的头上，将病人带回家中，病人若死了，不仅有责任支付棺材以及下葬的费用——这在中国非同小可，如果他有亲属的话，还要就他的亡故向他们作出解释。不久前，华界有所不起眼的住宅起火了，很快便被烧成了灰烬。这家人——一个抱着新生儿的母亲带着一群大点儿的孩子，其中有一个生病了——差点就没逃出来。父亲不在家，大概是去工作了。一位女性传教士正经过这条狭窄的街道，看到这些可怜的家伙蜷缩在一起，孤苦伶仃地挤成一团，心生怜悯。“你们为什么不把他们带回家呢？”她对围观的群众问道。“她丈夫就要来了，我们必须得等他。”他们回道。一两个小时以后，这位女士在返回途中，发现这家人还在原地——那女人十分虚弱疲惫，把婴儿紧紧地抱在胸前。天正下着冰冷的雨。“你们要是不收留这几个人，我就带他们回我家了。”她对着一个旁观者愤怒地喊道。“她丈夫马上就到了，我们可不敢干涉。”他用响亮的声音果断地说道。第二天早上，看起来虽难以置信，但那女子和她的孩子们仍然流落在街上，无处栖身，也无人照料。于是这位传教士立马催他们去教会医院接受了体贴入微的照护。直到那时，这件事情的真相才得以揭晓。人们以为，如果有人对这几个无家可归之人表现友善的话，那么毁灭他们房屋的恶魔便会怒气冲冲地进入行善之人的家中制造灾难。因而，受灾者既然招致了众神的不满，那么唯一安全的方法就是让他们孤

身相处。不过，与这种情况相悖的是一则温馨的故事，并非个例——有个外国的婴儿溺水被救了上来，但寒冷噬骨，快要不行了，这时一位中国的老奶奶迅速地解开她的棉袄，将婴儿紧紧抱在怀里，直到他苏醒过来，救了他一命。

近来的这场革命引进了许多新思想，但没有什么比西方所理解的社会服务实践更能让中国受益。这个概念得到了中国人——既有基督徒，也有非基督徒——快速而热烈的响应，并且已经在许多地方取得了显著的成果。"外国人为我们做了这么久的事情，我们为什么不自己做？"领导者之间互相询问，医院、孤儿院、模范监狱、收容所以及工业厂房正在四处修建，报纸上，没有某个新项目正在开展的内容几乎是不可能的。在稳步发展的上海，社会服务正在迅速成为一种口号。这里提供了一种将新旧慈善行为进行对比的特殊机遇，这项研究既富有价值也兼具趣味性。

总管当地"慈善会"（Charitable Society）——最早成立的慈善机构——的办事处位于华界，名叫仁爱堂（The Hall of United Benevolence）。它的确切年限很难确定，因为似乎无人知晓。有人说，它有300年的声誉。由10名男子组成的管理委员会——办事处在一处面积宽敞的中国房屋——管理该团体的业务，该团体非常富有，拥有大片公共土地。其主要工作是向慈善机构捐赠场地，向贫民提供棺材，为各种现有的慈善机构发放补贴，免费分发中药。该机构最受中国所有阶层的敬重，可以说是大部分现有慈善机构产生的源泉。

一家年岁较久的慈善机构——创办于50多年前——是华界的"寡妇之家"。这家机构接收没钱或没亲属供养，并已经决定不再嫁人的寡妇——按照中国人的标准，这一决定是非常值得称颂的。女管理员是一位70岁高龄的老太太，喜欢说她已经被这个"家"收容了40年，这位目光炯炯、两颊红润的夫人无疑是这个地方最好的招牌。带有年幼子女的寡妇可以把孩子留在身边，直到女儿嫁出去、儿子能外出工作为止。在这期间，还会送他们去城里的走读学校读书。一个有300口人的大家庭就挤在这栋杂乱无章的老房子里，这房子是前总督赠送的，有许多小院子，由一些两层楼的低矮建筑围起来。每个女人都有一间自己的小房间，如果她家人多，可能还不止一间。这些场地相当整洁，但是孩子们成群结队地跑来跑去，吵吵闹闹的，没有规矩，正如某个来访的中国人曾直言不讳地表明："女人怎么样都要吵！"显然，要解救她们，还得靠她们的生产劳动，虽然她们的食宿是有人提供的，但是身体健全的人，她们自

己以及孩子的衣物是要自己供应的。所以她们整天都在做东西——主要是中国的鞋子、冥币以及衣服——东西卖了，便可获得微薄的收入。

“寡妇之家”虽然存在不足，却在一定程度上博得了真正意义上的尊重，但是有两家“弃婴之家”就并非如此了，它们只会唤起怜悯之心以及近乎强烈的愤恨之情。它们是有意要做好的，但是，现实多么讽刺呀！华界范围内的这家机构是上海最古老的慈善机构，其历史可以追溯到1710年。总管这一机构的仁爱堂偶尔会发布关于这项工作的报道。这些报道是按照中国人一贯采用的华丽文风撰写的，在详细描述了创始人和拥护者的良好动机以后，陈述了这一机构的管理规则。例如，要对每个孩子的年龄进行登记，要对每个孩子的外表及健康状况进行记录，也需记载“孩子手指、五官和四肢的线条及样子”。为免偏袒，乳母需抽签选择婴儿。靠近街道入口的地方有一个带孔的抽屉，可以放弃婴。带婴儿来的人必须用挂在抽屉旁边的棍子敲门，以通知有婴儿来了。这些以及更多琐碎的说明，均有详细的阐述与记录。

这些规定写得很好，但事实如何呢？访客需要相当机智与坚持才能进入“家”里面的房间，婴儿的真实生活会在那儿浮出水面。两三个受宠的会被乳母抱在怀里带到外院，但若请求进到里面，他们明显是不愿意的，而且会提出诸多借口。有时候唯一可靠的通行证就是地方执法官的工作证。显然这里并没施行什么残忍的行为，但正是因为看护人的严重过失与无知，这些婴儿短暂的生命才如此悲惨，因为他们中大部分都活不过几周或几个月。每位乳母负责两位弃婴。乳母可以留在“家”里，如果她们愿意的话，也可以将小孩子带回自己的家里，这种情况她们获得的报酬要稍微多一点。如果不能保证有足够多的乳母，那么这些弃婴，不管年龄大小——无论是几天还是几个月大——都要吃加了粗红糖的米汤。来“家”里的婴儿，几乎就没一个是健全的。患病的、体弱的、伤痕累累的，有的来时脖子上有一道意在致命的可怕伤口，这些弱小的生命还没诞生，他们的丧钟基本就已敲响了。安置他们的房间很小，而且照例几乎都是光线不佳、不通风的。在其中一“家”，即使是在上海的酷暑天，这些婴儿依然睡在闷热的房间里，而且床铺四周还围着织得很密的布帘子。另一“家”，婴儿就整天躺在竹制的婴儿床里，他们的小身体就任苍蝇叮、任蚊子咬。经常听到一片虚弱的哀嚎声，看到他们那骨瘦如柴的小胳膊小腿，这些都让访客心如刀割。每一“家”收容的50个婴儿，以及托人喂养的绝大部分婴儿，几乎无一例外都是女孩子。只有一种想法可以获得些许安慰，那就是：尽管这些孩子的处境很悲惨，但肯定和他们在自己家是不相上下的，甚至有可能要更好些。难怪中国的医生说

儿童死亡率高达百分之七八十。

令人欣慰的是，“圣约瑟夫救济院”（Hospice of St. Joseph）与这些“家”大不相同，在上海，已有将近1100名病弱和贫困的中国人住进了这家安全的收容所。但这个故事太精彩了，不得不从头说起。四年前，两位男天主教教徒——决心创办一家慈善机构。其中一位在华人自治政府（Chinese Municipality）身居诸多要职。另一位是个成功的商人。公共租界内的许多——以及中国人管辖的所有——有轨电车都是他家铸造厂生产的。他那些舒适的轮船，在多次尝试未果以后，最终克服了凶险的急流所带来的困难，在长江上游——远至重庆——的水域定期航行。他订阅了美国力学方面的期刊，通过翻译努力钻研，将期刊上搜集到的理念消化以后，发明并改造了以供中国使用的机器。看到中国的农民采用改良的农业技术是他的愿望，为了鼓励他们，他偶尔会给一个村子赠送一台他家铸造厂制造的现代化打谷机。他经常周日去乡下布道，虽然很忙，但一有机会就会停下工作，前往兵工厂，和那些死囚在行刑前一起祷告。最近，总统为他颁发了一枚很少人受封的勋章，所有认识他的人——新教徒和天主教徒都有——都称他是一个“难得的人”。

救济院的场地是仁爱堂下属的慈善会捐赠的，华人自治政府送了老城墙上的砖块（那些砖块好像能神奇地繁殖一样！）用作建筑材料。这一聚居地有男子医院、女子医院、男童之家、女童收容所、盲人收容所、小教堂、施药所、厨房，以及供精神病患者、吸食鸦片的患者、华界监狱的囚犯所住的房间。这些建筑已经完工了，其余的已在规划之中。这家机构的业务虽然是由这两位创始人指导，但是他们已经将机构交由仁爱会的12名修女负责管理——其中有4个欧洲人，其余的是中国人。

在中国现存的条件下，要维持这样一家大机构并非易事，但是这件几乎不可能完成的事情已经做到了，而且其管理近乎无可挑剔。每天早晨，长长的、明亮通风的病房没有一张床位是空的——都有一位在国外受过训练的中国医生来查房，这是无偿提供的服务。在男子医院的二楼有一间漂亮的铺着白色瓷砖的手术室，所有最新的设备均有配备。那些有劳动能力的人，需要从事一些劳动，室内室外的都有。孩子们学习半天的时间。医治不好的病人以及无人赡养的老人会终生收留，但是那些身强体壮的以及正值中年的，一旦痊愈就会被送离，好给其他人腾出空间。在这片土地上，精神病患者长期以来都是被人忽视、受人虐待的，能在这儿找到一座为他们而准备的收容所，看他们在这儿受到最体贴的

照顾，是一件令人高兴的事。几个月后许多人都痊愈回家了。每个房间都浇筑了水泥，前面都有铁条防护栏，这样门就可以敞开着，便于采光通风。每个房间后面都有一扇门，一条狭窄的走廊通向浴室，浴室有陶制的大澡盆和自来水。有些是简洁的软壁病房，以供狂暴的病人入住。这个地方和隔壁罪犯的病房——如人所愿，非常干净卫生——由一位品行可靠、信奉基督教的年轻人负责。

除了这家救济院以外，这两位富有同情心的创始人还在一条人来人往的街道上建了一栋三层楼的福音堂。年长的那一位说："我们希望它成为一个让每个路人——特别是这座城市里的外来人——都能停下脚步，探讨基督教教义的地方。"与之配套的还有一所面向男孩子的走读学校。

在古老的宝塔附近，盛开的桃园之中，坐落着一家大型孤儿院——男女都收。这也是一家信奉基督教的机构——不过是新教，十一年前由一群男士创办，其中有几个曾就读于教会学校。男孩子和女孩子分居在不同的——但相通的——院落里，很难找到一群比他们更快乐、更开心的小孩子了。查经（Bible Study）[(2)] 备受重视，男童开展生产劳动是重点。靠出售他们制作的藤制家具、彩绘卷轴、布料以及温室栽培的鲜花——特别是每逢一年一度的菊花展——来满足当前的工作开支，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

与这家孤儿院同在一条路上的——但在离得更近的镇子上——是"上海贫困儿童之家"。这家不是信奉基督教的，但却是这座城市最有趣、管理得最好的机构之一。几位有影响力的商人是其发起人，他们是有着远大理想和宽阔眼界的中国人。这个"家"约有20个女孩子和100个男孩子，他们中有许多是负责人自己在街上捡来的流浪儿。这家机构有一大特色，在通风良好、空间宽敞的宿舍里——这里不存在肺气肿的问题，孩子们都不用床铺，而是睡在地上。这个"家"有一支著名的管弦乐队，接待室的墙上有一张照片，立马就能吸引人眼球，照片上这支乐队的成员——既有男孩子，也有女孩子——手拿乐器，坐在大厅的舞台上。这个"家"有两个独特之处：其一，在漂亮的户外体育馆教授古老的中国拳术和剑术；其二，作为学校学科的农业和园艺学备受重视。事实上，这好像是上海唯一一所将农业作为学科的机构，该机构周围充足的土地提供了实践劳动的机会。关于这家慈善机构，值得记载的是，委员会的10名成员中有5名是女性。不过，她们还没有发展到可以与男士一起参加委员会会议，而是要单独举行会议。应该受到指责的可能是男人

——这些可怜又愚昧的生物！

技工学校的价值再怎么强调也不为过，没有什么比开办并维持这种学校更能将社会服务变成慈善渠道的了。直到最近，技工培训在中国还是完全被忽视的。即便是现在，如果有人问中国的教育工作者：“上海有技工学校吗？”他会答说：“一家都没有。”但是，实际上现在至少已有两家，很快就要再开一家。不过，这几家好像并未被归为学校，因为它们只招收付不起学费的穷小子，还因为书本知识的学习是次要的。最好的技工学校是四年前开办的。地点在一栋大楼里，这栋楼没有分隔成不同的房间，但房间是从中心开始沿着不同的方向岔开的，就像车轮的辐条那样，每间都装有窗户，因此保证了充足的新鲜空气和良好的通风条件——即便是最热的天气。“你们有多少男孩子？”有人问班主任。“100个，我希望我能有空间容纳500个！”他诚恳地答道，这有点出乎意料。这些男孩子年龄不一，从很小的小家伙到16—18岁的小伙子都有。行业种类丰富多样，足够满足每个孩子的爱好。这些行业包括编织地毯、编栅、制作肥皂、制陶、画肖像画、制造幼儿园玩具、用缝纫机制衣以及用针织机织长筒女袜。男孩子白天工作，晚上学习。他们引以为傲的是他们的铜管乐队，他们在婚礼和葬礼上演奏，为学校赚了不少钱。校舍占地三分之一英亩，这地方原来是个公墓。为了使用这片土地，不得不迁走了139座坟墓，这多么符合中国的特色啊！

上海最常见的不法行为之一就是拐卖。中国的孩子要是健康可爱的，就得要小心保护。拐骗犯大多是女性，这种罪恶的生意可赚大钱，因此很多人都参与其中。拐骗犯愈发胆大狡猾——选那些在街上玩耍的或在外面跑腿的下手，甚至有直接从家门口诱骗抢夺的。男孩和女孩都有人偷，不过男孩子奖赏更多，总需要他们做学徒，给那些没有福气、后继无人的家庭收养，因为死后没有儿子在牌位前烧香、去墓地祭拜的一家之主，是所有人之中最凄惨的。不过，长相漂亮的小女孩总是很轻易就处置了，要么送去妓院，要么就是送去私宅当奴仆或是童养媳。

几年前，上海约有30名热心公益的中国绅士组织了一个反拐卖协会，开始严厉打击这一罪行。他们聘请了有经验的中国侦探，突击进出港的海轮和江轮，逮捕所有可疑人物。那些拐骗犯虽然狡猾，但一次次的事实证明，他们并不是那些足智多谋的侦探的对手——许多孩子已经被成功救出。这些可怜的年幼受害者经常被藏在一筐衣服里，或是藏在表面装有水果或商品的盒子里。有时会发现两三个孩子蜷缩在一个盒子里，盒子上只留有最小的孔可以透气。非常年幼的通常被下了药，而年

纪大一点儿的则是用最恐怖的威胁手段吓得他们不敢发出声音。距离上海5英里处——离铁路很近，但周围是一片乡野——有一座已有多年历史的大型佛教寺庙。革命时期，中国的许多寺庙都被废弃，用于其他用途，这一座被反拐卖协会租用为获救儿童收容所。庙里面的神像和香炉撤走了，被烟熏黑的墙壁刷白了，僧侣们被遣走了，这个长期以来回荡着虔诚信仰者的喃喃诵经声的老地方，如今响起了两三百个孩子的欢声笑语。女孩子——相当少数——住在后面的庭院，不过那儿又大又舒适，男孩子住在前面。寺庙的大殿已经改成了给男孩子就读的学校和礼堂。每天都在上海发行的中文报纸上刊登有这家收容所的广告，并附有近期获救儿童的描述和照片。通过这种方式，已有数百个孩子由他们的父母认领回家了。无人认领的孩子则留在收容所，教他们学一门技术活，直到他们能够出去照顾自己为止。伦理学是学校的一门课程，但孩子们可以自由地选择他们愿意选择的宗教信仰。

在上海的中国士绅阶层经营有几家免费的施药所。其中最大的一家——门面位于一条熙熙攘攘的街上——有扇门上用汉字写着一则座右铭“悬壶济世”（Loving to Save），另一扇门上写着“神明庇佑，圆满幸福”（Heaven Bestows Perfect Happiness）。据说这家慈善机构已有半个世纪的历史，其建筑本身也留有经年累月的痕迹。施药所每隔一天开放一次，上门的患者数以百计。十几名训练有素的中国医生出诊，并分成了两类：一类治疗内科疾病，另一类治疗外科疾病。他们就像好人与坏人那样是分开的，各自坐在自己的桌子旁——在院子对面有顶的走廊下面。施药所后面是一间为穷人制作棺材的大作坊。

七年前，瘟疫肆虐，一位著名的中国慈善家在该市市郊创办了一所隔离病院。他成功地买下了一户有钱的中国人家的房子，实际上，他那几个妻妾和一众子嗣在两天内就腾出了场地，为中国人立下了这一史无前例的丰功伟绩。此后，主楼已经增设了病房，这家医院如今可容纳一百来人。通过这位慈善家的努力，以及在一位杰出的外国人士——李提摩太博士[3]——的帮助下，红十字会中国分会于1904年成立，总部设在上海。有三家红十字会医院在运营，分散在上海不同的地段，其中两家专门在霍乱流行期间接受霍乱患者。其中有一家几个月前举行了落成典礼，有许多有影响力的中国人以及一些外国嘉宾出席。没有什么能比这更清楚地说明这个民族在社会服务学方面取得的进步了。该建筑是从一座老旧的中式宅邸彻底翻新过来的——庭院和客房多得数不清，内有寻常可见的优美木雕、壁画装饰以及古色古香的木制屏风上镶嵌着的半透明玻璃小方块，不过其中大部分都已被时兴的大窗户所取代。即便是

最讲究的西方人，也不会要求更整洁的病房，也不会要求为各类男女患者安排更洁净的检查室和手术室或是更齐全的设备，尽管整体规模有点小。“一个月以后这地方看起来会如何？”偶尔确实会出现这个问题，紧接着是这样的形容“既然开了最好的头，结局自不会最糟”，让一个能够启动这项工作的委员会去监督维护工作，自然也是可信赖的。一群年轻的男护士穿着整洁的白底蓝边制服。女护士——好吧，坦白说，一个都没有。“要找到女护士太难了，”其中一位医生解释说，“我们当然要有女护士，否则我们就没法为妇女开科室。”中国人自己对这家医院浓厚的兴趣——从现有的人数以及他们煞费苦心的考察就可证明——便是最有希望的迹象之一。一位年长的绅士，面容儒雅慈爱，一路从南京赶来——得要半天的路途——对这家医院进行调研，以便在他自己的城市创办一所相似的机构。

这家优良的现代化医院有一位可爱的中国女医生，她在广州一所教会医学堂受过训练，她的事迹可以写上一整章，但没有时间讲述了。她无私得过了头，革命时期全心全意在红十字会服务，将其钱财和生活全都倾注于相关的慈善机构，为了国民的福祉——他们心理和生理的需求全然系于她心头——她个人再怎么牺牲都不吝惜。

有一家规模虽小但绝不可轻视的慈善机构在夏日街头免费提供饮料——并非酒精饮料，而是茶水。热腾腾的茶倒在了小摊位里面的陶罐里。罐子旁边有个竹瓢，所有的路人都可以停下来饮茶解渴。在整个公共租界以及华界，隔不了多远就有一处茶栈，这是一份不可估量的福利，特别是对辛苦工作的苦力而言。

另一家能很好表明中国贫困境况的慈善机构负责防止废弃大米的流失。米饭是中国的主食。仆人叫主人吃饭时，说的不是“晚餐已经备好了”，而是说“饭好了”。浪费米饭是罪过一桩；节约则是功德一件。当中国式帆船满载着从全国各地收来的大米，越过小溪渡过大江，抵达上海的时候，这种珍贵的谷物不可避免会从袋子里筛几捧出来，掉落在岸上。心怀慈善的人就会将其拾起——连同上面沾染的淤泥一起，然后辛苦地将其分开洗净。一年下来，以这种方式收集到的、然后分发给穷人的大米约有几百磅。有几家当地的华人协会，习惯在寒冬腊月时节每天给大批受尽苦难的穷人赈济食物——那些穷人在指定的时间段排队领取他们的份额；这些中国人每年也会捐赠大笔的钱财，送往大闹洪水和饥荒的灾区，以减轻穷人的负担。

去年在上海发生的最重大的事件，或许就是年轻的中国女性成立了

社会服务联盟。联盟的领导者是基督徒，她们用一种圆滑机智又不屈不挠的方式，确保她们的影响力得以彰显。刚开始就已经为贫困人口开办了五所免费的走读学校——就读人数共有几百人，预计很快就会开办其他的学校。与每所走读学校配套的还有一家由义工教学的主日学校。他们的计划是让这座城市遍地都有慈善学校，学校里每天的时间一部分用于学习中文，一部分时间用来手工训练。所有的经济负担由联盟成员以及她们有兴趣的朋友承担，有些位居高位的女士，此前一直过着以自我为中心的生活，如今每周要花几个小时来教学。这场运动正在吸引广泛的关注。

---

(1) 行善之人源自《圣经· 新约》的《路加福音》。

(2) 查经是一种基督教会活动，指一群人在一起查考《圣经》。

(3) 李提摩太（Dr. Timothy Richard），英国浸礼会传教士。长期在中国活动，以西方文化吸引知识分子和社会上层人士。他还主持广学会，出版《万国公报》等报刊，翻译出版多部著作。

第十四章　工厂之传奇与悲悯

12月一个寒冷的傍晚，寒风刺骨。在杨树浦路上的工厂集聚区，路上到处都是人。妇女和小孩子，还有为数不多的男人，正沿着这条昏暗的公路匆匆奔走着，也有坐在手推车里的，因为快6点钟了——到了换夜班的点了。在一家大棉纺厂前面，围着一群瑟瑟发抖的人们，在等印度警察开门。人们清瘦凹陷的脸庞冻得发紫，背部向前弓着，为了保暖，双手缩到了有夹层的棉袖里面。不远处，砖墙上一个很浅的壁龛里面站着一个神情严肃的小男孩，大约7岁左右吧。他看上去就像一位年轻的哨兵，腰杆挺得笔直，双臂紧贴着身体，自然下垂。有人问他在干什么，他只简单地回了句“取暖”，然后尽量地和这堵挡风墙贴得更近一点。这个可怜的小伙子，命他值班的哨声很快就会吹起，他得在轰隆作响的机器和令人眩晕的转轴中间一直不停歇地工作，直到早上6点令人心旷神怡的信号声放他下班为止。

中国种植棉花的历史并不算久远。是几百年前才开始的，有人说第一批棉籽是在11世纪——有人说是13世纪——通过新疆运到中原的。[(1)]说来也怪，最初促进棉花种植的竟是一位妇女，因为一直到热心公益、有事业心的黄女士[(2)]负起责任，在长江流域居住的农民之中发放棉籽，这一作物才算真正地得以种植。如今，这一流域是这个国家最兴盛的产棉区。中国数百万人口中，有百分之九十的人都穿着棉布——一种粗织结实、染成蓝色的布料。但是在很久以前，在棉花这种作物为人知晓以前，人们穿什么呢？太子和农民都穿着丝绸和细麻布吗？我们所知的是，棉花的引进受到了蚕丝和大麻种植商的强烈反对。早在公元500年，中国典籍之中就有“棉袍”的记载了，这事很古怪，不过它们显然还被视作稀世珍宝，毫无疑问是由游客带进这个国家的，又或是进贡给中华（Flowery Kingdom）威严统治者的贡品。

中国的第一台纺车是印度赠送的，这种粗制滥造的纺车几乎没有一点改进，如今不单单在内陆地区，在上海这种大都市及其周边地区都有许多户人家依然在使用。许多家庭还和古时候一样，使用他们自己的简易手工纺织机。中国古老的习俗难以改变，但南方省份是最不守旧的，广州是最先进的城市之一。因此，在1870年左右，一家广州的商行开办了一家使用蒸汽机的棉纺厂，此事并没有让我们觉得惊讶。当一切准备就绪，这些农民愿意将他们的棉花交托给这家杰出的商行吗？他们没一

个人愿意！他们深信，通过某道神秘的工序，他们费了很大代价种植出来的作物便会不翼而飞、永不再现。所以，这家满怀希望创办的企业注定是要失败的。然而，20年后又尝试了一次，这一次成功了。这家企业也吸引到了外资，甲午战争结束后，签订的新条约落实了保障措施，创办了若干家外资工厂。起初，这些工厂——就算不是完全亏损——并不盈利。这主要是由于纱锭突然激增，棉花供不应求，价格上涨。如今情况可不一样了，利润往往都非常可观。中国各个省份都或多或少地种有棉花，但质量低劣、出产不足。这并非是由于土壤和气候条件不足——特别是就中下游省份而言，而完全是因为农民的疏忽和无知造成的。他们种田的方式非常随意，或者严格来说，对耕种压根就不上心，任凭自然界随心所欲、恣意肆虐。引入了科学的选种和播种方法后，几年之内，中国农作物的特性没理由不发生彻底的转变。外国人正计划在上海附近建立一所实验性农场，并希望每年都能说服内陆地区的一些农民花几个月的时间在里面干活，接受实践指导。据估计，在过去十年中，中国的棉花种植面积增长了100%。

虽然已经取得了巨大的进展，但尚未停止，棉田还将成倍增多。“但是土地从哪来呢？”有人问道。“中国有数百万人口必须得吃饱饭，稻田和麦田肯定是不能舍弃的。”那些是不能舍弃，但是昔日斑斓绚丽的罂粟田——如今已经禁止种植——可以利用，然后还有坟地。那些土墩形以及马蹄形的巨大坟墓所占的土地数量庞大，但正一点一点地为西方文明所侵占。最近在上海召开的医学会议上，中国最出色、在国外受过训练的医生之中，有一位出于卫生和经济原因，竟有胆量提倡火化，或者至少将死者的坟墓圈定在山坡以及其他不适宜耕作的地点。中国每年有一半的棉花产量是要出口日本的。另一方面，这个国家又从美国进口大量棉花。外国销往中国的棉布种类繁多，棉布在中国非常受欢迎，特别是印花棉布。尽管中国市场上日本商品泛滥，但是日本市场却不对中国成品开放。然而，在不久的将来，中国应该很容易就可以种植最优质的棉花，在全国各地开设棉纺厂，从而满足自身的需求。这会缓解拥挤不堪的农耕区的压力，而且可以为许多闲散人员提供就业机会。

中国棉花产业最需要的是政府的扶持照顾。在此之前，出产的棉花无论是在质量还是数量上都不会有什么进步。到目前为止，中央政府所做的，充其量也就是拖拖拉拉地对上海“棉花反掺假协会”给予了认可，并在海关专员的指导下对棉花进行掺假检测，这产生了良好的效果。遗憾的是，到目前为止，中国人所有的工厂拒绝加入该协会。中国本土工业最大的障碍是课征重税。在日本，原材料是进口的，成品出口是免税

的。在中国，不仅没有给予这样的鼓励，而且还征收国内税，以致农民必须付钱将棉花沿江运给制造商，制造商将纱线和布料提供给商人，商人再输送给这个国家的买主。

中国目前约有40家棉纺厂，其中近三分之二都在上海及周边地区。这座城市的棉纺厂有三家是日本人拥有和经营的，有几家是欧洲商行的资产，但大部分属于中国人。最古老的棉纺厂——创办于至少25年前的上海——是中国杰出的政治家李鸿章资助的。虽然原来的建筑物在几年前被烧毁了，但它现在仍然由中国人管理经营。[3]这一家是规模最大的棉纺厂之一，拥有纱锭6万锭。副主管是位精明的年轻人，最近才从宾夕法尼亚大学毕业，就读期间专攻社会学。他入职时抱有很高的理想，希望可以逐渐实现。第二古老的工厂也是中国人的。这一家的厂主聂先生（C. C. Nieh），[4]是位与众不同的男子，他去美国游览了五个月，最近才回来，他在那里对棉花种植和棉纺厂进行了仔细客观的研究。他的目标是尽快将他的工厂提升到最高的效率。事实上，他手下的美国经理汇报说，他的上司急于快速前进，其速度是工人训练水平跟不上的，并称“在他手下工作很快乐”。上海最大的棉纺厂是英国人管理的，纱锭有7万锭，雇用的人手达五六千人。最新出现的棉纺厂——体现了建筑和设备方面的最新思潮——之中，有一家归日本人所有。砖墙内部砌了一层水泥，地面是钢筋混凝土的，一面铺有玻璃的锯齿形屋顶，保证采光充足。机器——采用的是英国制造的最好的机器——是用电操作的，而上海其他工厂——聂先生的工厂除外——都是使用蒸汽的。这家工厂的一大特色是，员工大多是男人和男孩子。女性帮手几乎只有其他工厂才有。

几年前，在上海的日本工厂主为他们自身和中国人做了一件好事，他们派遣了100名中国男性和女性前往日本，在工厂里接受了9个月的指导。这些训练有素的工人回来后，一直在为那些替日本人干活又没有经验的中国人提供指导。

每家工厂的工资都差不多，而且和中国的工资水平比起来，还相当不错。儿童每天的收入为11—15美分，妇女则要看她们的技术15—35美分不等，男性每月收入为15—20美元。这些是用墨西哥货币[5]估算的，其价值不到美国货币的一半。有些工人来自郊区的农场，经济条件较为宽裕，一家可能有一两个人在工厂里工作，与其说他们是万不得已，还不如说是为了多挣一点钱。但是其他人——而且这些人的数量远远超过了那些宽裕一点的人数——是最穷的穷人，工厂和他们家之间通

常隔着几英里远，但他们通常连坐独轮车的一两个铜板都付不起。可以举一个实例。一个年幼的女孩子靠着每月挣的2.5美元养活守寡的母亲和小弟弟小妹妹。许多次，月光皎洁，这个孩子误把明亮的月光当成黎明的曙光，3点钟甚至更早就出发了。天气好的时候，走路倒没那么糟，只不过是在她加入同路的其他工人队伍之前孤独了些。但是在寒冷彻骨的冬天，刮着阴冷的风，下着冰冷的雨，泥泞的道路极滑，要怎么办呢？这对那些裹过脚的妇女来说，是最艰难的，这些妇女太穷了，坐不起五六个人一辆的手推车。那边走来一群人，在迷雾中摸索着前进。有个可怜人最终走到了工厂的大门，累瘫在冰冷潮湿的地面上，候着哨声。“你走了很远的路吗？”有人同情地问道。她挣扎着站了起来——半带恐惧，半带反抗，好像是做好了挨训的准备一样——回答道：“从虹口来的。”——大约有三英里的距离。不一会儿，她那苍白的脸上挤出了一丝转瞬即逝的笑容，但她累了，太累了，还有长达12小时的不间断的工作在等着她。我们就希望她是在织布机上工作的吧，因为那样她还可以坐在窄窄的长凳上。而看管纱锭的妇女和儿童在漫漫长夜必须得站过去。

工人们用圆形的小篮子装午餐——篮子大小都是统一的。篮子里有一半的空间装了冷饭，摆在中间的肯定是一个小碗，碗里盛了几口豆腐、咸鱼或其他简单的调味品。吃之前，将开水倒进篮子里，让水滤过米饭，从篮子底滤出，这样食物就热了。厂里也供应热水泡茶。在新式的日本工厂里，茶本身就是为工人提供的。“算不上最好的，”主管说，“但不管怎么说，是茶。”这家工厂为工人提供了简陋的食堂，正午和午夜都有半个小时的吃饭时间。另一家工厂在正午和午夜有15分钟的吃饭时间。住在附近的一位英国女士说，夜里巨大的发动机停止震动的时候，她总是会醒过来，想到当她舒服地躺在床上休息的时候，路对面那些脸色苍白的妇女和睁大眼睛的小孩子正在长时间地辛勤劳作，便心生怜悯。大部分工厂压根就不准中途歇息或吃饭，人们什么时候饿得受不了了，就吃一点——偶尔在他们照看织布机或是照看卷轴和纱锭的时候，抓一口东西吃。以前那些母亲会把还没断奶的婴儿带到厂里，工作的时候就把他们放在脚旁边，但是大型的工厂已经不准这样了。某个亲戚——有可能是奶奶——会把小孩子抱给母亲喂奶，一天去两次，上午的时候抱去一次，下午再去一次。上夜班的母亲通常在离家之前会挤好足够的母乳，够婴儿喝到她们早上回来。

每家工厂的纺纱车间都是24小时运转的，但是晚上没法织布，所以织布机是停的。有家工厂每天工作14小时，“这些小孩子必须得站着工

作那么长时间吗？”经理的一位访客问道。“是的，”他轻轻地耸了耸肩，“对他们相当苛刻，是吗？”“但是你知道中国车间的情况吗，”他补充道，“他们经常让学徒工接连工作18—20个小时。”

年纪很小的孩子——就是那种五六岁的幼儿——最好的工厂已经不再雇用了。与其说这是为了那些孩子着想，还不如说是因为他们发现那些小孩子非但帮不了忙，还会碍事。但是父母试图越过门口那些目光敏锐的印度警察，把孩子偷偷带进去，于是换班的时候，这些警察就得一直忙着把他们赶出去。

妇女和女孩子的雇用工作一般是归中国女工头所管，她们得确保有足够的工作人手。这些妇女通常都很精明，办起事来有条不紊，十足地欣赏她们那光荣的岗位。最近有一个女工头走进了有轨电车的头等车厢。她穿着宽松的蓝外套、系着围裙、绑着工作人员的头巾，这时中国的售票员走过来，粗暴无礼地对她说道：“老太太，你是三等座，滚出去。”“我为什么要出去？”她坚定地回答，“我付得起头等座的钱。”这位售票员意识到粗布衣裳的背后是个强势有个性的角色，便立马改变了语气和态度。“不好意思，夫人。”说着便恭敬地接过递给他的铜板。这些工厂每月照例有四天假，不过并不都是在星期天。有些工人反对周日放假，因为他们说这样会带来厄运。

几个世纪以来，中国人一直是一个以农业为主的民族，他们并不像日本人那样喜欢机械劳动——日本人长期在学校接受技工培训，首先培养更加沉稳、更加可靠的工厂工人。然而，这些富有耐心、慎重呆板、拥有无穷耐力的人，经过培训可以胜任最高级别的工作。改善他们的物质条件，是一项迫切的需要。一位外资工厂的负责人说：“我在上海这一家工厂干了二十年了，我希望在我看到厂里的雇工住得更好、吃得更好、穿得更好、受的教育更好以后，我再动身回国。但是，只有中国政府让他们享有比目前更好的条件，去和棉花市场上的其他工厂竞争，这些雇主才能做到这一点。”聂先生正在践行他奉行的仁爱原则，尽力将24小时分成三班倒——而不是两班倒，并尽快免除童工，这样这些男孩子就可以不受约束地在他工厂旁边正在建造的公立学堂就读——这块地是他捐赠的。这位慷慨善良的男人——最近信奉了基督教——正在厂区规划一所女子学堂、日间托儿所和医院。几年前，他和同是基督徒的妻子，将他们美丽的私家花园开放为街头儿童的游乐场。当他们的朋友加以劝阻时，他俩微笑着回答：“我们觉得独自享受太自私了。”近期成立的“上海华商纱厂联合会”（Mill Owners Association of Shanghai）预计将

为采取与所需改革相关的联合行动铺平道路。

虽然棉花在中国完全算是外来品种，但丝绸却是本土产品。四千多年前，在那遥远模糊、几近远古的时代，世界各国之中，唯有中国了解蚕桑艺术。让这个国家感激不尽的又是一位妇女，因为相传早在公元前2600年，伟大的黄帝之妻，就用蚕做过试验，最终发现了一种从蚕茧中抽出蚕丝的方法——与现在的方式大同小异。这是一个宝贵的秘密，中国小心翼翼地守护着。但是公元5世纪的时候，走漏了风声——秘密往往都是守不住的，瞧啊，泄露秘密的是位妇女——发生这样的事情并不奇怪。地处新疆地区的于阗国[(6)]君主迎娶了中国的中原公主，据传，新娘被护送到夫家的时候，成功地将桑树种和蚕卵带过去了——她冒着生命的危险，将它们藏在头饰里面。因此，蚕桑便传到了中亚地区，后来又传到了欧洲。有个巧合很有趣：虽然是于阗国从中原这里学到了丝绸织造术，但几个世纪以后，也正是于阗国为中原提供了第一颗棉籽。所以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这笔债也算是还了。

中国虽然与世界上其他国家分享了蚕桑的秘密，但在长达50年里，世界上有一半的丝绸贸易都为中国所掌控。其后，日本在这场竞争中后来居上，如今在丝绸生产和出口方面处于领先地位。大家所公认的是，如果中国政府充分认识到丝绸产业的价值，加以扶持，废除过高的税收，并引入科学的蚕桑方法，是不会发生这种情况的。照眼前的情形看，在有利条件下，中国还是有望东山再起的，因为在中国发现了最好的茧，其韧性远远超过了其他蚕类。虽然没有哪个省不养蚕，但宽泛地讲，中国生产的丝绸有三分之二是来自长江流域及其北方地区，剩下的三分之一来自南方。蒸汽缫丝厂是近期才有的。在漫长的几个世纪里，细丝线都是用粗制的手动卷轴纺出来的，然后用同样粗制的手工织机将丝线编织成女性视作珍宝的精致面料。即便到现在，中国还是没有机械丝织机。所有的编织工作都是在手工织机上完成的。它们常常发出砰砰声，到处都能听见。当游客停下脚步，往一间被烟熏黑的小车间里面看去——里面大抵有六个人在忙着操作他们手中的梭子，会惊叹于这样的环境竟能产出如此珍贵美丽的纺织品。通常，一座城市会以某一种丝绸而闻名，一个省可能会有两三百个品种。

直到1882年，才有人尝试创办蒸汽缫丝厂，但并不成功。十年后，有些工厂投入运行，其中大部分都归中国人管理。与棉纺厂的情况一样，直到甲午战争结束以后，才有大量的外资投资缫丝厂。到1901年为止，上海开有28家工厂，其数量与今天大体相同。在这一早期阶段，最

大的工厂雇用了90名男性、630名女性和385名儿童。创办一家缫丝厂所需要的资金比棉纺厂要少得多，但缫丝厂更加不稳定。蚕卵孵化的时候，就必须要订购蚕茧，而且要冷藏，但是差不多要一年以后才能交货，那时的市场情况会如何，是没法预测的。将缫丝厂维持下去还是非常可取的，因为缫丝厂的丝绸价格是手织机纺织的两三倍，而且收益多半都以工资形式发给工人了。

在某些方面，缫丝厂的行业现状比棉纺厂要好一点。缫丝厂晚上是歇业的，并非出于人道主义的考量，而是因为天黑以后这种活就做不好。星期天通常都休息。有些工厂隔一个周日上一次班。早上有15分钟的早餐时间，中午有一个小时的午餐和休息时间。至少有一家华人工厂里，母亲是把还没断奶的婴儿带在身边的，那些小家伙一整天都躺在母亲脚边的地面上。他们很少哭，仿佛是出于本能知道不准哭。耐心忍受这一课，在中国从小就能学到。

缫丝厂的第一项工作是对蚕茧进行分类，没用的扔掉，将上乘的与劣质的分开。这个活儿虽轻松但单调，分配给了女性。将缠绕的蚕丝从卷轴上脱下来、测试、称重并将其捻成漂亮的形状以便装运，则需要更多的技巧，挣的工资也会高一点。这个活儿大部分也是女性做。

缫丝厂的悲惨际遇集中在缫丝车间。供应开水的蒸汽管让这个车间四季都处于高温状态，而在七八月份的炎热天气里，这个地方，正如一位外国经理所表达的那样，“就是一座名副其实的炼狱”。只有当微风小到不会吹毁网状的丝线时，窗户才能打开。长长的车间里，坐满了一排排的妇女，她们前面站着一排排的女孩子，中间放着一个缠线用的支架。每个孩子管控一个装着一半开水的固定铜盆。她要做的就是把蚕茧放到水里，用一把小芦苇刷拍打它们，使其软化。待蚕丝足够松软以后，就将这一堆蚕茧交给对面的妇女，她面前也有一个浅一点的铜盆，装满了开水。她熟练地从每只蚕茧中抽出一根丝，固定在架子上。然后踩下踏板，丝纺成了线，最后从头上和背后传过去，缠绕在卷轴上，卷轴的三面都用木箱子围起来了，以防染上灰尘。如果丝线断了，这些妇女会迅速熟练地把这些细得快看不见的线捻接起来，通常都同时纺六根线。晚上从卷轴上取下丝线，若分量有一丁点不足，或丝线有任何瑕疵，负责缠绕的那个人就得被罚款了。妇女和孩子的动作非常娴熟，手不用放进水里，但是她们手上的皮肤很松弛，而且都烫焦了，因为手指必须要不断地浸在里面。然后，还有中国的女工头，经常在流水线中间来回穿梭，偶尔有哪个孩子工作效率低下，或是觉得哪个孩子在偷懒，

她便会把孩子的小手插进沸腾的大锅里，以示惩戒。工作时间很长——从早上5点半到晚上五六点，所以如果天色渐晚，年轻人的感官有所迟钝，能量有所衰减，这也不足为奇。这些孩子大多都是瘦削的小女孩，有些几乎就还是婴儿。脸庞因长期处于湿热的环境闷得发白，瘦小的身体，即使在冬天也经常被汗水湿透了。她们被剥夺了学习与玩耍这些与生俱来的权利，她们之中年纪最小的，都未曾有过将疲倦的脑袋伏在母亲怀里入睡的温馨体验，这于他们而言不过是种奢望。有位美国女士住在一家缫丝厂附近，她每天早上4点半左右都会被一个孩子尖锐刺耳的哭喊声吵醒。有一天，她悄悄地溜到游廊上，发现了问题的原因，她看到有个小女孩正被人抓着胳膊，一路拖到工厂里。可能是被工头的严苛吓到了，又或是整日被关在那里，有些厌倦了，她正在努力地摆脱束缚。但她的父母不为所动，因为在人口过多、食不果腹的中国，

> “幼子”需干活，妇人要啜泣，
>
> 莫不因挣得少，养得多。

一家欧洲工厂让一位心地善良的意大利人任经理一职，他说他少年时便在祖国学着养蚕，现如今已全然掌握了桑蚕术。他推行了几种人性化的措施，其中之一就是为儿童准备了工作时可以坐的凳子——整座城市仅此才有。至于从工人那里收来的罚款，经营者准许工人利用这笔钱，去为病号买药品、为死者添置棺材、支付住院的费用。“这样的高温环境，会有人晕倒吗？”有位访客问道。“哦，有。”“然后就猝死了吗？”“没有，从未有过。如果我们发现他们情况很不好，就会叫黄包车送他们回家。”

这些缫丝厂生产的蚕丝全都没有留在中国，全都是出口的，大多是出口到法国里昂和美国纽约的。废丝——主要来源于疵茧——是这个行业有利可图的副产品之一。中国唯一一家废丝缫丝厂在上海。它生产的丝线质感粗糙，光泽不再，但用途很多，如用于缝纫丝线，制作细绳、流苏、中式便帽、地毯以及门帘。

---

(1) 中国历史文献中很早就有关于棉花的记载，在公元前2世纪或更早就有棉花种植。但真正大规模种植是在宋元时期，当时域外棉花传入分海陆两路，路上从克什米尔经西域再到中国西北。—— 编者注

(2) 指黄道婆，松江乌泥泾（今上海华泾）人，曾在松江一带教授棉纺织技术，被尊为中国棉纺业的先驱。—— 编者注

(3) 指1878年创办的上海机器织布局，清末最早的官督商办机器棉纺织厂。1893年失火被毁，后经盛宣怀改建为华盛纺织总厂。—— 编者注

(4) 应指聂云台（1880—1953），原籍湖南长沙，1917年赴美考察，1919年筹建大中华纱厂，任董事长兼总经理，1920年任上海总商会会长、全国纱厂联合会副会长。—— 编者注

(5) 应指墨西哥鹰洋，流入中国后在上海流通较广。

(6) 即现在的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和田地区，古称“于阗”。

第十五章　新教故事之扉页

1842年晚秋时节，夕阳映亮了西边的天空，此时一艘与周围的中国式帆船截然不同的船只沿吴淞江顺流而上，徐徐驶向上海。在船上的是新任英国领事及其随员，还有领事的口译员、神学博士瓦尔特·亨利·麦都思（Walter Henry Medhurst）[(1)]教士。但是这位传教士还有其他更重要的事务，因为他和他的同行——更年轻的医学博士威廉·雒魏林（William Lockhart），是以上帝派往长江流域的第一任使者的身份前来的。八年前，他曾造访过这一港口，沿海巡航期间，在友好的当地人之中分发了成千上万本圣约书和小册子。实际上，麦都思博士已经是工作了27年的老将，雒魏林博士1839年就登陆广州，是第二位被派往中国的医学传教士。这两人都由历史悠久的伦敦会[(2)]委派——该协会于1807年往中国派出了第一位新教传教士罗伯特·马礼逊（Robert Morrison）。[(3)]

当领事一行正提议为在上海开展一番宏图伟业干杯之际，这些传教士正满怀希望、满心虔诚地想着摆在他们面前的任务——向这个民族称颂基督王国。在那个难忘的日子里，这座城市有一阵子是看不到的，因为其间停泊着无数只中式帆船，船桅挡住了视线。但是此刻，这艘小轮船靠近了岸边，才发现岸上挤满了中国人，他们围在一起观看并嘲笑“洋鬼子”乘坐的这艘奇怪的“火轮船”。

接下来的几周时光飞逝，年底前，已经有一座小教堂和一所小医院在中国这座城市打开了大门。这一事实说起来再简单不过了，但在取得那样的成果之前，克服了多少困难，面临了多少危险和战胜了多少挫折，这在被虔诚珍藏、因年代久远而发黄破损的传教录中只记载了一部分。令人开心的是，荒唐可笑的插曲并不少。尤其是麦都思博士，富有一种化解一切的幽默感，使得他和同事战胜了那不得不前行的崎岖道路上存在的许多艰难挫折。

随着时间的推移，其余的传教士也离开了故乡，被派来增援“先锋部队”，女人的声音和孩子悦耳的笑声使传教所有了家的感觉。突然天空中出现了一片战争的乌云，人们几乎还未意识到它的存在，它就已经爆发了，太平天国运动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战争对外国人居住的小型社区、官员和商人以及传教士构成了威胁。正逢这一时期，一位一头金发、长相英俊的年轻人在上海亮相了，没有一个伦敦会的成员在他们的

传教士中寻求庇护。他就是戴德生·泰勒（Hudson Taylor）[4]，注定要成为中国内地会的创始人。他早年在中国生活的故事，正如在他最近出版的传记中所讲述的那样，成为上海历史上最具吸引力的篇章之一。从中我们了解到，这位善解人意、犹豫不决的年轻人起初并非自愿接纳中国人的服饰和生活方式——这在后来成了中国内地会的突出标志，而是因为资金不足不得不这样。

中国内地会现在的总部位于市中心区，交通便利。总部建筑包括事务处、供流动传教士居住的客栈、举行中英文礼拜仪式的小教堂，尽管这个传教团体从一开始就将其实际工作限定在内陆地区。这些建筑环绕着一个宽敞幽静的大院子，围成了一个方形广场，似乎远离了街头的喧嚣，就好像街道隔着好几英里远一样。1915年春天，适逢这一传教团体成立50周年大庆，他们在美丽的草坪上提供了茶歇，接着一大群朋友聚集在小教堂里，聆听了与过去五十载经历有关的激动人心的报告和文章。

虽然太平天国运动仍然进行得如火如荼，但这些伦敦的传教士做出了一个非常勇敢的举动。他们此前已经在离租界和华界都有点距离的地段成功地购买了一大片土地，他们立即搬离了他们的工作场所，动用了新场地。英国领事得知此事后，疑惑地摇了摇头，坦率地断言道，如果传教士鲁莽至此，冒险去那个地方居住，他无法为他们提供保护。但他们无所畏惧地留在了那里，现如今，茫茫稻田之中兴起了一所医院、一座小教堂和一些住宅。事实证明，传教士们开发得比人们所了解的要更好。因为那一小块土地，乍看上去和这项工作想要造福的人群隔得太远了，不在影响范围以内，如今却正位于公共租界内华人人口最密集地区之一的中心地带。

这座布道的小教堂刻有岁月的痕迹，很快就会被拆除，为一座更宽敞的教堂所取代，但是祭坛后面用以纪念那些英勇资深的传教士的石碑，若固定在其他墙壁上，看起来还会那么合适吗？在这座小教堂每周三下午举行的基督教勉励会[5]宗教聚会上，通常都能看到一位年过九十、白发苍苍的女士的身影，她是全上海——也有人说是全中国——年纪最大的华人基督徒。孙来（Sun Lai）[6]夫人虽然聋得厉害，但她记忆力并没有受损，她的脑袋跟比她年轻一半的妇女一样机灵。她很高兴见见朋友，和他们聊聊她那浪漫的人生阅历，逗他们开心——她早年是如何与父母一起访问美国，作为格兰特总统和夫人[7]邀请的贵宾，出席白宫宴会，以及在那个中国妇女在西方还很罕见的时代，她是如何受

人瞩目。但她最喜欢聊的话题是她在宁波艾迪绥女塾[(8)]的学生时代，艾迪绥小姐不仅是第一个以传教士身份来到中国的单身女性，而且还是为中国女子开设学堂的第一人。毫无疑问，孙来夫人是那所赫赫有名的学堂里唯一一个还健在的学生。

麦都思博士很久以前在这座城市建造的小教堂如今依然存在，被一侧的书店和另一侧的丧葬用品店夹在中间。这座教堂的历史超过了当时人们的年纪，如果那些砖块会说话，它们可以讲述诸多关于火灾和洪水、饥荒和瘟疫、骚乱和叛乱的故事。尽管周边破坏的行径盛行，发生的变故不断，但是这座每天都在围墙内传递平安福音的小教堂完好无损，它的存在如有神佑。

人口稠密的华界，至今还没有一家中国医院，也没有一家外国医院，这相当奇怪。1861年，麦都思博士很久以前建造的这处小场地，与这家传教机构的其他组织一起搬到了新址——现称为山东路，山东路那里有一处重要的医疗机构正在营业。宽敞的病房里，事故病例尤其多，很少有床位空着，每日的门诊有几百人就诊。

在另一个人口密集的地区中心，坐落着美丽的美国圣公会圣伊丽莎白医院。这所仅对女性开放的医院接收工部局监狱的病人，这些可怜人常常为了在这个他们住得既开心又舒服的地方待得更久一点而装病，人们只需打量一下这些氛围欢快、阳光充足的病房，就知道这不足为怪了。

另一家女子医院位于华界西门附近。35年前，富有同情心的美国人玛格丽特·威廉逊（Margaret Williamson），心系着中国无助的患者，她弥留之际将钱财留给了一家以她名字命名的医院。[(9)]这所医院建造期间，初来乍到的那位医生[(10)]和那位训练有素的护士[(11)]在这座感染病疫的中国城市里租了一间小民房，开了一家诊所。在整个异常炎热的7月和8月，他们都在日复一日地辛劳。“应该要有个朋友提醒我们其中的危险。”几年后，她俩其中一个人笑着和一位访客说道。“中国人对这家医院的看法如何？妇女怕去吗？”“哦，根本不怕。我们医院人总是满的。事实上，我们只要一有钱，就必须得继续扩建。”在一头雪白的头发下，那张和蔼的脸庞上露出了一种忆起往事的笑容，听她说话的人就知道，接下来要讲一些趣事了。“我们以前经常会有一些非常好笑的坐诊经历。有许多次，患者都坚持将本该外用的药物内服。必须要谨慎，不要开任何强效药物，这样不管他们是内服还是外用，都不会造成严重危害。还有，妇女会因为药物而眼红激动。如果给某个患者开了某种

药，而另一个没开，后者就会不高兴。向她解释说她不需要那种特定的药物也无济于事。她就是要一样的。我记得有一次，医生给一个病人开具了大剂量的蓖麻油。她的同伴看到了，也求着开一些。她太执着了，最后我问医生是否应该给她开一些。“行，开吧，”她说，“蓖麻油于她无害，而且这次的经验或许对她有好处。”

某个冬日的下午，一位意外来访的客人发现，只有一名年轻的医生在独自负责，她的同事病了。那天，她除了查护病房、做了三台棘手的手术以外，还医治了247名门诊病人。当最后一位就诊的女性离开时，这位访客说道：“我马上就走，你得休息。”“哦，请你务必坐一会儿。我需要将我的注意力从工作上转移开来。”这位医生劝道。就在这时，这位访客注意到她面前那张苍白的面孔流露出疲惫的神情，便不由自主地说道：“我真希望能带你回家，把你抱到床上，给你一点呵护。”“别那样说，”这位年纪更轻的女子几乎是热泪盈眶地大声喊道，“如果你这样做了，我会崩溃大哭的，但我不能这样，我不能！”这所医院属于女性开拓的妇女工作领域的先驱——美国妇女联合布道会（The Woman’s Union Missionary Society of America）。

长老会的一大骄傲是其创立的书馆。[(12)]1843年——远东大事频发的那一年，书馆创办于澳门，新教徒对它最感兴趣，因为派往中国的第一位新教传教士罗伯特·马礼逊就长眠于它的热带海岸上。不久之后，书馆北迁，落地宁波，1860年又迁往上海。随之一起的还有姜别利先生[(13)]——他名字虽叫威廉而不是约翰[(14)]——但如果有那么一个人是“受上帝差遣”来做一项至关重要的工作，那他便是其中之一。他出生在爱尔兰一个古老的新教徒家庭，其家庭有幸为长老会输送了许多牧师。他年轻时移居美国，先后在费城的一家出版机构和纽约的圣经书房受过培训，做过印刷工人。姜别利先生在中国只待了11年，其中有9年在上海，但是在那短暂的时间里，他完成了一项意义深远的工作。在没什么人看好这座城市的时候，他以先知之明预见到了这座城市未来的发展，并竭力主张将书馆迁至这个大都市的中心，这是受“他希望以最少的努力获取最大的成果，将福音植根于中国中心的愿望”影响。他的干劲、勤奋和善于创新的天赋大大推动了全国各地印刷业的发展——不仅关乎教会出版社，也与世俗出版社有关。这是大家所公认的，几年后他在美国去世时，每个人都能明白他葬礼上宣读的悼词的真谛：“未来的一个世纪里，在中国和日本，没有哪一本圣经、基督教和科学书籍，不承载姜别利先生手心的余温。”

美华书馆理直气壮地宣称自己是中国最古老的出版机构，尽管英华书院印字局[15]——1818年由罗伯特·马礼逊在马六甲创办——几乎是在同一时间迁往了香港。美华书馆是第一家在中国推出中文活字印刷的机构，并且很长一段时间里都是唯一的供应源。该印刷厂在上海创办的57年里多次迁址，如今在设备齐全的新区安顿了下来，这会让威廉·姜别利志存高远的灵魂为之振奋。从星期一早上到星期六晚上，十几台动力印刷机一直在运转，印出了大量的基督教资料——实乃不折不扣的“医治万民的树叶”——这些“树叶”全年都能通往这片贫困潦倒、被罪孽诅咒的土地上最偏远的角落，它们鼓舞人心的影响力远远超出了所有人的预期。

在悄悄改变人民生活的中文出版物之中，有两本流行的月刊：《女铎》（The Woman’s Messenger）[16]和《福幼报》（Happy Childhood）[17]。最近《福幼报》圣诞特刊极具艺术性的封面是由一所浸信会女子寄宿学校的一名学生设计的。

书馆广大员工的精神利益未被遗忘。有两家小教堂举行周日和工作日礼拜仪式。有为员工子女设立的日校和幼儿园，其中一位长老会传教士的妻子将大部分时间用于妇女间的布道工作。每天的晨祷由传教士组织，大部分员工都会参加——他们中至少有一半人是基督徒。许多人都用让人动容并令人信服的方式证明他们遵守誓约的诚意。老卢的案例就是一个例子，反驳了一句经常有人说的话：没有哪个管钱的中国人会不抓些钱在自己掌心里。20年来，除支票以外，书馆所有的钱都经过卢先生的手。有天晚上，他突然死了。第二天早上，外国经理非常忧虑地打开这位会计师的保险箱并检查了他的书籍，但账目完全结平。在保险柜的一个角落里发现了几张妥善保管的破损的美元钞票——这是之前有人骗过卢先生塞来的，但他已经悄悄地从自己那微薄的储蓄中抽出几张，填补了进去。

“你在哪里读的书？”这个问题是问一位年轻聪明的中国主妇，她刚刚邀请了一位外国友人到她漂亮的家里。“中西女塾。”[18]她微笑着回答道。在回应类似的询问时，给出这一答案的频率在上海太高了，以致初到本地、对本地传教工作不熟悉的人很快就会问到另一个问题：“请问，这所名校有什么来头，在哪里？”每个居民——或者说几乎是每个人——都知道。那些不知道的，有点儿不好意思承认，因为对中西女塾一无所知便是真正的孤陋寡闻。这所学校宽敞的大楼总是挤满了学生，太挤了，尽管低年级的学生现在已经搬到了马路对面租来的中式宅院

里。大礼堂改建成了宿舍，每一寸可以利用的空间都尽可能地利用上了。舒适的教室里，门是朝学校走廊的两侧开放的，往里面偷偷瞥一眼，可以看到组织良好的班级在用功地学习，包括代数、绘画、物理、缝纫和家政学。家政学课上的厨房多么整洁啊——雪白的餐桌、平纹细布窗帘、亮锃锃的炉灶还有精心布置的搪瓷材质的锅碗瓢盆！难怪烹饪课会饱受赞誉。负责的传教士谦虚地拒绝了这些赞美之词，但补充说道："我当真觉得我的女学生们应该要学习两门重要的课程：把自身收拾得整整齐齐的，工作完成后打扫卫生。"这些条例放到中国以外的其他国家去强调，也没有坏处。音乐教室在楼上。受邀去音乐会是一件值得高兴的事情。去年，一位修读音乐的毕业生举办了一场音乐演奏会，完全是她独奏，而且表现得可圈可点。两年前，为毕业班举行的临别宗教仪式拉开了毕业典礼周的序幕，这是中国女子学堂历史上的一次独特创举，这一创举被其他教会学校纷纷效仿。

很难说，中西女塾还有哪个部门取得的工作成果比"特别班"更丰硕，"特别班"是对已婚妇女以及因年龄太大或进步太过缓慢而无法入读普通班级的女孩子开放的。上个学期，在一众感兴趣的学生之中，有上海社会主义领袖的妻子——五个年幼孩子的母亲。中国常见的父权制家庭生活使母亲长时间离开孩子成为可能，她们不在家的时候，通常会有许多女性亲属承担起照顾孩子的责任。任何一个有志于完成全部课程学习的特别班的学生，只要她准备好了，就可以入读普通班级。

传教士寓所——与主楼毗邻——的客厅壁炉架上方，挂着一位尊贵夫人的肖像。画像上是首任校长劳拉·海淑德（Laura Haygood）[(19)]——一位"虽死犹生"的人物。她是1884年由监理公会妇女理事会派到中国的，在这难忘的八年里，虔诚地祈祷，辛勤地苦干，大部分时间都被极度虚弱的身体所困扰。开心的是，她珍视的夙愿——创办这所以这一教派主教的名字命名的女子学堂——最终得偿。

达到最高水准的学术造诣是这所学校的目标，但基督徒品格的培养和宗教礼仪的培训始终占据首位。"我想拯救我的国人，"一位女孩信心满满地对着她的外国老师一边抽噎一边说道，"我打算从这儿一毕业，就回到故乡做传教士，在那传道，尽我所能地去拯救那个地方。"这就是基督徒中普遍存在的精神。学生和老师每周都会出去，为附近的流浪儿童举办礼拜仪式。去年冬天，在学校的小教堂里举办了布道会。"我多希望你能看到我们这里信奉基督教的女孩子，为了她们那些没有信仰的朋友有多努力，"其中一位传教士说道，"她们在她们自己主导的小型

祷告会上，度过了属于她们的最温馨最神圣的时光。她们热忱真挚的祷告文和誓约，让所有人为之动容。”

那是在风和日丽的5月，人们已经收到了邀请，来参加在新教圣公会圣约翰大学举办的一场隆重庆典。刚过中午，就陆续有宾客到了，因为第一个节目是军事演习——定在两点钟——这是大家都不想错过的画面。一到点，学生们就穿着整整齐齐的校服，在阅兵场集合，列队接受检阅。战术演练结束后，响起了热烈的掌声，然后每个人都匆匆赶去大礼堂，听中英文演讲，去一睹当天的重头戏：将校友捐赠给学校的一大笔款项交予校长——神学家卜舫济（Francis Lister Hawks Pott）[20]——的赠送仪式，以此庆祝卜舫济任职25周年。接下来是校友晚宴，然后夜幕降临，这个宽敞的场所幻化成了一个仙境——树与树之间，建筑与建筑之间，挂着无数只饰有穗边的中国式灯笼，散发出点点柔光，很是雅致。烟火为值得纪念的周年纪念日画下了句点，但这一天会让上海人民久久不能忘怀。

占地49英亩的圣约翰大学校园，无疑是这座城市最迷人最美丽的地点。它位于城外的极司菲尔路，[21]距离城中心5英里。找不到比这更理想的地理位置了，早在1878年，大部分土地及建筑就已经添置了，买下这些的主教如此具有远见，可以作出这么好的选择，着实令人惊叹。

和大多数大企业一样，这所大学创办之初规模也很小，历经诸多阶段逐步发展起来。这项工作要追溯到1845年，当时有一些为男孩子设立的小型走读学校，虽然伦敦会的先驱们是派往上海的传教士的先头部队，但美国的新教圣公会教徒、长老会教徒以及南方浸信会教徒很快就壮大了他们的队伍，这一点必须要谨记。这些走读学校渐渐发展成为成功的寄宿学校，其中最主要的一家是为年纪大点的男孩子设立的——70位太过贫困的小伙子，给他们免学费、免费提供住宿以及服装。后来，设立英语系的需求凸显，于是增设了英语系。不久以后，一些心有抱负的学生请求读大学，最终于1906年，位于华盛顿特区的美国国会出台一项法令，圣约翰正式成立为一所大学，并有权授予学位。如今，该校校友享有免试进入欧美大学攻读研究生学位的特权，而且该校选派出国的学生比中国其他的教会大学都要多。将所有科系都计算在内，学生规模已超过500人，学生缴纳的学费让学校在很大程度上可以做到资金自给。

去年，一幢五层楼的砖房在市中心最繁华的地段之一落成了，这栋楼本身没什么特别之处，但其意义非比寻常，因为它是用作基督教青年

会中国男童分会（The Chinese Boys’ Branch）的总部。此类型的建筑在远东仅此一栋，而且可以肯定的是，世上没有哪个地方比上海更加需要它所代表的这种工作——上海的男童问题是最严重的问题之一。数据看起来往往枯燥无味，但在这个方面，几个数据就可以概括地讲述所取得的显著进展。男童分会创办时间不足三年，现在第一份成绩单上都记载了什么呢？成员有700人，在学校就读的有500人，自愿入读圣经班的有300人，常规的寄宿生有100人，每天的就餐人数有200人，还有童子军40人——童子军团长是中国干事之一。在这座城市里，总共有不少于500名的中国童子军。在中国人中，这一组织还是相当新奇的，但可以说是取得了“轰动性的成功”，男孩子做起来驾轻就熟，而且于他们而言，好处数不胜数。基督教青年会童子军——懂得敬畏上帝，对妇孺、老人和动物要仁慈，追求真理，诚实有信，勇敢无畏，绝对的忠实，忠诚并服从于一切权威——必将成为今天的中国所迫切需要的那种人。新建的男童会建筑从里到外设施齐全，与坐落在四川路上的本地基督教青年会总部相连。

全国办事处同样在上海，不过是在租来的民房里。已经取得了一块符合条件的建筑工地，一旦资金没那么短缺了，就会开始施工。当地的总部是一个永不停歇的活动中心，设有日校和夜校，开设各种实用课程——健身和游泳课程、运动和阅读俱乐部、表演、演讲、社交、圣经课以及布道会。想不出还有哪里比这更忙碌的了。领导穆德与艾迪布道大会的是基督教青年会，它开展了一场促进卫生、预防疾病的健康运动，它动用一切可用的手段批评了它所强调的社会服务存在的问题，而且它为中国带来了奥运会，有助于焕发活力、增进健康。通过其卓越的科学讲座部门，它接触到了无法以其他方式接近的人。简而言之，该协会“生龙活虎”，永远蕴藏着巨大的能量。

主日崇拜联盟（Sunday Service League）是基督教青年会为大批留洋归国的学生组织的——这些学生回到中国以后，很容易就会失去精神支柱，变得随波逐流。每周日下午五点钟，为他们举行的英文礼拜仪式座无虚席，通常会有路过上海的著名演讲者作报告。美妙的音乐由男男女女组成的中国欢乐合唱团准备。海归俱乐部（Returned Students Club）是主日崇拜联盟自然衍生出来的产物。该俱乐部在冬天的时候，偶尔会在一家外国酒店的会客厅举办社交活动，音乐、交流、一些简单的游戏以及点心会让人度过一个愉快的夜晚。所有男士都穿着洋装，他们几乎代表了每一种行业和职业。女性几乎都毫无例外地穿着旗袍亮相；如此她们便彰显了自己良好的品位和卓越的判断力，因为没有哪一

种服装比这更适合她们。她们大多是年轻幸福的妻子和母亲，但其中肯定也不乏大量的未婚老师——有可能是从事教授英语、音乐、演讲技巧、体能训练或是幼儿园工作的，可能还有一两个医生，总而言之，是一群很有魅力的宾客，好像只有上海才能让他们齐聚一堂。

在中国，基督教女青年会是一个比基督教青年会更年轻的组织，但它正在借助更小的规模开展同等高效的工作。第一任干事是1903年派来中国的，特意派到工厂工人之间进行劳动。然而，该组织觉得这项有计划的活动进展太慢了，应该争取中上层人士，将他们发展成为基督教领袖，然后再把他们派出去向民众传福音，这样做取得的成果会更丰硕、更持久。这就是现在所遵循的路线，结果充分证明了这是明智的。他们创办了上海体育师范学校，[22]实现了一个梦寐以求的夙愿。学校由一位具有丰富经验的外国干事领导，由一位毕业于韦尔斯利学院，并在波士顿接受过专业培训的中国干事协助。[23]这所师范院校的工作引起了诸多关注，其中之一就是，最近成立了女青年运动协会（Young Woman’s Athletic Association），创始成员26人。真的很棒！

学校开设的课程一直很受人欢迎，特别是那些早年没机会上学的已婚年轻女性。除了教授书本知识以外，还有刺绣、简单的缝纫、速记和烹饪等课程。中国女性很乐意学习一些西餐，如果她们的丈夫是在国外受过教育的年轻人，就更是如此，她们能为丈夫端上一些他们在留洋期间学会享用的菜品，对她们来说是个值得骄傲的时刻。“中国菜烹饪技巧”刚刚开课，学生颇有兴趣，结果令人欣慰。

学生工作不仅是教会学校最看重的，只要有机会，私立和公办学校也非常重视。每年都有几百人通过学生干事组织的布道会受洗成为基督教徒。去年举办了六次宗教教派夏季联合会，出席人数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多得多，而且有更多振奋人心的迹象表明，他们内心是真正的醒悟了。这一庞大领域的干事总共有33人——其中有八个中国人，三个英国人，一个澳大利亚人，一个瑞典人和二十个美国人。人们经常听到对这些干事的评论之词：“这些女青年太与众不同了！”这是事实。她们崇高纯洁、知识渊博、足智多谋、具有广阔的视野和敏锐的洞察力，坚定忠贞地在中国推进一项独特的革新事业，如果没有她们，这项事业在很大程度上还无人触及。

---

(1) 瓦尔特· 亨利· 麦都思（1796—1857），英国伦敦会传教士，1835年来华，曾设立中国第一个近代印刷所墨海书馆。编有《汉英字典》《英汉字

典》。

(2) 伦敦会，全名伦敦传道会（London Missionary Society），属于基督新教教派公理宗，成立于1795年。

(3) 罗伯特·马礼逊（1782—1834），1805年由伦敦会选派来中国传教，他编辑出版了中国历史上第一部英汉字典——《华英字典》。他还第一个把《圣经》译成中文，开创了基督新教在中国的宣教历史。

(4) 戴德生·泰勒（1832—1905），英国人，中国内地会的创始人，他自1854年来华，在上海、汕头、宁波等地传教。

(5) 基督教勉励会，基督教新教的一个教徒组织。1881年由美国牧师克拉克（Francis E. Clark）创立于美国。在各教会内成立小组，协助牧师对信徒进行传教活动。

(6) 此处为音译。

(7) 此处应指尤里西斯·辛普森·格兰特（Ulysses Simpson Grant）——第18任美国总统——及其夫人。

(8) 1844年，基督教女传教士艾迪绥（Mary Ann Aldersey）在浙江宁波创办了中国第一所教会女学——艾迪绥女塾。

(9) 1884年，在玛格丽特·威廉逊女士的资助下，创办了上海西门妇孺医院，即复旦大学附属妇产科医院的前身，因屋顶是红色的，市民把这所医院亲切地称为“红房子医院”。

(10) 此处应指毕业于宾夕法尼亚州医学院的伊丽莎白·罗夫施耐德（Elizabeth Reifsnyder）。

(11) 此处应指毕业于宾夕法尼亚州医学院护理专业的伊丽莎白·麦基奇尼（Elizabeth Mckechnie）。

(12) 指美华书馆（The American Presbyterian Mission Press），前身是长老会在澳门开设的华花圣经书房（The Chinese and American Holy Classic Book Establishment），设立时间应为1844年，1845年迁往宁波，1860年迁至上海，改名美华书馆。美华书馆堪称当时上海设备最新、最全的印刷厂。

(13) 威廉·姜别利（William Gamble），来华传教士，1858年主管美华书馆。

(14) 此处应指耶稣十二门徒之一的约翰。

(15) 英华书院印字局（London Mission Press），又名伦敦布道会印刷所。

(16) 《女铎》，创刊于1912年4月，以城市知识女性为读者对象，创办人为美国传教士亮乐月。——编者注

(17) 《福幼报》，创刊于1914年3月，与《女铎》均为广学会创办刊物。——编者注

(18) 中西女塾（McTyeire School），1892年创办，1930年改名私立中西女子中学，1952年7月，中西女中和圣玛利亚女中合并为上海市第三女子中学。

(19) 海淑德（1845—1900），女，美国监理会传教士，参与创办中西女塾。—— 编者注

(20) 卜舫济（1864—1947），美国圣公会传教士，1886年到上海，为圣约翰大学首任校长，任职期间反对以学校为政治运动中心，著有多部以中国为主题的著作。—— 编者注

(21) 极司菲尔路，1861年修筑，初名梵皇渡路，今万航渡路。

(22) 上海体育师范学校（National Normal School in Shanghai for Physical Training），即上海女子青年会体育师范学校，成立于1915年，1925年成为金陵女子文理学院体育科。

(23) 应指陈英梅（1890—1938），曾在美国求学，回国后致力于体育事业。—— 编者注

第十六章　今日之上海

跨越太平洋的大型客轮抵达上海时，若天色已晚，便必定不会让乘客登岸，因为找到酒店住宿的机会太过渺茫。有一次，在几小时之内有几艘轮船相继到达——这种事并不少见。当时，一位美国居民走在外滩上，突然有两位同胞贸然走上去，对他沮丧地喊道："看来我们得在街上晃荡一晚上了，除非有好心的人家愿意收留我们！城里的每家酒店和家庭旅馆，我们都去问过了，但是连折叠床都没了。"

上海的商业区有三家大型的外国酒店——此外还有几家位置远点的。在过去的五年里，已有三家大型的中外合资酒店开业，但光顾的主要是中国人。也不是所有的中国人都在此投宿，特别是许多留洋归国的学生，发现整晚上大部分时间都很吵很乱，搅得他们心烦意乱。据报道，有人即将要斥资300万美元，建造一座配有400间客房的七层外国酒店。这将比这座城市现如今所有的酒店都更大更精致，而且惠顾的顾客一定很多。

那个在上海初来乍到的人会被议论纷纷、周游世界的人还很罕见的年代，还不算太过久远。但那个时代已经过去了。来自世界各地的人们——游客、商人、传教士——络绎不绝地涌入流出。一对传教士夫妇离开6个月后回来了，在街上遇到一位老熟人。"你们可好？"那个熟人向他们打招呼，"最近好像都没见到你们。""是的，我们刚休假回来。""你不是说真的吧！哟，我都不知道你们走了。"

大多数外国人清醒的时候非常忙碌，不是在追求他们的日常爱好，就是在参加他们纷繁的社交生活。"这儿正日渐繁忙。"一位美国女士疲倦地叹了口气。中国人经常随大流，像西方人一样疯狂地勇往直前。"东方快不过西方"这种说法已经完全——至少对这座城市而言——不成立了！

上海终于在安装污水处理系统啦。这一重要的声明值得大肆宣扬、加以强调！这项工作两年前开始，不过无论如何再花个三年也都完成不了。由于土壤的冲积特性，水离地表并没隔多少英尺，这项工作难度巨大，代价高昂，进展缓慢，但却是迫切需要的，而且会为这座城市的舒适条件和卫生增色不少。

建筑业发展迅速，中外风格的房屋，如雨后春笋般一夜间涌现出

来，特别是在北部和西部地段。前一天，看到的可能还是一大片空地，隔一天，这片土地就被一堆堆的俄勒冈州木材以及一摞摞的青砖——是大嗓门的苦力从吱吱作响的手推车上倾倒下来的——占满了。直到最近，住房依然供不应求，正如一位年轻机灵的中国主妇所说："没出租的房子就像金矿那样难找！"

街道到处都在拓宽、延长，有些蜿蜒曲折的也改直了。道路经常需要重新铺筑，这是因为满载的手推车、卡车以及人拉的运货马车所造成的损耗。为了加速那些交通要道——通常又窄又堵——的修建工作，许多工作都是夜间（天气许可的情况下）进行的，对此外国民众并未强烈抗议。在上海，挖掘开凿通常都需要打桩。可通过蒸汽或电力打桩就位，但往往是靠手工操作的——强壮的苦力站在一个升高的平台上，将用绳子固定好的石块或木块重物降到桩上面。整个过程中，苦力都持续地喊他们那抑扬顿挫的号子声，好像不喊就无法干活一样。听第一个小时，外国人还会颇有兴趣，听第二个小时，他便厌烦了，听到一天结束，他已经恼火了，听到一周结束，他已处在精神崩溃的边缘了！有条住宅区街道的英国工头养成了习惯，偶尔会兴高采烈地说"今晚这些金丝雀10点就停唱啦"，以此安慰那些饱受折磨的住户们。

上海最重要的商业街南京路正在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许多古色古香、破烂不堪的老建筑已经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平淡无奇的现代化建筑——朝向街道的是极为普通的混凝土造的正面。人们怀着某种情愫，依依不舍地凝视着剩下的几家两层高的旧式店铺——这些店铺的正面镀着金、怪诞得离谱，却富有特色、具有吸引力。要是能有法律，至少保护一些古老的标志性建筑该多好呢！但这些建筑迟早肯定会不复存在的，想要一睹为快的西方人最好要快点去上海参观了。

在过去两年里，南京路最引人注目的转变在于它的照明。南京路现在不仅是这座稳步发展的大都市，而且还是整个世界灯火最通明的街道之一。要想获得最佳视角，应该从西往东走，行至静安寺路转弯处，仙境一般的风景便会映入眼帘，顶端是永安和先施百货公司那两座明亮的塔楼。有人曾说过："北京的电灯可划破黑暗的夜空，上海的电灯可顶过浩瀚的明月！"这与事实并无多大出入。

华界发生了一些重大的变化，例如，现有两条铺砌良好、东西走向的街道，路面够宽，汽车可以会车——一大惊人的蜕变。因饰有垂柳图案的陶瓷餐具而名扬四海的那家茶馆，依然屹立在池塘的中心，九曲桥因年岁久远已经有些破败。附近已经建成了一座三层楼的娱乐厅，名

为“新世界”。有些老人懒洋洋地坐在昏暗的茶馆里品着茶，但熙熙攘攘的大众则挤进了这栋新建筑的大门，夜晚，这栋建筑上的许多电灯——闪烁着不合时宜的魅力——会倒映在这潭古老的池塘那漂满浮渣的水面上。

在过去的一两年里，中国人的管区内——位于这座城市的中东部——已经发生了一些极具毁灭性的火灾。成千上万的中国人——拉黄包车和手推车的苦力、工厂里的工人以及乞丐——流离失所，许多人葬身火海。然而，几个月后，这片土地已清理干净，原是无数草屋坐落的地方，仿佛施了魔法一般，升起了一排排廉价的小砖房。无家可归之辈因太穷而租不起如此豪华的住宅，便拾掇他们那几件寒碜的财物搬走了，谁知道搬去了哪里呢？一度有谣言流出，说乐善好施的中国人即将在这座城市的郊区为贫困的流浪汉建造模范村，但这一值得敬仰的项目未能实现。

在最严重的火灾现场附近有一大块地，以前是存放棺材用的，那些棺材后来要么是被车运走了，要么就无限期地存放在那里，等个吉利或方便的时间埋葬。有位每天早上上班途中都会经过这个地方的美国绅士，有一天清点了一下，有28樽棺材，大多是小棺材。8个月后，看哪！每樽棺材都不见了，那块地里的水已排干，土已填平，以供建设所需。有一家中国的慈善团体为公共卫生着想，以照料身份不明的尸体以及未行下葬的棺材为己任，每年会安葬一万多人。这一组织理应接受整个社区——包括中外人民——的谢意。

街头拥堵的问题变得愈发棘手，形成了威胁。不仅是马路边的房屋里人口众多，而且这些马路隔一段距离就会与狭窄的小巷相交，这些小巷通往坚固的中国住宅楼群，民众会从那儿涌出，让原已拥挤的公路上人群更多。

交通问题十分严重。电车（street-car），或我们在这里所说的有轨电车（tram-car）[(1)]——因为我们非常“英伦化”——完全不够。虽然线路很多，车辆行驶间隔较短——通常是一节设有一等座和二等座的车厢加上一节设有三等座的拖车，但是，一天的高峰时段还是异常拥挤。车辆里面及其他地方的标语警告乘客不要站在踏板上、靠在栏杆上，因为若穿过狭窄蜿蜒的街道，他们会很容易被过往的车辆撞死。但是对这一警告，他们都一律忽视，中午12点到1点之间以及晚上5点到6点之间的电车呈现出一幅蜂群密集的蜂房之景。有几条街道上已有无轨电车行驶，很快便会推出公共汽车。

黄包车依然随处可见。最近，一家英国公司要求公共租界的管理机构工部局准其将人力三轮车引入街头——这种交通工具与黄包车并无二致，只不过苦力不需要拉它，而是坐在乘客前面或是后面的座位上，用脚踩踏板。工部局已经批准，投放200辆三轮车进行试验，若成功了，批准的执照数量将增至600。在这些繁忙的街道上，黄包车发生了多少起事故——更别提那些死里逃生的场景了——这些还历历在目，人们不敢想象，当不负责任的苦力可以脚蹬这些速度飞快的交通工具，后果会如何！但是，三轮车于苦力而言，毕竟是件好事。

粗略估算，第一辆汽车，约莫是二十年前在上海亮相。如今已有4000多辆，除此以外还有近千辆其他的机动车。两年前，上海采用汽车展的形式，在一座大型的凉亭里开展了一项创新之举——这座凉亭是为此特意打造的——并吸引了大批感兴趣的访客，其中包括女性。事实上，广告中已经指明，该车展主要是惠及中国人——那些活跃的买家以及车技过硬的司机。

交警——公共租界中的锡克族人和中国人以及法租界中的中国人和安南人——需要高度警惕，尽管他们都非常小心，死亡事故却非常普遍。主要街道的所有必停车站旁，已经建起了长方形的水泥平台，以确保乘客能够安全上下车。这些平台在这儿是特别需要的，因为交通规则规定有轨电车必须在此停车，但并没要求逼近的车辆停止行驶。

汽车是酿成大部分事故的原因所在，但并非所有事故都是司机的疏忽所造成的。中国人经常会掉以轻心。他们会低着头横穿一条宽阔拥挤的街道，从不会瞥一瞥两边，看看有无车辆驶过。孩子们，甚至连成年人，都会在车速飞快的汽车前面，不慌不忙地行走或是奔跑，仿佛他们一定会安然无恙一般。当然，有许多人因此丧生，更多的人被撞受伤。要在上海闹市区的街道上真正享受一段驾驶汽车的旅行，需要相当大的勇气。

不久前，华人自治政府制定了一些自己的交通规则，这些规则还不赖。最后一条是这样写的："一人被汽车撞死后，应该制作一幅死者的蜡像，放在一所房间内，任何对他人造成伤害的司机都应该被锁在这所房间内，这样他就能看到蜡像，痛改前非。如此可能会让他悔改。"

新兴的建筑企业增长速度如此之快，要想知道它们的确切数目，实为困难。外滩的外观已然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道路拓宽了，许多旧建筑被改造或拆除，取而代之的是由钢筋混凝土建成的美观崭新的建筑。尽

管如此，看到零零落落的地方依然存在着一栋古老的建筑，却是一大乐事——抹有灰泥的墙壁因数载寒冬的暴风雨而发黄玷污，二楼朝里缩进，空出了一方平坦的屋顶，长住于此的居民可以在一天中凉爽的时刻坐在或躺在上面，呼吸新鲜的空气。

美国大学俱乐部和美国女子俱乐部已经购买了土地，制定了打造宽敞的俱乐部会所的计划。1920年，全国基督教青年会雅致的总部举行了落成典礼，不远处，该协会海军分部的另一座大型建筑即将竣工。或许，最近最让美国居民以及中国各地居民激动不已的建筑提议，要数为安置美国学校所建造的校舍。一年前，为筹集资金组织的“运动”极其成功，如今已在上海西部购买了16英亩土地，建筑工作正在稳步推进。11年前，这所学校为传教士的子女而创办，不过今天它是面向所有有名望的美国人的孩子开放的。这所学校培养攻读大学的年轻人，享有很高的声誉。一位住在上海、颇有名气的波士顿人，当被问及是否会遗憾他年幼的女儿错失了本国学校的有利条件时，断然答道：“不会，比起波士顿的所有学校，我宁愿她在这里就读。这主要是由于学生队伍不同寻常的特色，这是我们国内任何一所公立学校都无法匹敌的。”

中国人在建筑规划方面的雄心一点也不亚于外国人。在过去的几年里，上海九家中国日报之中，有两家已经进驻了新楼——一座楼顶设有佛塔状塔楼的大厦，视觉效果惊人。这两栋建筑的设备十分精良，受到了西方著名来访记者的热烈赞扬。这些日报之中，历史最为悠久的《申报》是第一家在上海出版的中文报纸。《申报》不久就会举行合适的仪式，庆祝其创办50周年。其主要编辑是位基督徒，他每年都会制作圣诞专版，刊登与基督教有关的图文。每家中国日报对基督教都十分友好，并乐意开放专栏为其宣传。

在市中心一处合乎条件的街角处，正在为全新的中国邮局打下地基。待其竣工后，便将成为上海的一座伟大建筑。近来，位于北京路上的旧红砖邮局业务相当繁忙，一有邮船到达，其阵仗就像生死攸关一般！1923年1月1日黎明前，根据华盛顿会议签署的协议，这座城市里的所有外国邮局——英美法日——都关门停业，将其所有业务都移交给中国人。然而，各部门负责人与此前一样，都是外国人。任何对新管理体制的效果表示怀疑的人，他们的担忧到目前为止都是毫无根据的。每日投递的邮件数量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多，正如一位感到高兴的美国人所表达的那样：“以前如果我们想要及时收到国内寄来的邮件，必须要去美国邮局，但现在，在我们知道邮轮已到达之前，邮件差不多就送到了我

们的门口！”看着邮递员投递很有意思，他们身穿整洁的深绿色制服，坐在自行车上，身前背着鼓起来的邮袋，成群结队地从邮局快速地离开，然后慢慢分开，前往不同的路线。骑着自行车穿梭在上海的街头，需要敏捷的处理能力，但是中国的邮差是骑脚踏车的行家。

我们有时会听人说，中国尚未产生真正意义上的舆论，或者就算存在，也仍然太过微弱，无法为他人所听见。但是，下面的这起事件则恰恰相反：在外国邮局关闭前不久，为了增加本国的财政收入，位于北京的交通部邮传局提议大幅增长邮电费率。全国各地顿时一片哗然！在上海，自总商会至每家重要的中国组织机构，都发出了强烈抗议，其中有人声称，就在外国人同意移交邮局之后涨价，会显得中国诚信不佳。在很短的时间内，这一命令已经取消的消息便传到了国外。

前文已经提到了南京路上的两家中国百货商店。按照西方标准经营的百货商店，虽然在广州和香港已经存在了一段时间，不是什么新鲜事了，但是直到五年前，上海才有了这种百货商店。这两家公司的业务是在这12个月内开始的。这两家公司地处街道的斜对面，配有屋顶花园的七层高永安百货和六层高先施百货，各自都占用了一整座大楼。夜晚，外墙上灯火辉煌，比其他所有建筑物都要高的明亮塔楼，在这座城市的任何一个角落都可以看到。各家百货商店都配有一家常有顾客光临的酒店，一家保险公司、几家工厂和一家棉纺厂是公司资产的一部分。一年里会举办一次冬季和夏季的“促销”活动，届时会有一群人围着特价柜台，或是盯着橱窗里令人炫目的展品，看得入神。百货商店为员工及其家人提供了许多福利，例如免费的娱乐活动和晚餐、新年活动、学徒夜校和儿童日校。所有就医以及看牙医的开支都由公司报销；同样，如有需要，也包括住院和安葬费用。虽然这两家商店之间没有丝毫的业务联系，但管理者都是基督徒，都来自同一家中国教会，这很有意思。一年多以来，这两家店在周日都到下午1点钟才开门营业。周日上午，为那些未在其他场所参加礼拜的员工而举行的礼拜仪式在屋顶花园同时举行，但某些基督徒仪式是强制参加的。

那家出色的企业——商务印书馆，依然是远东地区最大的出版社。中国当然以它为荣，上海将其视为主要名片之一。这个国家的教科书，约有百分之四十是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的，而且据说，世界上可能再没哪个地方的教科书卖得这么便宜。为了让所有人都能接触到书本，书的定价一直很低。商务印书馆已经在南京路上为销售部谋得了一块全新的好地，很快就会开工。印刷厂实现了跨越式发展。其20英亩土地如今已经

由21栋建筑所占用，最近又新建了一些建筑，最新的一栋采用了华丽的钢筋混凝土结构，用于彩色平版印刷工作。此外还安装了最新款式的印刷机和其他机器，其中包括一台旋转式电动书籍印刷折叠机，一次可印刷128页纸张，取代了10台普通机器。它是用来印刷小学书本的，这些书籍会发往中国各地，甚至会送给居住在遥远内陆山区的人。

最近一大很有前景的发展是动画电影的制作，有足够的工作室在拍摄电影。大多数电影描绘的都是中国人生活中的场景——有代表性、似曾相识的画像对这个民族有着强烈的吸引力。去年，英文部的那位编辑获得了母校加利福尼亚州波莫纳学院授予的法学博士学位，他刚从世界各地旅行回来，充满了新的想法和热情。

为商务印书馆员工提供的福利很快便会更加有效——将建造一栋宽敞的图书馆大楼，一所可容纳1000名学生的校舍，以及一栋包括讲堂、阅读室、娱乐室和教室、洗浴设施和一间合作商店的俱乐部会所。

中国人普遍对福利工作愈发感兴趣，这是上海在这个时代令人心生鼓舞的迹象之一。他们的慈善事业越来越多地吸收了利他主义的精髓，纯粹为自身积德而广发施舍的想法正在迅速消亡，即便是在上一代人中亦是如此。中国人，无论是个人还是组织，都在向需要支持的事业慷慨解囊。去年，一场可怕的地震和海啸彻底摧毁了汕头市，后来筹集了200万美元救济患者，其中只有10%来自外国人。为贫困儿童开办免费学校是一份非常受欢迎的慈善事业。

只提几个具体的案例：一名可爱能干的广东妇女，正在为200多名孤儿和寡妇经营一所工业技术学校和收容所，干劲十足，取得了显著的成功。这项工作是她丈夫在世时开始的，但是一年前，丈夫去世了，她便全力以赴，如果可能的话，她会比以前更加全心全意地投入其中。资金由她自己提供。

不久前，距上海不远处，有一座小城的城墙被拆除了。那些砖块——质量比今天生产的大多数砖块都要好得多——在拍卖会上出售。买下它们要一大笔钱，但是华界的一位官员有此财力，以大约3000多美元的价格买下了。这名官员和一群与他相识的中国人，决心用这些砖块，在一个工厂区为工人建立一所医院。一家大型棉纺厂的老板立刻捐助了一万美元。一位外国朋友对他的慷慨之举表示嘉许，他郑重其事地说道：“那笔钱不是我的。”“不是你的！”这位朋友惊讶地喊道。“这笔钱是在我妻子去世后，为了纪念她而成立的一项基金的一部分。这钱属于

上帝。”这位慈善家具有财富、地位和影响力。无需补充，他是一名基督徒。

另一位棉花业巨头——背后有一家价值200万美元的公司提供支持——想出了一个缓解上海拥堵问题的途径，那就是在黄浦江对岸的工业小镇浦东打造一座模范城市，并通过一座钢桥将其与上海连接起来。中国人的项目都是大手笔！

几年前，一群富有进取心的男人，或者更确切地说，是这群人之中的一位推动者，发起组织了中华体育协会。[(2)]其总部位于上海，在其他一些城市设有分会。有人问及此协会时，该计划的创始人——顺带提一下，他从未离开过他的故土——一本正经地回复说："我们国人体格不够强健。他们的虚弱妨碍了他们的工作。外国人已经帮助我们做了大量的工作，对此我们十分感激，但现在是中国人自助的时候了。因而我们组建了这一协会。"该协会的成长历程及其开展的活动颇为有趣。仅上海就有2000名成员，其中有200名女性。

与体育协会一起齐心协力的有中华健康协会——该协会总干事是一位极具天赋、受过西方训练的年轻医生——还有业余音乐协会。后者，据其发起人解释说，是为国人提供文明的娱乐活动，并致力于提高中国音乐的水平。一位外国人在听完该音乐协会举行的一场音乐会之后，抱着一种中国音乐还是有些好东西的信念离开了，尽管此前他从未想过有这种可能，至少他们西方听众认为是没有的。

谈到音乐，便想到了1923年1月23日晚在上海举行的广播音乐会。这是这个国家举行的第一场音乐会，引起了轰动。现在这儿每晚都有一场音乐会，喜爱音乐及其他特色形式的观众群体在迅速扩大，不仅是在上海和附近地区，出海的船只亦是如此。比起世界其他地方，旧中国到底并未落后多少！

近年来，上海在工业方面取得了显著的进步。自战争爆发以来，外资投入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自由，但发展势头最为强劲的还是中国的工业。鉴于不断发生的政治动荡和动乱，这一点更加令人惊讶。但正如有些外国人的明智之言："真正的中国头脑和体力完好无损，是在辛勤耕耘的。她所遭受的政治问题不过是一场皮肤病。"

在上海的几个工业区以及苏州河沿岸，中国人管理的新工厂和制造厂不断涌现。中国目前的61家棉纺厂之中，有26家设在上海。该市有58家缫丝厂，现在还有两家丝织厂——这是新近出现的企业。

两年前，中国总商会富有进取心的主席萌生了在上海建立商业博物馆以刺激本土工业的想法。该展览于合适的时机在商会大楼开放，第一天就吸引了五千多人。该博物馆一直开放…… [3]

那正是上海的魅力所在——全然一新的形式与完全古老的形式形成对比，新奇有趣、古色古香的变化消除了两者之间的鸿沟。警卫员用他古老的手枪或拨浪鼓来吓跑小偷，在肩扛西洋步枪的警察身旁走来走去；披着白色头纱，别着橙色花朵，备了伴娘、花童和捧戒指者等所有现代婚礼仪式的中国新娘，并未让坐在绚丽耀眼的婚轿里那腼腆娇小的新娘黯然失色；街头上现代化的灵车也不像穷人的送葬队伍——独轮手推车以及白衣吊唁者组成的队列——那般常见。还有什么比不是由吟唱着的苦力挑在肩上，而是放在嘈杂飞快的汽车顶上的红色婚轿更加不伦不类、令人捧腹的呢！

日新月异的上海是否会在不久后，摒弃所有的旧时礼仪，变身为一座传统的现代化城市呢？这几乎不可能。中国这个民族对古代的习俗非常固执，正如政府虽然在1911年辛亥革命之际正式采用了西历，但他们还是继续庆祝中国旧历新年那样。

上海未必一直是中国的主要港口，因为位于长江下游距上海12英里的吴淞口——许多大型跨太平洋游轮停泊的地方——正计划从上海身上夺取这一荣誉。如果入境旅客可以立刻在吴淞口靠岸，乘火车前往这座城市，而不必等待机动舢板带他们到码头的话，这将为他们省去大量的时间和不便。但毫无疑问，上海将永远是旅行者心生向往的避风港和最终目标，因为它在过去几十年中的惊人发展使它成为远东地区杰出的商业大都市。

---

(1) 英式英语中常用作tram-car，美式英语中常用作street-car，两词均表示有轨电车的意思。

(2) 可能指1923年7月在上海发起成立的中华体育协会，倡导者有王正廷、张伯苓等。—— 编者注

(3) 因年代久远，本书所翻译的底本此处有一页缺失。—— 编者注